

聆听身边世界

声音的诱惑

9 771005 360239 10>

生活周刊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B
BENTL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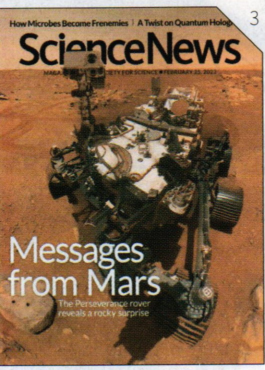
《新闻周刊》2023.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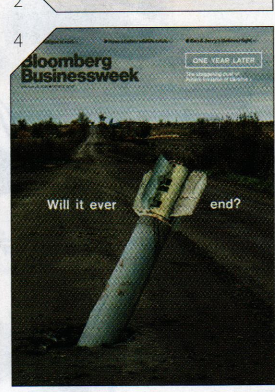
拜登战争繁荣的内幕

80 岁的美国总统拜登在耄耋之年开启了艰苦的连任竞选。在 2024 年总统大选之前，众议院共和党人几乎每周都要对拜登展开激进的监督调查。在公开场合，白宫官员坚称愿意配合监督检查；在私下里，拜登团队的律师们则进行着艰难的抵抗，维护他作为两党共识缔造者的政治品牌。他们最终的打算是：把共和党描绘成极端、失控的党派，同时把白宫描绘成稳定、负责任的领导层堡垒。











1 《新科学家》2023.2.18

星际空间新区域

我们正在加速进入一个新的星际空间区域。研究表明，恒星和行星中的所有原子只占宇宙常规物质的 4%。其余物质分布在恒星之间、星际内部和星际之间，这是一个由原子粒子组成的外太空“安全地带”，科学家称之为“层中空间”。科学家们认为，这些粒子可能代表某种形式的物理力量，甚至可能阻止太空船进入或离开这一区域。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了来源未知的电磁辐射。

2 《哈佛商业评论》2023.3~4

忙碌的陷阱

忙碌成为了一种身份象征。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在美国、法国和韩国，人们认为无论成果如何，那些努力工作的人都在道德上值得钦佩。然而，工作量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甚至会损害员工的健康。相反，将工作时间减少到可控水平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企业和领导者必须站出来反对“忙碌流行病”，这样不仅可以创建更可持续的组织机制，还可以创建更可持续的工作。

3 《科学新闻》2023.2.25

来自火星的信号

在登陆火星大约一年后，“毅力号”在杰泽罗陨石坑底部滚动了几公里，到达了三角洲前缘，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质状况。在 2022 年 4 月至 12 月期间，“毅力号”发现了含碳物质的沉积岩，含碳物质可以揭示古代火星生命的迹象。目前，科学家仍处于分析研究的早期阶段。此外，科学家发现，三角洲至少有一个持续了数万年的湖泊，而持久稳定的水体，可以维持生命。

4 《彭博商业周刊》2023.2.20

俄乌冲突一年后

战争的时间越长，经济的损失越大。2022 年乌克兰 GDP 下降了 30% 以上，通货膨胀率达到 20%。再看俄罗斯，GDP 在 2022 年下降了 3%，通货膨胀率为 13.8%，只有失业率从去年的 4.8% 变为 4%。俄罗斯的经济损失主要来自制裁，在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后，这些制裁可能会解除，但俄罗斯会面临巨额赔款。因此，无论战场上发生什么，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成为经济赢家。在最后一枚炮弹发射后，双方都将承受严重后果。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也做短视频了？
去瞅瞅
扫码关注
B站三联编辑部
三联生活周刊视频号
绘画：范薇





62



80

封面摄影：张雷

2023年第10期，总第1228期，2023年3月6日出版。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王东东 Wang Dongd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刘畅 Liu Chang
线上发行业务 On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王霄 Wang Xiao　李振宇 Li Zhenyu
王荻 Wang di　陆佳杰 Lu Jiajie
姚贺梅 Yao Hemei
线下发行业务 Off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杨雪梅 Yang Xuemei　嵇晓萌 Ji Xiaomeng
李涛涛 Li Taotao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中读 + 人文城市合作电话：(010) 84681395
联系人：蔡华
E-mail：caihua@lifeweek.com.cn
图书出版合作电话：(010) 84681019
联系人：赵翠
E-mail：xingdu@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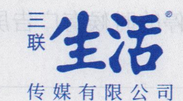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城市	经销商
上　海	上海鸿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017668286
成　都	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	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	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	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	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	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	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7427853
昆　明	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	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883566
哈尔滨	黑龙江视博图书经销有限公司（0451）88382909
青　岛	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	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055155
长　春	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0431）82752206
大　连	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	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0791）88820509
太　原	山西森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	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	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	天津市文馨图书销售有限公司（022）87080096
河　北	兵行天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0311）83035788
新　疆	乌鲁木齐大漠骏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999859711
内蒙古	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	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82055352
长　沙	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扫描二维码直接下载中读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2023 年第 9 期，总第 1227 期

土耳其地震现场

面目全非的不仅是城市，还有人的全部生活和记忆。伤痛过后还得艰难地活下去，清理废墟，灾后重建，重新开始谋生，不敢想他们以后的路。（@ 天造布衣）

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动容了，也许是想到了那年亲历的汶川地震，在巨大的天灾面前，人类虽然弱小，却依旧选择坚强。此时此刻国籍已经模糊，生命的互助让人觉得人间值得。（@ 青果）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被孩子困在城里的老人

今年刚过完年，64 岁的曹奶奶向儿子儿媳提出了“辞职”，她想回老家。提出这样的想法，倒不是她和儿媳闹矛盾，而是她实在无法适应城里的生活，自己很难受，感觉心比种十亩地还累。

一年前孙子上幼儿园，曹奶奶从老家来城里带孙子。早上 8 点之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离小区不远，步行 10 分钟左右。回来时顺便把菜买好，但大多时候是儿子在手机上买好菜，外卖员送到家，她把菜收拾好，就开始打扫卫生。洗衣机她不会用，那台全自动滚筒洗衣机上有很多按键，她不认识几个字，害怕按错。儿子走时会给曹奶奶把电视调好，她对智能家电一窍不通，现在的电视随便点个什么看几分钟都要会员，不像老家的有线电视那么方便，她能随意控制。儿子调好后，她能连续看几集电视剧，碰上有事，她需要按遥控器暂停，电视在暂停的时候有广告屏保，等到重新点开的时候，常常跳到其他节目了，她索性就把电视关了，做其他事情来打发时间。

中午吃饭，她会用微波炉热一下昨晚剩的菜。吃完午饭她基本不睡觉，中午一睡，晚上经常会失眠睡不着。在老家却不同，中午需要睡一觉下午才有精气神干活儿，下午干半天活儿，晚上睡眠质量会更高。在城里中午不睡的时候，她基本靠收拾家里的角角落落来打发时间。

她去楼下扔垃圾也不敢走太远，常常分不清东南西北，有一次出去迷路了，幸好当时带着手机，给儿子说了下周围建筑物的特征，儿子很快找到了她。从那之后，她只敢两点一线：家和幼儿园。

下午 4 点半去接孙子，因为自己不识字也就无辅导学习之类的事，接回来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带孩子在小区楼下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耍，玩到 6 点她回去做晚饭，儿子儿媳在 7 点前下班到家，这之后就是他们三口的时光，曹奶奶洗刷收拾好后就进房间看几集电视剧，然后睡觉。

小区的老人很多是外乡来的，曹奶奶普通话说不利索，平常也没什么朋友。每周她会给老伴打两次电话，询问家里的那几只羊和地里庄稼的情况，没有她在家，家里的农活儿会慢半拍。

多方因素的长期积累下，带了一年孙子后，曹奶奶鼓足勇气向儿子诉说了内心的困扰，儿子和儿媳都是通情达理之人，能理解老人的不适，惭愧自己没有及早地发现。与城里的老太太跳广场舞或坐公交车去景点溜达打发时间相比，老母亲更喜欢与那几亩地打交道，那里有她几十年习惯的生活气息，而城里更像一个无形的笼子把她困住了。

儿子后来在小区附近找了一家托班，曹奶奶主动要求负担这笔费用，她每个月会坐大巴来城里看看孙子，带上一麻袋吃的，住上两三天，大家其乐融融。孙子大概是长时间没见到奶奶，这样一月一见，反而让他与奶奶比过去更亲昵了。（读者 王露露）

本期截稿时间：2 月 27 日 19 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希腊 | **抗议示威**

雅典旅游业工作者在旅游旺季到来前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改善待遇，争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图为2月22日，参与游行的人在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入口处躲避催泪瓦斯。







美国 | **初代苹果电脑**

（右图）2月22日，加州朱利安拍卖行 NFT 发展策略师 Erik Rosenblum 与即将在3月10日进行拍卖的初代苹果电脑合影。他身后的这些电脑是苹果公司于1983年发布的第一款个人电脑产品，名为 Apple Li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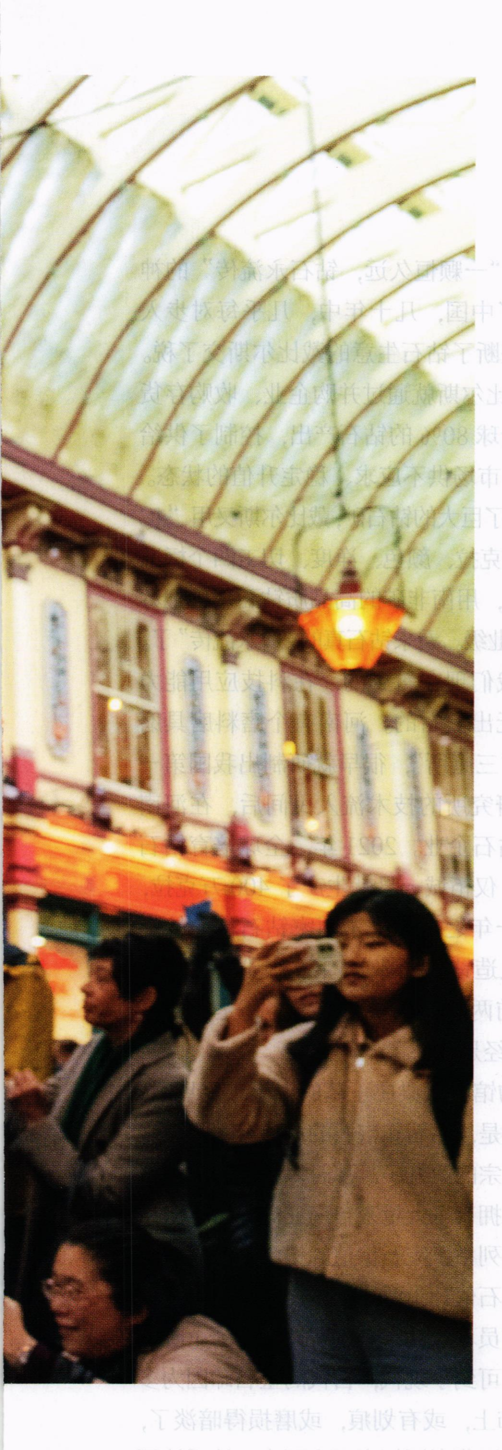
英国 | **宠物疗愈**

（左页上图）2月22日，西萨塞克斯郡古德伍德镇的一处庄园内，疗愈师为狗狗们进行颂钵疗愈。

西班牙 | **弗拉明戈艺术节**

（左页下图）2月24日，赫雷斯弗拉明戈艺术节期间，西班牙国家芭蕾舞团的演员在表演。


LAMB
LAMB



英国 | **松饼赛跑**

（左图）2 月 21 日，Lamb Tavern 酒吧在伦敦利德贺市场举行抛松饼赛跑，参赛者需手持煎锅一边快跑一边抛接松饼。

萨尔瓦多 | **扫黑**

（下图）2 月 24 日，正在加大扫黑力度的萨尔瓦多，将首批帮派分子约2000人转入位于特科卢卡的一座“超级监狱”。这座“超级监狱”能够容纳 4 万名犯人。



钻石难流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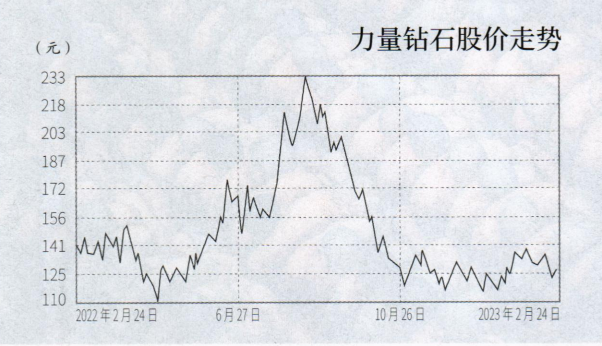
文 · 邢海洋

钻石品牌 I Do 的创始人李厚霖被限制高消费，联想到有人将十几年前买的钻戒送去回收，买时 1.8 万元现在回收估值只有 140 元，曾经奢华象征的钻石，为何坠落凡尘?

当我们因 ChatGPT 的超常智力担心失业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行业被科技与狠活打得落花流水了。比如新疆采棉花的季节工，几年前还浩浩荡荡地奔走在中原大地与遥远的边疆之间，这两年就被机器取代了。2021 年，北疆 95% 的棉花都是用机器采摘的。采棉之前是麦客，收小麦的季节工，联合收割机比采棉机容易制造，麦客的形象于是只停留在了上世纪的小说里。

打败天然钻石的是人造钻石。中学化学课上，我们就知道了钻石的成分和石墨没有区别，都是碳原子，不同的是排列方式。可要把碳变成钻石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涉及结构的重组，需要很大的能量，巨大的能量在机缘巧合中施之于碳才产生了金刚石。这样的机缘巧合之处也只有在高温高压的地下才存在。地球表面的钻石矿都在火山附近，钻石在地球内部形成再被火山岩浆带出来。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科学家们模仿地球的内部环境，已经人工合成出钻石，不过工艺上还很粗糙，合成的钻石只能用于工业。上世纪 70 年代，第一颗宝石级合成钻石诞生了。按一般科研规律，世界第一往往是大力出奇迹的结果，证明的是技术上的可行性，绝不会有成本优势。也就是在从研发到量产的时间窗口期，“一颗恒久远，钻石永流传”的神话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几十年中，几乎每对步入婚姻的情侣都为垄断了钻石生意的戴比尔斯交了税。早在 1902 年，戴比尔斯就通过并购企业、收购存货等手段，掌控了全球 80% 的钻石产出，控制了供给量，就维持了钻石市场供不应求、稳定升值的状态。



后来苏联发现了巨大的钻石矿，戴比尔斯又用“4C 标准”来应对，以克拉、颜色、净度、切工四个标准来判断钻石的价值，用南非矿的高品质钻石生生把苏联的钻石打到了工业级。看来钻石真的要“永流传”了。

当然，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科技应用能力上，中国制造是无出其右的。河南有个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俗称“三磨所”，很早就研制出我国第一颗人造金刚石。研究所的技术流入民间后，在河南促生了一众人造钻石企业。2021 年，全球培育钻石产量 900 万克拉，仅柘城一县就生产了 400 万克拉，这座小县城还在一年之内诞生了两家钻石行业的上市公司，堪称“人造钻石之都”。宝石级别的钻石价格迅速平民化，前两年人工钻石的价格还是天然钻石的 1/3，如今已经是零头了。

参观湖北博物馆明代梁庄王墓的出土珍品展时，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钻石和宝石的命运有着相似之处。梁庄王是明仁宗的第九子，那时郑和下西洋归来不久，梁庄王因此拥有了大量来自南亚的宝石。印象深刻的是，展览中列举了宝石价值的银两和当时普通人的薪资，一颗宝石值几十两，农民一年的收成价值才十几两，低级官员不过几十两。普通人在那个时代根本买不起宝石。可到了现代，古代的宝石却因为多次镶嵌在金银首饰上，或有划痕，或磨损得暗淡了，卖不出大价钱，不识货者还把宝石取下来，论斤论两买卖金银饰。当年郑和下西洋也是那个时代的科技与狠活吧，可几百年后的西洋轮船就实现了各大洲之间的定期航运，南亚宝石也就不稀罕了。

今日之钻石，也和郑和带回来的宝石一样，也是富贵之过客吧。



栏目插图·范薇

硅谷房价暴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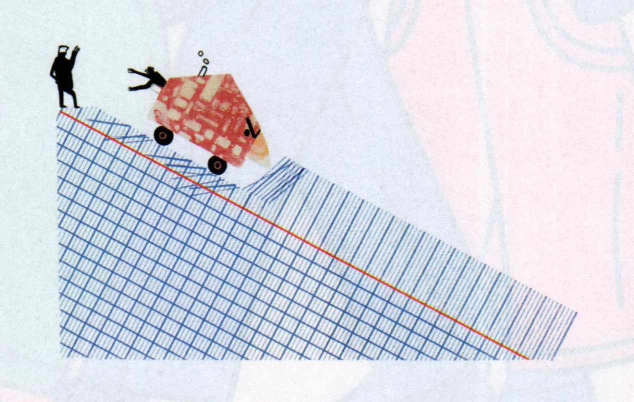
作为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旧金山湾区房价突然出现剧烈下跌，甚至比次贷危机时期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来得更猛烈。据 WolfStreet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份，旧金山湾区 9 个县的房价中位数环比下跌 8%，同比下跌达 17%，相比 2022 年 3 月的峰值，房价中位数累计下跌幅度达 35%，当地房价中位数从 154 万下降至 100 万美元。

大佬包凡失联

2 月 16 日晚间，华兴资本控股公告称，暂时无法与公司董事会主席包凡取得联系。包凡先后服务于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贷，帮助数家领先的跨国企业募资并购。仅 2015 年，华兴资本在互联网企业并购融资浪潮中就参与了 13 个并购案，包括滴滴和快的、58 同城和赶集网、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合并。

零首付，低首付

“白送 60 万元，首付 30 万元买 3 房。”深圳龙岗区一楼盘总价减免 60 万元，且在首付中扣除，引发了久违的排队购房。该项目因为扰乱市场已被相关部门查处。自 2015 年至今深圳房价涨了两倍多，房地产阴跌近一年，房企又试图以擦边球刺激购房。目前，热点城市首付比例至少 30%。一线热点城市，综合衡量贷款金额，即使首套房，首付比例也比政策下限高。



MOSS 团队道歉

中国第一个公开测试的类 ChatGPT 模型——复旦大学 MOSS 因访问量大而宕机，该团队道歉称："MOSS 还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模型，离 ChatGPT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宣称国内首个类 ChatGPT 模型 MOSS 与公司无关，复旦复华还是一字涨停，反映了投资者对 ChatGPT 的渴望。百度和科大讯飞也宣称有类 ChatGPT 项目，即将公测。



打车又有补贴了？

滴滴"回归"满一个月，其市占率已从巅峰期的 90% 下降至 70% ～ 80%。恢复上线后，滴滴便再次祭出了补贴大招，首先是出台"司机拉新项目"，推广员拉一个司机最高可得 490 元。司机以往早晚高峰拉满 5 单有 20 元补贴，现在涨到了 25 元。在乘客端，刷朋友圈时，不经意间就能刷到滴滴推送的优惠券。



直播带货不香了

国内热火朝天的直播带货，在海外并未被接受。去年 8 月，Facebook 宣布终止直播带货，Instagram 也表示取消过去几年允许创作者直接标记商品，并在直播中推广链接的"直播购物"（Live Shopping）功能。除了截然不同的消费习惯，海外市场的移动支付不够普及以及低效、昂贵的配送服务都是直播带货难的原因。

遭狙击的印度首富

做空机构 Hindenburg Research 用 104 页的报告指控印度首富阿达尼旗下企业欺诈后，其股票及债券缩水千亿美元。阿达尼的企业与莫迪政府密切合作，推动机场、码头等本国基础设施现代化，同时还进口了充足的燃料。俄乌冲突给印度采购廉价石油以机会。阿达尼集团以一份 413 页的报告予以反驳，称这家做空机构的报告"纯属谎言"。


(视觉中国 供图)

家务活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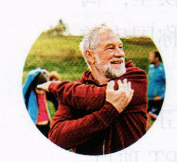
人工智能固然可能成为办公室工作杀手，却可能为困于家务的女性带来福音。65位英国和日本人工智能专家预测，10年内，借助自动化技术，至少可以将人类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减少39%。《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的论文指出，自动化在节省日用品采买时间上的潜力最大，可以轻松达到59.34%的替代率，而洗碗、做饭、洗衣和帮孩子辅导功课的替代率分别为46.89%、46.05%、42.95%和39.63%。但在与孩子交流互动、日常接送和照料看顾这三件看似没有技术含量的事上，替代率只有22.25%、23.55%和20.77%。

好消息



劳动者的福报

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和不育率升高，已经是全球性问题。但《人类生殖》上的一项研究从2005年到2019年调查了377名从事不同职业的壮年男性后发现，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与从不干重活的人相比，精子浓度高出46%，精子总数也多了44%。



用锻炼打败抑郁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综述分析了1039项与抑郁相关的研究后指出，同心理咨询和主流抗抑郁药物相比，持续12周的运动干预在改善精神健康水平、减少抑郁和焦虑症状及发作频率上的效果似乎要更显著。

坏消息



空气污染与骨质疏松

一项针对11020名更年期后女性长达9年的跟踪调查表明，空气污染与骨矿物质密度下降之间存在显著联系。主要源于汽车尾气排放的二氧化氮对腰椎骨密度的负面影响最大，其浓度每提高10%，腰椎骨密度每年便会降低0.026克/平方厘米。



畅快的代价

靠非处方轻泻剂来缓解便秘或控制体重的人要小心了！《神经病学》杂志上一项针对英国生物样本库50余万名参与者的分析调查显示，经常服用非处方轻泻剂的人与对照组相比，10年内患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了51%。

“伯爵感到最愉快的事……是倾听别人谈话，特别是当他设法挑起两个喋喋不休的谈话者相互争论时。”我非常赞同罗斯托夫的偏好：给两只跳蛙上发条，总比自己被上发条、被迫跳要好。

——华裔作家李翊云，《托尔斯泰为伴》

伟大历史著作的衰落只是伟大著作衰落的一部分。今天的科学之士写不出可与牛顿的《纲要》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比的书。诗人们也不再写史诗。

——英国哲学家罗素，《记忆中的画像》

任何动物只要稚气未脱，或者像婴儿，有凸起的大脑门、深邃的大眼睛、圆鼓鼓的脸颊，都会唤醒人类的本能，让人想呵护它。大熊猫有着独特的毛色，坐姿和吃东西很像人类，可以精准地启动人类的哺育本能。

——英国动物学家露西·库克，《树懒是节能，不是懒！》

我相信要了解一个国家，读关于它的书，尤其是它的小说，胜过去那里游览。我从没去过日本，我也不想去，但我听过足够多的旅行者的故事，必要时，我能写一部相当可信的以东京为背景的小说。只有一种东西带不回来，就是一个地方的气味。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关于旅行的想法》



（插图 山丰胡）

在被集体遗忘的平淡无奇之下，隐藏着传奇女性们五彩斑斓的风景，有些令人敬仰，有些却声名狼藉。但她们的共同点在于一种背叛、一种逃离、一种征服。她们背叛了社会寄予的期望，逃离了女性局限的命运，赢得了个人自由。

——西班牙作家罗莎·蒙特罗，《女性小传》

数字

3000 万

2023年北京图书订货会集中展示图书40万余种，展台数量2900余个，参展商数量700余家，参展规模创历届之最。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0余名主播或编辑在订货会现场开播，开幕日半天销售实洋达3000余万元。

1200 万

时隔一年，上海地铁日客流量重新达到1200万人次。此前，上海地铁日客流量最高纪录为1329.4万人次，于2019年3月8日创造。

15 %

中国足协宣布，聘任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扬科维奇为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他认为一个体脂率15%的球员不可能踢出高水平的比赛。



有关尬聊这件事

文 · 刘俏到 图 · 谢驭飞



我从小深知尬聊的可厌。家里来客人，只要我在场，大人的话题九成九都要祸及我，诸如礼貌懂不懂、成绩好不好、饭菜挑不挑，都自然成为令人尴尬无比的话局开胃菜。某综艺节目中，一个女生愤愤不平，说自己小时候最讨厌的话题之一是发育，我发育就发育，凭什么被你们大人现场取笑，真真讨厌得很。所以一旦客人出没，孩子们就尽快隐了吧，除非你喜欢尬聊那令人生厌的主要成分。

然而长大方知，孩提时代的尬聊并不算什么，起码可以倚小卖小，翻翻白眼迅速藏匿。与孩子相比，成人的尬聊才是避无可避。比如公司送贵宾乘高铁，总走 VIP 通道，送上站台以示客气，本属礼数周全，却难免尬聊。在高铁将开未开的三五分钟里，主客双方分立车厢上下，临门对望，等着挥手再见，此时商务座客流很少，倚门相送并不碍事，然主客心神不定，话难接茬儿，颇有一种尴尬涌上心头。我行走江湖二十年，只遇一客道破此局：该说的话早已说干，新开话题又来不及，谁先走谁觉得过意不去，真是尴尬一刻啊。我们一起相视尬笑，算是尬愁大解，但主与客依然不曾离开半步，毕竟双方身经百战，哪个都是宁愿尬聊、尬视也不能失礼的英雄好汉。

有啥好埋怨的呢？我们都是凡人啊。就连留下千言《论语》的孔子，尬聊不也难免。比如那年达巷的群众就曾挖苦孔子：你是够，就是“博学而无所成名”。意思是孔子啥都懂，但半瓶子水居多，没啥能够赖以成名。这话说的，真是让人生尬。孔子只好自我解嘲：那咋办呢，与射箭相比，我驾车还行，要不就驾车跑滴滴去吧？难怪到现在，市场上有那么多理论联系实际、教人高情商话术的书，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一本正经地传授为人处世之道的短视频，可知消解尬聊这件事，确实很有需求。

善解尬聊的似乎也有，比如一位陪读妈妈，身处内卷年代，附近有一群陪读妈妈。大家作息规律相似，无一例外夜伏昼出，只有在孩子上学的白天，妈妈们忙完家务以后才能稍稍放飞自我，慢慢也就熟络。不知何时起，她成了附近妈妈们的热门约聊对象。无论孩子是学霸还是学渣，妈妈们的幸福都是相似的，焦虑却各不相同，这足以丰富她的陪聊素材。业务繁忙时她排出计划，今天明天，线上线下。老公来探亲时，她时间吃紧，于是考虑“买一送一”：陪聊可以，但得搭个不会聊的。我深信她必有破解尬聊之术，不过她老公善于尬聊，世界终归平衡。

我十分钦佩她的善聊，问她诀窍则笑而不答。于是我建议她，等儿子大学毕业，可授他结交有经济实力的异性的秘籍，说不定能省二十年奋斗。然后，很意外的，她突然尬意微泛：就是因为有个成绩很菜、考大学很难的儿子，所以在人面前放低了心态活出了卑微，自然好聊呀！

不听话的身体

文 · 孟淘　图 · 谢驭飞



文明、礼仪要求我们管住自己的身体，做到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管好我们的眼睛、耳朵、嘴巴和躯干，那么鼻子呢？好像它是完全被动的，不会给我们惹是生非。但气味会让我们愉悦或者不快，从而促使我们去获得或躲避一些东西，让我们多花钱。德国耳鼻喉专家罗伯说：“聪明的商家坚持不懈地用香味激发我们的购买欲。专业用途的芳香物质通常低于感知阈值，所以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自己被操纵了。如今，几乎所有规模稍大的连锁酒店都会通过专门研发的空气净化香氛产品，不知不觉地帮你决定晚上是住希尔顿还是威斯汀……面包通常位于超市的入口处或最里面，在入口可以引诱外面的人进来，在最里面可以引导顾客在整个商店里逛一次。”

即使眼前没有诱人的美食，我们的肚子也会发出声响。“趴在任何一个人的肚子上认真听一下，不出几秒钟你一定能听到几声咕噜声，那是胃壁和肠壁的肌肉不断收缩时发出的声响。这种肌肉的收缩能推动食物在胃肠道中移动，和蛇吞下一只老鼠的道理是一样的。这种咕噜声叫腹鸣。”

我们以为口臭是不正常的，其实我们的口腔、舌头上都有细菌，有细菌就会产生异味。把那些细菌都赶尽杀绝不就可以了吗？那会造成比口臭更严重的问题：口腔中的细菌能参与合成一氧化氮，它们可以舒张血管、降低血压。当我们用漱口水杀灭口腔微生物时，口气是清新了，却会增加血管堵塞、脑中风的风险。

即使是圣人也可能在睡着时流口水、打鼾。“打鼾是身体完全放松时相当独特的伴奏：舌头和咽喉的肌肉软绵绵地垂着，尤其是在口腔的后部。呼吸的气流再碰上这堆疲惫、瘫软的组织，就会开始振动，从而产生声音。”一个普通的打鼾者可以发出高达 85 分贝的音量，介于吸尘器和除草机之间。目前的世界纪录由英国的珍妮 · 查普曼保持，她的鼾声超过了 111 分贝，相当于一架小型战斗机。2% ～ 86% 的人都会打鼾。在德国，睡眠医生认为大约每两个中年男性中就会有一个打鼾。男性比女性打鼾更频繁，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打鼾，因为他们的咽喉肌肉不再像以前那样健康、强健。打鼾者本人不会因此而产生睡眠障碍，且除了鼾声之外没有其他呼吸道疾病。所以打鼾不算病，只是很烦人。但也有研究说，打鼾的声音越大，第二天就越累。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一饰多戴

宝诗龙高级珠宝系列 Moon White 项链由 175 颗 Akoya 养殖珍珠打造的三股链，搭配 Art Deco 双回形珠宝扣，珍珠的虹彩在铺镶钻石的衬托下，展现刚柔并济的美感，珠宝扣可拆卸作为发饰或一对胸针佩戴。



大明火珐琅

帕玛强尼 Rosa Mystica 红玫瑰三问报时腕表的表盘和猎表底盖覆以多层彩色珐琅（珐琅的煅烧在 800 摄氏度下进行，由工匠反复操作烧制六层），翻开底盖，可见镂空机芯，“大教堂”音簧环绕机芯一圈半，音质悠长而饱满。



朋克风格

THE JEWELLED HOBO 迷你指环包将几何切割式的立体轮廓与 Alexander McQueen 经典的 Knuckle 指环装饰相结合，手工雕刻的动植物形象环绕哥特式骷髅元素，传递无畏、叛逆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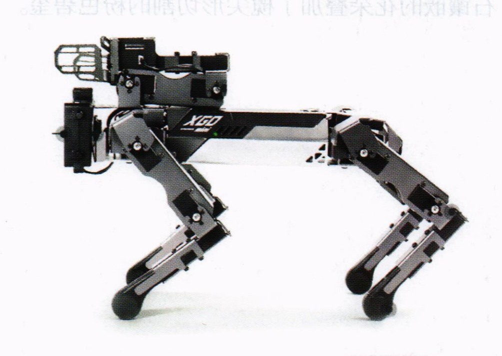


气垫运动鞋

BAPE 推出的 HONEYCOMB CAMO ZIP ROAD STA 在鞋面覆盖最新印花的尼龙材质，拉链和拉绳双重结构可以根据穿着者的喜好调整合脚度，中底搭载 ROAD STA 气垫，舒适贴合。

AI 机械宠物狗

XGO 2 凭借 Raspberry CM4 的抓取器和 AI 智能模块，可实现全方位运动、六维姿态控制和多种运动步态。它能像宠物一样基于视觉识别、语音识别和手势识别做出响应，还可用于算法验证和二次开发。



现代厨房

高仪波蓝超纯过滤系统能去除自来水中的微塑料（>1μm）等微小颗粒和余氯等异味物质，从而改善水质，提升口感，四款升级龙头——C 形、L 形、U 形以及 L 形（带抽拉功能），提供多种实用选择。

仿生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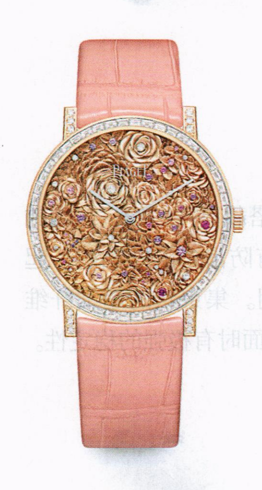
UZIS 防滑篮球袜多处搭载科技纱线，分明的区域功能结构与加厚且带有防滑条的凹凸感，起到防滑、包裹、保护的作用。集束状的超细纤维束产生的作用力，在抓附地面时有极强的稳定性。





粉红蛋白石

Chaumet Aube 胸针以四瓣花朵为主题，粉红蛋白石雕刻的花瓣具有饱满的造型，白色钻石镶嵌的花朵叠加了榄尖形切割的粉色碧玺。



金雕玫瑰

Piaget Altiplano 超薄腕表采用金雕工艺，让层层叠叠的玫瑰花绽放在表盘上。每片花瓣被细致雕刻，花蕊中心镶嵌钻石、粉红蓝宝石和沙弗莱石等宝石。

幸运兔回归

水洗帆布材质的 Givenchy X Disney 手提包，正面印制一对长耳朵的幸运兔奥斯瓦尔德，这是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在 1927 年创作的卡通形象。

蝶形螺母

Tonone Bolt 台灯具有工业化的简洁外观，开放式灯罩用带粉末涂层的铝材制作，灯臂上下两端附带蝶形螺母，方便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





淡彩色调

手工吹制的 Helle Mardahl Bon Bon 玻璃茶杯，甜美的淡粉色结合线条柔和的造型，杯口边缘点缀一颗俏皮的紫灰色玻璃圆球。

简化梳妆台

BD Barcelona Chandlo 梳妆台用黑色白蜡木结构搭配绿色钢质桌腿，浅灰色桌面上排列中央圆镜、方形后视镜和椭圆形首饰盒，不同几何造型组合出被简化的当代梳妆台设计。



聆听身边世界

声音的诱惑



（张蕾 摄）

声音收集者李扬多年来行走在深圳的街头巷尾，收集城市声音

主笔 · 薛芃

你可以闭上眼睛，合上嘴巴，捏紧鼻子，让这些五官都暂时休息一会儿，唯独关不紧耳朵，即便是捂住双耳、戴上耳塞，依然不可能完全听不见声音。声音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总被忽视。

都市丛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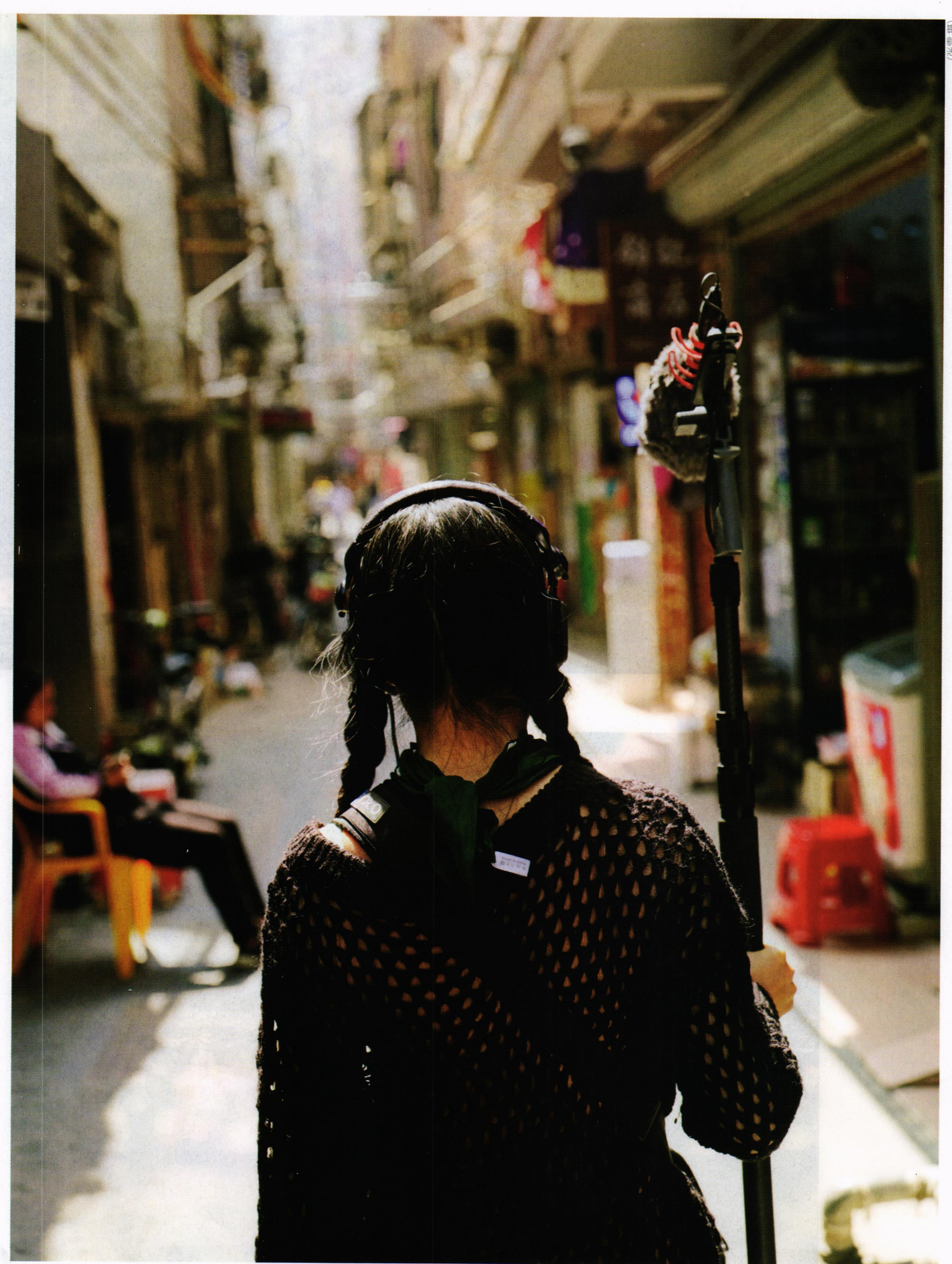
结束深圳的采访，回到北京。我坐在从南站开往北三环的出租车里，车窗紧闭着，窗外是熟悉的北方冬天光秃秃的枯枝荒草，马路宽阔平坦，视线没什么阻隔，看得到路尽头。想起前些天看的一个分析，聊北京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没有都市感，其中也说到，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开阔的大马路，但另一方面，城市的声音似乎也在这种宽阔中消散了。我突然意识到，北京的城市噪声是小于深圳的。

在深圳的几天，有两个瞬间印象深刻，一是在南方科技大学和年轻的声音研究学者徐秋石见面，我们坐在一栋写字楼的三楼小会议室，窗户开着，楼下不是主干道，车流不算密集，却依然觉得嘈杂，徐秋石估算着有三四十分贝，我们需要比平时说话略提高一点嗓门才能顺畅交流，偶尔还会出现一两声突兀的喇叭声；另一次是在城市声音收集者李扬的院子里，她把自己的院子打造成了一个声音博物馆，摆放着不少声音装置，院子挺大的，有100多平方米，外面隔着一条绿化带是华侨城门前的那条马路，头顶上有条航线，我们坐在屋里聊天，汽车和飞机的声音交错着冒出来。

不知是不是因为要做“声音”的专题，这一周，我的耳朵变得格外敏感，极尽所能地去听平时不曾关注的声音。

出租车行驶在北京三环上，阳光照进车里，暖和得很。加拿大作曲家默里·谢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曾经提出，把能否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列为城市的噪声标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应该安静到足够听见走路的声音，不过这已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想法了。现在，国家生态环境部每年都会发布《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其中有一个指标，叫作“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所谓“等效声级”，是国际大多数国家对噪声进行评价的主要指标，一般认为，分贝值在55以下为良好，60以上为污染严重。2020年的这项指标，北京是53.6，深圳是56.2，这一年指标最高的是计划单列市青岛，58.7；在2022年回顾2021年度的这份报告中，略去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具体各地数据，但指出平均值仍为55分贝。除此之外，抛开城市建设和运转节奏这些更复杂的因素，客观来看，北京地形平阔，深圳多山多树，声音在深圳这座城市的传播会经历更多折射和反复，或许也是噪声区别的一个因素。

不过，每座城市里也不只有噪声，还有市声。如果不被对噪声的感受困住，当我们主动用耳朵去体察一座城市的时候，会有很多区别于观看的感受，这是很有趣的。有经验的人可以从汽车的鸣笛喇叭声判断出是什么品牌；根据树上的蝉鸣声判断是幼蝉还是老蝉，老蝉更闷声，没那么清脆。我的采访对象还告诉我，如果在深圳的一个小区听不见蝉鸣声，大概率这是个房龄不超过15年的新小区；到3月底，在湿地公园附近都能听到不同候鸟的叫声，它们白天有时会躲在树林里，只能通过声音分辨它们的位置，更有意思的是，很难听见深圳市鸟黑脸琵鹭的叫声，据说这是一种几乎不发声的鸟类；这几年深圳新开了很多社区咖啡馆，早上七八点磨豆机、咖啡机的声音就响了，没几家是上午10点才开门的；到了夜间大排档里，通宵达旦沸腾着锅气与谈生意喝酒的声音，混杂着天南地北的方言。有些声音却在深圳很少听到：



（张雷 摄）

李扬在南头古城录音

上、下图：在自然里收集声音，为了听到某种生物发声，往往需要等待很久



象棋子砸向木板伴着一声“将军”的声音，马路边打牌和围观津津乐道的聊天声，老年人拄着拐杖戳地的声音……诸如此类闲散的声音。

李扬是太原人，20多年前来深圳工作，做电台DJ，这在当时是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带着电台工作的经验，李扬一直在跟声音打交道。音乐、民生、经济的节目她都做过，在跑民生新闻的那段时间，她开始注意到城市里细琐的声音，采访的同时，她也用自己的录音设备收录一些街头巷尾的声音。到现在，她的声音资料库里已经储存了三万多条声音的音频，绝大部分都是深圳这座城市的。

七八年前，李扬正式从电台离职，开始专注做声音收集和研究。她希望自己是一个按钮，提醒更多人去关注到身边的声音。2018年，她带着自己的团队做了一份“深圳城市声音地图”。他们发动市民自己录音，在海量的城市声音素材里，挑选出38个最有象征性的声音，就像是城市的纪念碑或地标性建筑一样，从坪山客家大万围屋“嘎吱”的老木门声，到腾讯大厦里繁忙的键盘声，每一段音频被生成一个二维码，附在深圳地图上，一扫，便能听见每个地点的声音。

我问李扬，这些年来收集了那么多深圳的城市声音，哪里的变化最大？她想了想说，或许是华强北。早年间的华强北，到处都是装箱卸货的声音，嚷嚷着“电脑、手机、零配件”，白天黑夜的，什么时候听都是闹哄哄的；现在不比以前了，交易改到线上，叫卖声没了，蹿上蹿下取货的声音也少了很多，晚上更是安静，一切变得有秩序，声音也没那么复杂了。

李扬提到蝉鸣声，她会把蝉鸣作为一个城市的生态指标。这些年来，她收集了几十种不同声音的蝉鸣，有高档小区的，有城中村的，水边、树上、蜕了壳的，早晨、中午、一年四季的，都不一样。“一座城市，必须到达一定的年限，拥有草长莺飞的生态系统之后，蝉才有可能出现。因为蝉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幼虫要吸食植物的根汁，只有泥土拥有这一套生态供应链之后，这个地方才会出现蝉。”因此，如果一个小区满是老蝉鸣叫的声音，那就说明这小区够老，而且清水的生态系统不错。李扬在深圳听过最美的蝉声，在西北的光明区。所谓“美”，是蝉鸣丰富的意思，不同年龄段的蝉都有，老蝉叫起来肆无忌惮，拖着长调，声音很辽阔；新蝉会谨慎不少，一有点风吹草动，就立刻中止。虽然深圳四季不分明，但依然能听出不同时节的变化。

听觉与听见

能听得懂蝉鸣鸟叫，辨得出是什么品种、什么状态，是一种听觉认知上的能力。普通人通常都不具备，需要靠训练。然而，在嘈杂的都市环境中，如果不是特别关注，或突然的分贝提高，我们往往都注意不到这些声音，它们淹没在噪声里，但仔细听是听得见的，却不被人主动选择听见。久而久之，“听觉”的能力，就弱化成了“听见”的能力，耳朵变得越来越不敏感。

我对声音好奇，是因为跟朋友聊耳机和音响，这是我的盲区。起初我没有意识到这些设备的“性格”差异如此之大，多听一听，高音、低音的各自侧重表现就显现出来了。在专业的声音从业者那里，有一套独特的描述声音的语言，比如，这个声音是round的，那个声音有点blue，再或是高频弦乐放到厚声的系统里时，往往细节没那么突出，薄声系统里，高频声又会显得尖锐。

徐秋石说，这种声音的质感变化，实在是很难用语言去描述，这一行做久了，自然会拥有这些“默会知识”。也就是“悟到了”。

Hi-fi制造出的复杂声音系统让我意识到，我的耳朵是如此不敏锐。在这个视觉文化高度泛滥的时代，无论是耳机里声音的变化，还是日常生活里听觉的感受力，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耳朵，似乎变成了一个接受信息的工具，只要能听见内容和信息就行，至于听到的是怎样的声音、声音本身传达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和情感变得可有可无。

能听得懂蝉鸣鸟叫，辨得出是什么品种、什么状态，是一种听觉认知上的能力。



（张雷 摄）

人们对录音普遍接受，不像对陌生人的镜头那么有排斥感

研究显示，我们通过各种感官从外界获取到的信息中，约有60%来自视觉、20%来自听觉，剩下的是其他感觉。

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伺候一下耳朵了？怎么伺候？怎么能找到听觉的敏锐度，去好好享受声音本身的美妙？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敦多年来一直从事听觉文化的研究，他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一是因为声音看不见摸不着，二是说不清。但这仍然无法回答，人们在讨论声音和听觉的时候，为什么总是不自觉地就会拿视觉去类比。王敦无意间说道："我们在这儿聊天，在声音的世界盲目地游走。"他愣了一下，"你看，我们会不自觉地说'盲目地游走'，说明语言本身是高度视觉化的"。是啊，为什么不是"失聪地游走"，而是"盲目地游走"呢？只能说明，在"视觉中心主义"的世界，视觉比听觉重要得多。

研究显示，我们通过各种感官从外界获取到的信息中，约有60%来自视觉、20%来自听觉，剩下的是其他感觉。与图像相比，声音是留不下来的。它的发生意味着时间的流逝，而结束了就片甲不留。但是由于视觉的作用强大，我们往往在听见某个声音的时候，脑中会产生画面感，声音会很快勾起视觉的经验。所以听觉是否敏感，有时候也不只是耳朵的问题，而是关乎记忆与个人经验。

如今极具人气的冰岛钢琴家奥拉夫森（Víkingur Ólafsson）在采访时谈到他的通感症，在他的经验里，不同音调对应不同色彩：D调是棕色、E调是绿色、F调是蓝色、G调是红色、A调是黄色、B调是紫色、C调是白色。"这是我对键

盘上的白键的基本感觉，没有对错，就是我自己的体验而已。但如果说起法国音乐,那就像到了巴黎，有种说不出的法国风味。匈牙利音乐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就像是最好的一道菜并不需要放太多糖，廉价的菜式才会放很多糖；匈牙利音乐的风味通透得很，使人不难感受到原料的核心所在，我很喜欢这样的。”每当看到音乐家用这样丰富的感官体验去描述音乐的时候，就会感慨，原来在声音的世界里，人类的悲欢也并不相通。

还是回到自然声音。捕捉自然的声音，在声音领域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在录音出现之前，自然声音的录制者都是靠纸和笔“录音”的。19世纪的美国自然文学家约翰·缪尔（John Muir）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写过很多自然的声音，比如写一个瀑布：“它的曲调变化多端，风从生气蓬勃的橡木间吹擦而过，惹得光滑的叶片发出一阵嘶嘶沙沙的尖锐声响，松林轻柔压抑地低语着，疾风骤雨则是夹带着雷声，在山巅峭壁之间怒吼。巨大的水柱疾冲至危岩表面，在两片突岩上与空气交汇、崩裂，发出阵阵低沉轰隆的回响，在五六英里外的理想地点就能听到。”

我们现在听到瀑布，也会用类似的描述。但不同的是，现在是一个电音化的时代，我们有两副耳朵——自己的耳朵和录音设备。缪尔比我们幸运的是，他能听到更原初的瀑布声音，没我们幸运的是，他无法听到更多那些裸耳听不到的声音。

在深圳的第三天，李扬带着我们去了趟南头古城。古城在珠江入海口东岸，最早可追溯至东晋，现在还零星保留着几处明清遗存，一直以来，这里都是岭南地区海上交通和贸易的集散地。现在的南头古城进行了商业改造，西边老街都是咖啡馆、潮牌创意店，东边现在还是城中村的旧面貌，过不了多久，也将进入商业化城改的模式。

周一的早上，南头古城最是悠闲。周末的游客散去，留给原住民难得的清静。走在东区的小巷里，听到的都是些日常声音：开火做饭，菜场里剁骨头，垃圾车穿梭，打着围栏修房子的人在使用电钻。我问李扬：“你会录些什么？”路过一家肠粉店，她把裹着降噪毛套的话筒递上去，录下了刮板在肠粉板上擦粉发出的刮擦声；又路过一家理发店，她录了一段剪刀剪头发“嚓嚓”的声音，后来还有推刀；路边小店的老板正在蒸鱼，一掀开锅盖，热气“噗呲”一下冒出来的声音；路过一个小祭台，周围的居民在这里祭拜土地公，录下了一段呢喃的“拜拜声”；路过一个补衣修鞋的老铺子，又录了一小段剪刀拆线的声音。诸如此类的，这些细微的声音每天都在出现，却不会有人真的在意，透过监听耳机把这些声音放大听的时候，才意识到如此美妙，甚至有一种莫名的科幻感，剪刀似乎连同着声音一并被放大。





上、下图：李扬在自己的院子里打造了一个声音博物馆

（上、下图：张雷 摄）


（张雷 摄）

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意设计学院助理教授、青年声音研究学者徐秋石

很有趣的一点是，当视觉主宰世界时，人们越来越抵触陌生人的镜头，拍照成为一种“冒犯”，因为快门一旦按下，意味着可能不只是拍下一张照片，更重要的是很可能下一秒就会出现在社交媒体的平台。可面对话筒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排斥，每一个被录音的人在简单询问之后，都会欣然接受旁边多出一个麦克风，即便是偶尔会录进自己的声音。

摸准耳朵的脾气

我们再来“听”几个声音：

发怒的蜜蜂会发出一种让人不适的声音，尽管它不是低频声音，音量也不大，但据说这个声音连大象听了都会产生恐惧感，会一边向远处逃跑，一边发出它们特有的示警的嗓音。

埃菲尔铁塔稳定地扎在巴黎街头，设计者古斯塔夫说，他的设计已将风阻降到最低，但铁塔仍在一直以次声波的频率震动着，强风之下，塔身会以5～7.6厘米的幅度晃动，再加上来往游客的脚步、塔身上随风摆动的照明和监测设备，多重影响下，埃菲尔铁塔持续发出人耳听不见的低频振动声。

电影《异形》有一句台词说：“在太空里，没人能听见你的尖叫。”没错，在太空的真空中，地球概念下的声音的确无法传播，但美国宇航局依然试图收集太空中的带电粒子相互作用产生的无线电波，他们将这些电波转化为声波——木星表面像是水下暗流涌动的声音，海王星则是海浪翻滚的声音，土星如恐怖电影里阴森的BGM。

以上这些声音，如果不借助特殊的收声设备，裸耳是几乎不可能接收到的。上世纪70年代环保主义思潮盛行之时，以前面提到的那位作曲家默里·谢弗为代表，一批环保主义者痴迷于收集自然声音，并且创造了“声音景观”这个概念。他们通过声音寻找自然的原初性，来反对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恶果。但在批评者看来，他们拿着当时工业化文明最先进的产物，用最高级的电子设备去聆听自然，这就像有人曾批评说，那些环保主

义者们坐着喷气式飞机奔走在世界各地开环保会议，来拯救地球和北极熊。总之，对各种自然声音的迷恋，像是某种声音的拜物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持续至今。

如今我们越来越习惯听这种“灌装”的声音，虽然是从自然里生发出来的，但经过收音设备、声音工程师的编辑，再进入到收音设备，这一系列的流程已经将原初的声音进行加工。“耳朵是被规训出来的。”王敦说。

王敦解释道，当声音研究置身于消费主义中时，炮制声音的历史就真正开始了，从早期的建筑声学兴起，再到后来的电磁声学加以强化。1900 年波士顿交响音乐厅落成，这是世界上首个应用现代声学原理建造而成的音乐厅。根据这个音乐厅的声学设计，“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声学的技术、公式和话语来扼制声音在空间里的‘混响’行为，个性化声音的空间开始消失，从音乐厅到办公室，从声学实验室到电影公司的音效间，清晰、直接和无混响的理想的人造声音被制造、流通和消费”。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利用技术，大大降低了由回声造成的听觉上对同一音源发射声音的延迟，要把它降到 0.5 秒之内，坐在音乐厅第一排和最后一排的人，听到的音乐是趋近相同的。

在消费主义的推动下，人们又开始享受“高保真”声音带来的愉悦。然而，每个人的耳朵有着不同脾气，喜欢黑胶的仍大有人在。徐秋石提到，在古典音乐的录音中，弹钢琴时脚踏板的声音，在不同声音工程师的手中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人觉得脚踏板是钢琴演奏的一部分，踩声虚虚实实的，和着音乐，是一种个人特色，而且这节奏变换一般人学不来；也有人觉得脚踏板影响了钢琴声的流动感，踏板声就成了噪声。德国钢琴家巴克豪斯弹琴时总戴着戒指，一弹快了，戒指就会碰到琴键，现在戴戒指唱片的版本比普通的难买多了。

王敦还提到了一种“缺席的声音”，或许可以将对声音的思考更延伸一点。意思就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脑子里其实完全是语言和逻辑，有一个自己在“说话”，但不发出任何声音，在你的意识里，它除了没有发声，跟正常说话没有什么区别。这是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观点，即在思维、逻辑的背后，是有一套个人的语音系统支撑运转的。但有一种情况是，往往自己脑中的声音和语言是严密的、有条不紊的，一旦说出来，变成实实在在的声音和语言时，就会混乱、磕巴，被视为“表达能力欠缺”，这里有很多外力和心理的作用，不过“缺席的声音”终究是“缺席”的，除了自己，没人能听得见。

在李扬的声音博物馆里，一进门，挂着一扇风铃，铸铜的，很沉。当风铃轻轻被敲响时，是一种沉稳、绵长，又非常干净的声音；再往里走，她在花坛里放了一个小装置，会发出低声的高频振动，这个声音会让人立刻产生耳鸣感，直想捏着鼻子用耳朵出气。这是令人愉悦的和不适的两种声音，李扬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让人们感受到更多不同的声音。几年前，她和团队设计了一个“声音球”，用日本的某种瓦楞纸拼合而成的一个半球形声音空间，大约十平方米，每一个角度和斜面在精心测算下，可以形成一个聚合环绕立体声的声场。她喜欢和朋友坐在里面喝茶聊天，声音在这个空间里变得纯粹，耳朵也受到了更加舒适的洗涤。

当耳朵不断打开，聆听万物的时候，会进入到很多视觉无法抵达的地方。听觉是全方位的，爱斯基摩人有一个词叫作“seuketat”，直译为“动物的耳朵”，就是像动物一样更敏锐地用听觉去交换信息，同时侦察四面八方，避免突如其来的危险。不过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当听觉变得敏锐后，注意力会不会下降？楼上装修的声音会变得更吵，考场里掉落的一根笔会都打断思路。对此，我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能听见更多不曾关注到的美妙声音。也可能因此微小聆听，发现从前未曾了解的一角世界。

当耳朵不断打开，聆听万物的时候，会进入到很多视觉无法抵达的地方。

拟音师听到的世界

记者・安妮

"无非是热爱生活。"

听觉游戏

"你听见了什么?"为了向我介绍她的工作,张笑晨邀请我玩个小游戏。她示意我安静下来,花几分钟专注在听觉上。这是北京潘家园附近的一处老小区,陈年中药罐子的气味和午后无数窗口还未散去的饭菜香混在一起,形成迷人的市井气,要聚焦听觉并不容易。张笑晨租住的屋子是一间阁楼,几平方米大,屋里挤着各色动漫手办、乐器和音响。

是电器运转的声音吧?空调外机?"我没开空调。"那是什么?"自己找。用你的耳朵找。"说这话的时候,张笑晨收起笑容,语气和状态很像她的老师魏俊华。

因为偶然通过一档有关拟音的综艺节目了解了曾为电视剧《三国演义》、电影《霸王别姬》等做拟音的"北派泰斗"魏俊华,张笑晨对拟音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决心拜师学艺。参与纪录片《非常职业·拟音师》的拍摄时,张笑晨19岁,正在北京上大学。当年寒假,她前往魏俊华位于皮村的工作室,第一次以拟音师的身份给电影做声音。镜头下的工作间跟想象中不同,它几乎是个杂货仓库,里面堆满作为拟音道具的新旧生活用品。那是一部讲述内蒙古故事的影片,张笑晨负责片中的马蹄声。在被学徒们称作"小黑屋"的工作间里,她用两个皮搋子反复敲击地面,根据画面摸索马蹄踏过草原时的轻重缓急,每天十几个小时,手艺是泡出来的。

张笑晨头一回到工作室,魏俊华让她坐在最后一排听。先在录音棚听通过音响传出来的声音,再去工作间听拟音师以手里的物件直接产生的声音。两相比较,张笑晨刚隐约听出点儿门道,老师却把她叫到厨房,开始手把手教她洗碗。"那一刻我特别不理解。跟少林寺似的,小和尚非得先挑几年水才能学功夫。"站在水池前,她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眼前的水龙头、水流、碗、抹布等都成了她的拟音道具。大水流冲刷碗底,指甲以不同力度叩击碗口,抹布在摩擦力的作用下拂过碗壁……用听觉去专注于洗碗的动作,感受手指控制下声音的变化,同时想象它们在音响中的声音质感,洗碗池成了工作台,张笑晨觉得隐藏在身体里的一重感官被打开了。"可能是天赋吧。"她说,"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对声音很敏感,现在能更好地与各种声音交流,跟它们和谐共处。"张笑晨从小学音乐,拿起谱子就会读,用她的话说,是"老天爷赏饭吃"。

张笑晨看出了我的迷茫和拘谨,她建议我闭上眼睛,把注意力放在听觉上。在身体的指引下,我凑近书桌,发现音响上摆着一个小型熏香机。是它,电池带动它工作,发出低频的嗡嗡声。"还有吗?"气流向上的声音,嗞——嗞——"你听到水的声音了吗?像泡泡一样在机器里慢慢破掉,噗——噗——"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小玩意制造的全部声音。"再找找。"这时候我似乎已经适应了听觉优先的状态。我蹲在窗旁,左耳被床边的空气净化器"拉"住,除去机器本身的嗡嗡声外,卖力转动的风扇叶片正"哗—哗—"地响着。与此同时,我的右耳却仿佛"飞"出了窗外,轻柔的风声萦绕耳边。"尝试去听更远的地方,马路上有自行车铃声,还有阿姨在小区里吊嗓子。这些声音很微弱,一层一层的。"我没有听到。"没关系,多练练,听觉是可以在训练下变得敏锐的。"张笑晨说。



（上、下图：黄映洲 摄）

上、下图：张笑晨自编、自导、自演拟音现场作品《一只小兔子》在艺术节进行户外演



与丰富的声音世界相处

老实说，我还是很难想象张笑晨听到的世界。现实中的声音已经够多了，但出于职业属性，她会习惯性地再在脑海中将声音转化成音响效果。这样一来，她的生活大概会比我的嘈杂得多。

“对声音敏感确实会觉得世界特别嘈杂。不对，应该说是丰富。”张笑晨打开柜子，里面是几大包耳塞。“我接受耳朵听到的丰富性，唯一的问题可能是睡眠，不戴耳塞我完全无法入睡。”

我问张笑晨，能迅速捕捉环境中的声音并准确地找到音源位置，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别想太复杂，你能分辨口红色号，想象它们涂在嘴唇上的样子，对吧？声音也一样，只不过你可能不太关心耳朵。”她随手拿起桌上的保温杯晃了晃。“你听，热牛奶碰撞不锈钢的声音从低沉到清亮，因为液体有厚度，杯子有深度，它打在杯壁上再弹回来，声音有个变化。”接着，她盖上杯盖晃牛奶，倒出一半再晃，最后干脆把杯子交到我手里，让我自己做“杯子实验”，改变牛奶的温度，再换成矿泉水或者果汁，去感受细微的差别。

这个实验让我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我不再只能区分溪流和瀑布，现在仿佛也能从微观层面谈谈声音了。“你迈出了第一步。”张笑晨打了个比方：经过引导，我们都能尝出辣椒的不同风味，



（受访者 供图）

张笑晨在剧场后台拟音工作现场

那是个很旧的金属铃，表面有一层怎么也洗不干净的灰。“你听。真好听，好珍贵。我每敲一下都觉得很舍不得。”

但厨师和美食家能说出它们的产地。“拟音师面临的挑战就在于此。我需要不断积累声音，在脑海里搭建一个资料库。画面需要怎样的素材，我就找到相应的道具复现出来。”

张笑晨提起不久前的一桩奇遇。春节过后，她去苏州旅行。在一家店里闲逛时，她突然听到一个浑厚的声音，沿着音源方向，她的目光锁定店里的一盏落地灯，用指关节敲击灯罩，“咚——”她的眼前浮现出与声音关联的画面：古刹里，一口年久失修的钟被轻轻地敲响了。“如果某天有导演要一个有年代感的寺院钟声，我就会立刻打电话给那家店，花重金把灯买下来。”

据张笑晨了解，一些拟音师，还有些声音爱好者，喜欢拿着话筒满世界去收集声音，她也经常这样做。不过，当代影视作品中有大量声音是需要靠想象来完成的，比如侏罗纪题材影片、《阿凡达》之类的新兴物种。没人真正知道那是些什么样的声音，最终的呈现依赖的是拟音师的创造。

有一回，张笑晨参与一部民国题材电视剧的拟音工作，要给铛铛车配音效。“我当然没有在现实中听过铛铛车的声音，对它的认识都来自资料片和其他影视作品。”她寻找了大量素材，结合画面反复听，总感觉不对。“我耳朵里有一个声音，跟我找到的素材都合不上。太难受了！”

张笑晨到上海出差，某天下午正准备戴上耳塞午休时，一个声音冲进她的耳朵，“啪嗒”一下，跟等了很久的那个声音合上了。“我立刻翻下床，穿着拖鞋、大裤衩和大背心，追着它的方向跑了一条半马路。”声音来自一位收废品的老大爷，他的废品车上挂着一个旧铃铛。“我说，卖给我。大爷说，这是我吃饭的家伙，不卖。又说，但我可以再给你做一个，你把电话留给我，明天我还来。”

张笑晨留下电话号码，第二天在同一时间去那个路口等。大爷没来。第三天，她又站在路口，等待的半个小时里，她觉得自己像言情小说里的痴情女主角。“我特别着急，但甚至没想过埋怨他。我仔细回忆铃铛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构造、什么材料，盘算着有没有可能自己做一个。”到第四天，她已经彻底放弃等待，开始着手到网上找原材料了。下午，熟悉的声音再度响起，她飞奔下楼。这一次声音就在马路对面，一片空地上，收废品的大爷们聚在一起，唯独没有约好的那一个。张笑晨远远地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车头都挂着一个铃铛，每个都不同，但都一样好听。“我冲到他们中间，大喊：‘铃铛谁卖？多少钱我都买。’‘一百。’‘亮出付款码。’”

那天，张笑晨买到了一兜子铃铛。后来其中一个做了“铛铛车”，另外几个在她原创的绘本舞台剧里充当了小兔子的起床铃等音效。聊到这儿，她从置物架最底层翻出一个铃铛，小心翼翼地敲了一下。那是个很旧的金属铃，表面有一层怎么也洗不干净的灰。“你听。真好听，好珍贵。我每敲一下都觉得很舍不得。”

聆听生活

张笑晨告诉我，这些年不乏对拟音感兴趣的人向她询问训练方法。“没什么特别的，无非是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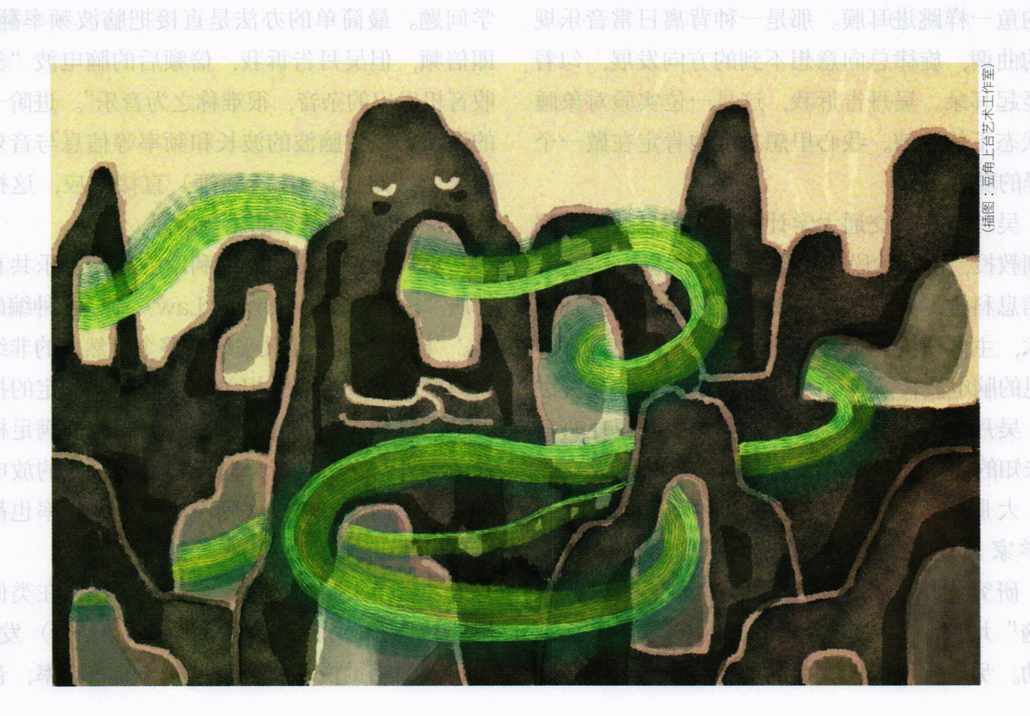
爱生活。”张笑晨爱玩儿，喜欢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逛。她冬天必然要去凿冰或者打雪仗，书桌下常年放着足球，工作时动不动就得踢两脚。

“最有意思的声音都在最平常的生活里。”说起印象深刻的声音记忆，张笑晨讲的并不是需要苦苦寻觅的罕见之音，而是我一定听到过但怎么也回忆不确切的两个声音。一个来自她之前居住的地方。小区后面有一扇铁门，开门有个弹力，带来一阵摩擦声。“很轻，但很有劲儿。有时候我回家能在门口玩半天。”另一个在写字楼里。上高层的有三部电梯，其中一部到达时的声音独树一帜，跟其他电梯都不一样。“其实每部电梯的声音都有差别，但它太另类了，非常有趣。”

面对我对自己听觉钝感的沮丧，张笑晨说：“这是一种很好的状态，意味着你的生活很自在。”在她看来，拟音师的最高境界是让观众忘记声音的存在，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故事与表达中，不会觉得声音在抢戏，也不会感到哪里不对劲。“就像春天的风也有声音，但你只体会到它的温暖。”张笑晨认为，好的声音是将人引领进某种氛围，然后遁形。重要的是对生活本身的关注，声音不过是充当众多媒介之一。“别紧张，声音没那么重要，爱生活就好。”

为了达成这样的追求，在拟音道具上她总是煞费苦心，要找到更自然的物件。有一次，张笑晨要买个非洲鼓，店主在门口喝茶，茶桌即是一面鼓。她走上去敲了敲，觉得声音不错，从店里包了个新的就走了。“回去之后我越拍越觉得难听，不对啊！最后去求人家把当茶桌的那面鼓拿来用了。”她发现，长期在户外日晒雨淋的鼓在经过与自然的相处后，“生长”出了难以取代的声音。之后每做拟音，张笑晨总要去胡同里转转，看看有什么“破烂儿”可以捡。她向我炫耀一个沾着鸽子毛和蜘蛛网的花盆，是她从胡同大爷的垃圾堆里淘换来的。在一部欧洲动画电影的拟音中，这只花盆创造了老花农瑰丽花园里美妙又富有岁月感的声音质感。

实际上，张笑晨很年轻，是“95后”。不知不觉，她也是很有经验的拟音老人儿了。东西积累得越来越多，在录音棚或者剧场里，她总在想：如果手里的道具飞出去了，或者坏了，自己要用什么来替代它呢？“山芋吃不出土豆味儿啊，肯定的。”


（插图：豆角上台艺术工作室）

脑波音乐：听听大脑的旋律

记者 · 肖楚舟

大脑能够理解音乐、创作音乐，但少有人把大脑本身理解为一种乐器。在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合作下，听不见的脑电波可以被“翻译”成乐曲，它是一种脑部活动的记录方式，也能成为音乐家的灵感来源。聆听他人或自己的脑波，就如同在灵魂内部航行。

把大脑当作乐器

想象你的大脑是一台不知停歇的留声机，思绪是唱片上的纹理。唱针划过，读取你的想法与情绪，喇叭里流出变幻莫测的乐曲。沉闷的鼓点，几个循环小节，一段激扬的快板，它们意味着什么？是大脑在放空，凝神，或者犹疑？是你的脑波决定了乐曲的走向，还是乐曲在牵动脑波的起伏？

第一次听到吴丹制作的脑波音乐，这些问题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在咖啡馆嘈杂的背景音乐中，脑波敲出的不规则曲调异常鲜明，音符像跃出水面的鱼一样跳进耳膜。那是一种背离日常音乐规律的曲调，旋律总向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勾着人竖起耳朵。吴丹告诉我，这是一位实验对象睡眠状态下的脑波。我心里想，那他肯定在做一个奇异的梦。

吴丹是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的副教授，硕博阶段加入电子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脑信息科学专家尧德中教授的团队研究脑波音乐技术，主要研究如何找到合理的算法，将人耳听不见的脑电波转换成可听的音乐。近20年研究过去，吴丹觉得，大脑与音乐的互动机制里还有很多未知的部分。

大脑与音乐的关系是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长期关注的话题。一个方向是由外向内，研究大脑对音乐的反应，比如绘制“音乐大脑”地图，明确究竟哪些脑区参与音乐欣赏活动。另一个方向是由内向外，通过脑电信号（Electroencephalogram，简称 EEG）的“可听化”处理，探究大脑自身的音乐性以及其中的科学含义，“脑波音乐”就属于这一类。

“尽管科学家利用信号处理和计算机等领域的各种算法，发现了一些大脑特定状态的参数或者模式，但直到现在仍然无法真正解密复杂的大脑活动。”吴丹解释道，“脑电信号是人脑神经元活动的综合表现，而音乐又是人脑智力活动的产物。我们已经知道人脑在聆听音乐时会发生显著变化，也想知道大脑的频率是否有音乐性，以及这两者之间有没有相关性。”

大脑无时无刻不在发出电波信号，我们却从没有真正“听见”过自己的大脑。这是因为脑电波是一种非常微弱的低频电磁信号，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频率在0～30赫兹之间，跟人耳能听见的区间相去甚远，脑波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经过多级放大才能被观察和记录。

如何让大脑的声音传入耳膜？这首先是个数学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把脑波频率翻倍，即倍频，但吴丹告诉我，倍频后的脑电波“类似收音机发出的杂音，很难称之为音乐”。进阶一点的做法，是将脑波的波长和频率等信息与音乐中的乐音（如 do、re、mi 等）直接对应，这样制作出来的声音有基本的乐音属性。

吴丹提出的方法，是利用脑波和音乐共有的特质“标度性质”（Power Law）制定一种编码策略。“标度性质”是几乎统率整个自然界的非线性动力学规律，指两个相关量之间存在特定的指数关系。自然界中的河水涨落、地震波都满足标度性质，人脑在听到音乐时，听觉神经元的放电频率和放电间隔，以及人脑产生的电波频率也都符合这一规律。

音乐是人脑的产物，它的波动也存在类似的规律。德国物理学家费希纳（Fechner）发现，但凡人脑感觉悦耳的音乐，其音高和频率、音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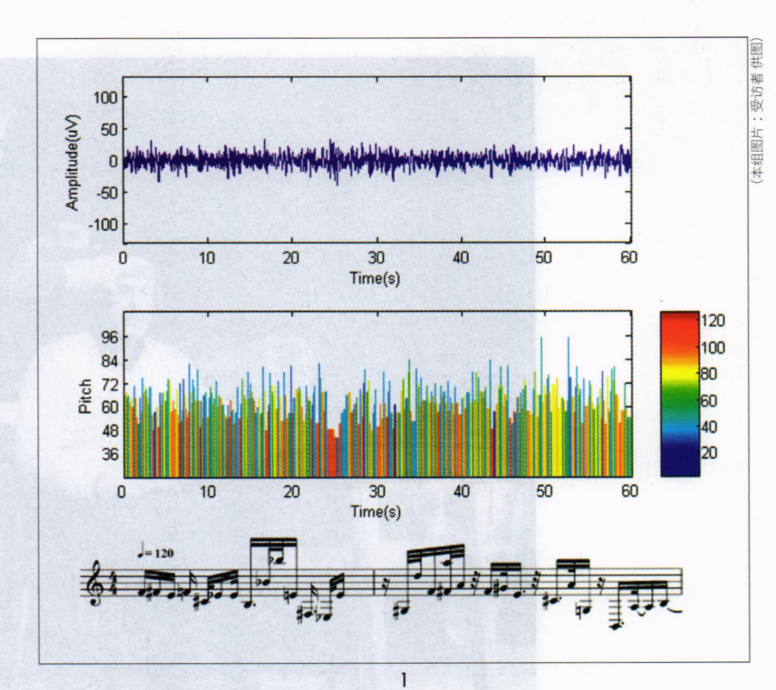
和声压的关系都遵从一种指数关系，即声音要达到一定的变化幅度才能引起人心理上的触动，这是物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结论。此外，作为人类信息交流信号的音乐还符合语言学中的“齐夫定律”（Zipf's Law），如果把乐音的不同音高、音长、音强的音符视为“词语”，那么可以看到在各种不同类型或风格的音乐中，这些元素之间也存在指数关系。

总而言之，“音乐之所以能取悦于人，原因在于人体与音乐受同样的自然规律支配”，这就是脑波和音乐能够相互对应的数学基础。利用脑电信号和音乐都符合分型标度性质的规律，吴丹建立了一套映射规则，把脑电信号里的振幅、周期和平均功率等特征，与音乐的音高、音长和音强一一对应，将脑波翻译成包含基本音乐要素的 MIDI 文件，再利用计算机自动作曲，制作成听感更丰富的乐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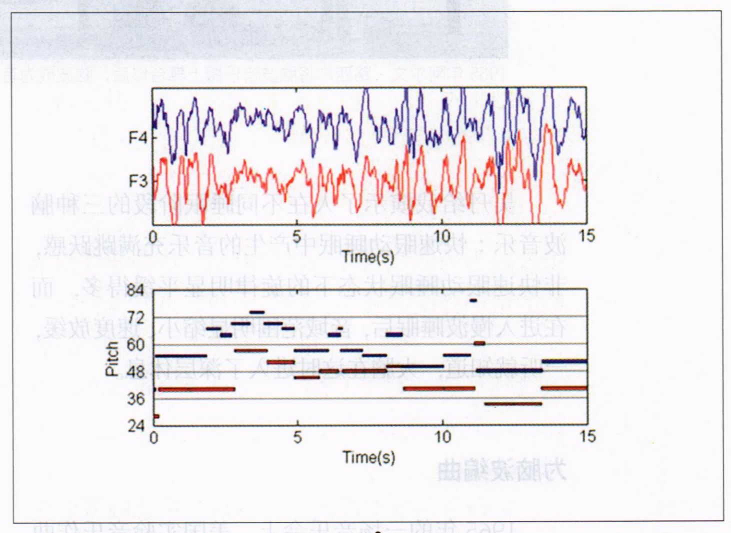
具体来说，乐曲里的音高是由乐器的振荡频率决定的，二者符合固定的数学公式，把大脑看作乐器，把脑波振幅看作乐器震荡的频率，用同样的公式代入，就可以得出对应的音高。在这种计算法则下，剧烈的大脑活动会生成音高较低的音符，恰好符合此时大脑神经元一致性不高、脑波振幅低的情况，反之亦然。类似地，脑电数据的周期与音长对应，而脑电波的功率大小和音强对应。大脑活动强烈时，脑电波变化频率快、功率大，对应的乐曲节奏快、音量大，刚好也符合人们对剧烈活动的听觉想象。

这只是脑波音乐转换方式中的一种。脑波的各种转译方式之间并无高低之分，主要是在可听性和还原性之间取一个恰当的平衡。随着算法和自动作曲方法的丰富，科学家们可以自行在脑波和声波之间建立各式各样的映射关系，还可以加入大脑的功能磁共振信息（fMRI），把人脑的情绪波动叠入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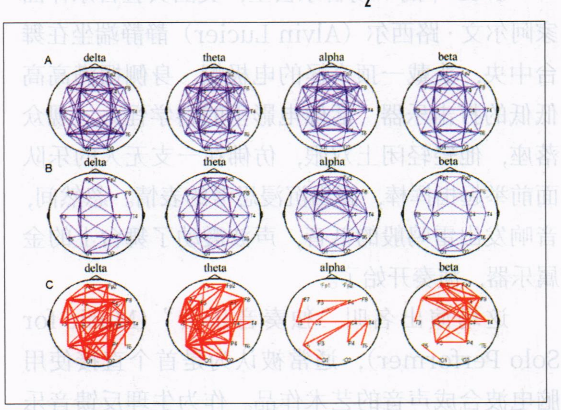
（本组图片：受访者 供图）



1



2



3

1. 将脑电信号的振幅、周期和功率转换成音乐里的音高、音长和音强，我们得以“听见大脑”

2. 经过数学计算，脑波与音符一一对应

3. 观察脑部电极信号，可以看出脑波音乐对大脑网络产生的影响



1965 年阿尔文 · 路西尔将脑波音乐搬上舞台以后，脑波成为音乐家的新灵感来源

吴丹给我演示了人在不同睡眠阶段的三种脑波音乐：快速眼动睡眠中产生的音乐充满跳跃感，非快速眼动睡眠状态下的旋律明显平缓得多，而在进入慢波睡眠后，音域范围明显缩小、速度放缓，一听就知道，大脑在这时进入了深层休息。

为脑波编曲

1965 年的一场音乐会上，美国实验音乐作曲家阿尔文 · 路西尔（Alvin Lucier）静静端坐在舞台中央，头戴一顶奇怪的电极帽，身侧摆满高高低低的打击乐器，活像电影里的科学怪人。观众落座，他轻轻闭上双眼，仿佛在一支无人的乐队面前举起指挥棒，露出沉浸思考的表情。忽然间，音响发出雷鸣般的低音，声波震动了舞台上的金属乐器，演奏开始了。

这场演出名叫“独奏音乐会”（Music for Solo Performer），通常被认为是首个直接使用脑电波合成声音的艺术作品。作为生理反馈音乐的早期实践者，路西尔使用的方法非常原始：连在头顶的电极实时收集他的阿尔法脑电波（频率在 9 ～ 15 赫兹之间），发送到放大器上，然后使用滤波器过滤杂音，再由助手传送到连接在各种乐器上的扬声器里面，用这些巨大低沉的声波奏出一首金属打击乐。

在路西尔之后，脑波成为音乐家们新的灵感来源，脑波音乐的风格也随着算法和设备的演进不断翻新。如果说脑科学家对脑波的翻译只是一种脑电记录方式，那么作曲家基于脑波的再创作，就是在科学数据中寻找艺术的可能性。

斯坦福大学音乐系教授、大提琴家克里斯 · 沙弗（Chris Chafe）乐于搜集各类自然界中的数据信号，并用计算机算法对它们进行“可听化”（sonification）处理。2013 年，他和脑神经科学家约瑟夫 · 帕维奇（Josef Parvizi）开始合作开发一种用于反馈癫痫病人脑电波的设备“大脑听诊器”（Brain Stethoscope），克里斯负责将设备收集的电波信号转换成音乐。

在采访中，克里斯向我介绍了过去他制作过的“可听化”项目，其中大脑发出的声音具有格外奇妙的质地。他用两个关键词形容脑波信号的特殊之处：节奏（rhythm）和纹理（texture）。“节奏对我来说是音乐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节奏，变化急剧又随机。其次是纹理，脑波的质感就像许多个音乐家在合奏，有时它们发出的声音完全同步，有时各自在独立的方向上运动，这时仿佛有各种完全不相干的音乐类型同时向你袭来，有时又只有一个声音旁逸斜出，形成它的独奏。”

吴丹说，脑科学家给音乐家提供的脑波数据不是一条单声道音轨。克里斯和约瑟夫的实验中使用的是癫痫病临床治疗的深度电极，针头直接插入大脑内部，能同时获得100多个不同的声道。而吴丹在自己的实验中，也需要使用多个电极收集不同脑区的信号，大脑在同一时刻发出的信号相当于一支没有指挥的交响乐团。

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杨华曾和吴丹合作处理脑波音乐。她第一次收到吴丹用脑波信号转换的MIDI文件时，觉得在音乐性和表现力上不大行。她通过音乐分析，把占主要地位的音高和节奏标注出来，再对它们进行强化和凸显。这个过程类似破译密码，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找到最适合的解法，“比如有的采用和声分析的方式，有的从音级集合的角度分析，有的适合从节奏紧张度角度，有的可能从音高上用十二音的方式去看更合理”。

下一步是为大脑的乐谱配上乐器。在杨华的工作中，为不同音区、节奏的脑波寻找合适的配器表达是最繁重的工作。独奏、室内乐、交响乐，偏古典的管弦乐、民族乐器，或者偏现代的电子乐，每一颗大脑都有它最适合的音乐风格。一位癫痫病人的脑波让杨华印象深刻。“那仿佛是一个人类作曲家的作品。作曲家写作音乐的时候，是考虑呼吸性和句法的，癫痫病人的脑波就有这样的周期性结构特征。”这段脑波被她划分成一个个单元，根据节奏和音高的关系，分别配上颤音琴、钢片琴、长笛、弦乐和一些电子音色，制作成一段迷幻的混合音色音乐。

同样处理过癫痫病人脑波的克里斯选择使用人声来体现大脑的异动，“因为脑波是人体发出的信号，我认为也应该用一种人类身体产生的声音来表现”。克里斯珍视这种内在音乐带来的“共鸣”（empathy），他告诉我，谱写脑波让他获得了完全地理解他人感受的机会，“病痛是完全个人化的体验，谁也无法用语言描述他正在经历什么，但声音可以告诉你，此刻一个人脑中发生的一切”。

克里斯把音乐家处理脑波的过程比喻为摄影中的显影，“就像在暗房里洗照片，底片携带的信息不会更改，区别只是我们选择强调哪些信息，加强某些部分的对比度，让它们能够更为明确地凸显出来”。在克里斯的实验视频最后，你能听到这段音乐——悠长的颤音和密集的呼啸相互映衬，紧张、神秘与亢奋感扑面而来，如果非要形容，那有点像原始部落的住民在月光下呼唤灵魂。

2001年，路西尔在采访中回忆起当年的脑波音乐会。他当时正被创作枯竭的焦虑困扰，上台前一天他问制作人员需要创作一首多长的曲子，对方告诉他“40分钟”。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我是个作曲家，得为这40分钟构思出某种结构。接下来我明白了，我不必制造结构，脑波是一种自然现象，我要做的就是让它自由流淌”。

随着脑电波采集技术的进步，脑波设备的外观越来越轻巧好看，更加适用于现场演出。韩国艺术家朴丽莎（Lisa Park）做过一场名为“Eunoia”的表演，这个词语的意思是“美好的思绪”。她头戴一只类似小型麦克风的装置，身穿白裙端坐在几只金属水盆中间。室内的音乐随着她的大脑活动变换，乐声又在水盆中激起涟漪，将艺术家神秘莫测的思维转化为可视可听的存在。

未来我们能在音乐厅里听见更精彩的大脑音乐会吗？在音乐家的想象中，那应该是一种即时性、交互性的审美体验。克里斯强调它是流动的，

“病痛是完全个人化的体验，谁也无法用语言描述他正在经历什么，但声音可以告诉你，此刻一个人脑中发生的一切”。

目前的实验反馈显示，人在聆听自己的脑波音乐时的确感觉舒适。

“未来我们可以利用成熟的干电极技术，让一个人的大脑像乐队一样开演唱会，电极移动到哪个脑区，就播放哪个区域的声音”。杨华和电子科技大学的脑科学家则在筹备一场充满互动的脑波音乐会，“我们构思的现场有演奏者、作曲家和听众三类人，每个人都戴上电极帽。三类人的脑波实时生成乐谱信号，作曲家根据脑波所产生的乐谱信号进行实时处理，演奏者现场演奏，听众聆听，在这个过程中收集三个人群的脑电波，再循环反馈，形成一个脑波闭环”。

做大脑的听众

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走廊上等待一个小时后，我终于戴上了由16个小圆片和电线串成的电极帽。助理研究员王久菊告诉我，春天是抑郁症多发的季节，并不宽敞的走廊被病人挤得水泄不通，希望加入实验组的病人等待的时间也比平时长。

我拿起手机给自己照了照镜子，想起在舞台上表演脑波打击乐的路西尔。隔着头发，电极很容易松动，我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晃晃脑袋就会发出杂音。医生给我依次测试了观看闪动图片、睁眼、闭眼时的脑波作为基准线，接着播放三段不同的音乐。小小的实验室里，没有人说话，我仿佛听见自己大脑飞速转动的声音。

脑波音乐疗法也是吴丹与王久菊所在的课题组合作开展的项目，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团队的期待是脑波音乐能用于抑郁症临床治疗。对抑郁症患者来说，药物治疗是首选，但对于抗拒服药的患者，非药物治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脑波音乐的优势在于个性化、低成本，适合居家治疗。”王久菊说。

音乐疗法在心理学领域已经发展多年，用于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症等脑部相关疾病的辅助治疗，常见的做法是由治疗师或患者选择自己喜欢的普通轻音乐来对大脑施加影响。王久菊和同事们觉得，人脑自身产生的音乐或许会对大脑产生更明显的引导和治疗作用，这种可能性令人期待。

抑郁症是一种与大脑认知相关的疾病。具体到对音乐的反馈上，正常人听音乐时主要是右脑产生反应，抑郁症患者听音乐的时候脑区反应会发生偏移。在恰当的音乐引导下，目的是能让他的大脑反应区域回归正常，这个回归的幅度被称为“偏侧化指标”。除此之外，情绪也会反映在脑电波信号上。这些数据能够比较明确地反映出抑郁症患者的症状轻重。

王久菊的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集病人听各类传统音乐时的脑电数据，综合主观量表、偏侧化指标等数据，选出大脑反应最佳的一段脑波，编成乐曲让病人反复聆听，相当于每天服下一粒“音乐药丸”。第一期实验结束时，一般病人都感觉症状有所缓解，此时医生会再为他采集一段脑部状态良好时的脑波，作为日后可以反复使用的“处方”，借此再进行第二期的长期追踪，观察脑波音乐的疗效。

目前的实验反馈显示，人在聆听自己的脑波音乐时的确感觉舒适。王久菊推测，“人根本上还是自恋的，对自己身体的节奏可能比较了解，也容易接受”。跟大众化的轻音乐疗法不同，脑波音乐带有个人定制的属性，至少从感情上来说，患者不会排斥对自己生病的大脑多一点了解。

除了在抑郁症治疗方面的探索，脑波音乐还可以有更直接的用途，比如实时脑波监测。吴丹解释，“就像心电图检测仪能发出报警声，我们也希望脑波音乐能即时传达病人的脑波异常”。她的设想和克里斯与约瑟夫的癫痫病脑电波检测设备不谋而合，尽管现有的医疗仪器已经足够反映脑部活动图像，但音乐与图像相比具有独特的表达优势。克里斯给我解释了其中的微妙区别，“音乐是基于时间的信息传达。给你一张静态的图表，你可以一眼看出数据曲线的走向趋势。但如果让你去聆听这段曲线，你必须通过时间的推移去慢慢获取它的全貌，中间有高低起伏、音调变化，



（黄宇 摄）

在医疗领域，研究者期待脑波音乐能应用于脑部疾病的监测和治疗

让你随着它的流动产生情绪反应。”

对音乐的感受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人耳或许比双眼更擅长捕捉微小的变动。克里斯和约瑟夫的团队曾找来一批未经训练的医学生作测试，在不懂得阅读癫痫病人脑波图的情况下，能靠脑电图判断癫痫发作的学生只有50%，而依靠听觉，准确率能达到97%。从这个角度讲，耳道的确是一条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灵魂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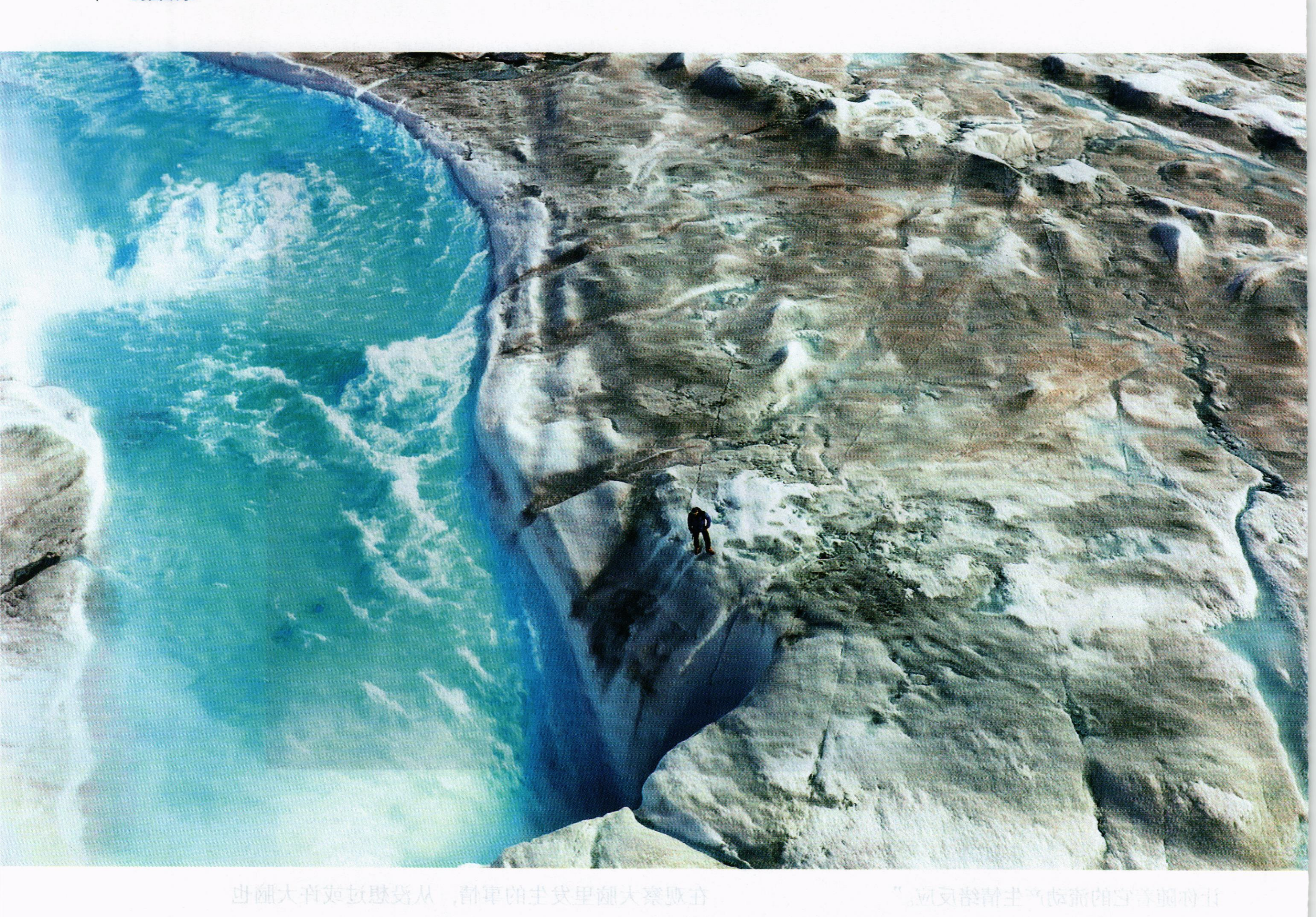
“我问自己，如果没有语言的发明，没有词语，没有对思想的分析——音乐是不是可能存在的精神之间交流手段的唯一例证。”普鲁斯特这样提醒我们。音乐不只是一串音符的编码，它还是人类心灵与思维的另类表达。作为人体最精密部位的律动，脑波音乐中或许藏匿着关于我们自身的奥秘。

克里斯在采访中对我谈起约瑟夫邀请他开发脑波音乐的契机。那是一场名叫“Sun rings”的音乐会，艺术家把“旅行者号”（Voyager）探测器在宇宙中穿过时引起的等离子波动数据转换成音乐。约瑟夫在现场忽然得到了灵感，“我每天都在观察大脑里发生的事情，从没想过或许大脑也和宇宙一样，有自己内在的音乐”。

采访次日，我收到了自己的脑波音乐，开始带着好奇去探听从未了解过的一部分自我。医生将我的脑波声轨与巴赫《勃兰登堡协奏曲》第五首的片段混合在一起。金属质感的脑波音轨任性地闯入和谐明快的交响乐，像是钢琴家的琴键上有只猫在来回走动。一两分钟后，乐曲从欢快的快板进入抒情的中板，脑波也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晃悠起来，随后逐渐与巴赫的音乐产生了配合，趋于平缓低沉，直到完全没入乐队的演奏中。

王久菊告诉我，我的大脑在听巴赫的时候状态最佳。这个结果让我有些意外，在实验现场，我分明感觉听到中国民乐演奏的角调时心情最为舒畅，而大脑却选择了巴赫。不要说与他人交流，我们甚至难以和自己的大脑沟通，真是有趣又残酷的事实。

（参考文献：吴丹，《基于脑电的脑波音乐研究》《无标度脑波音乐研究》；米歇尔·罗雄，《音乐与大脑：艺术与科学的奇妙旅程》）



冰山之声

主笔·苗千

无论是通过冰川的断裂形成冰山，还是冰山在温暖海域中最终融化，这些冰震现象都可能在海面以下造成巨大的声响。

海明威认为，作者只应描写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水下部分则应该通过文本的提示让读者去想象补充，“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这正是这位著名作家关于写作的“冰山原则”。当人们看到浮于海面之上的冰山，固然可以去想象其隐没于海面之下更为庞大的部分，但是人们对于冰山在海面之下可能发出的震撼声响，就很难通过想象去感受了。

广阔的海洋内部绝非一片宁静，其中充满着各种声音。相比于空气，水更易于传播声音，因此有些声响甚至可以在海洋中传播数千公里。人类探测海洋内部声音的历史源于“冷战”。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在海中设置声音探测装置，以防敌对方的潜艇接近。

1997年夏天，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NOAA）的研究者们在南太平洋监听水下火山活动时，意外探测到一种非常强烈且遥远的超低频声音信号。因为是在数千公里之外探测到的信号，人们猜测发出这种声音的物体应该十分庞大，进一步推测其可能来源于某种发动机或者神秘的海洋生物。当时人们给这种神秘声响起名叫作“海



左、右图：纪录片《冰冻星球 2》剧照

洋怪声”(bloop)。而直到2005年研究者们才明白，这种震撼性的水下声音来自南极冰山的断裂和破碎，为之命名“冰震”(icequake)。

所谓冰震，指的是冰或者处于冰冻状态的岩石忽然破碎所产生的震动效应。与地震类似，这种现象会释放出大量能量，并产生震动波在冰的表面传播，这种震动会被地震探测器记录。冰震被视为地震的小兄弟，它可能在海底世界制造出震撼的声响，但绝大多数的冰震和地震一样，是微小且难以察觉的。在南极大陆的冰盖上，有少量相对快速移动的冰层被称为“冰流”(ice stream)，它们的移动会制造出微小的冰震。科学家正是通过收集它们释放的冰震信号来了解冰流在冰盖上的移动，并最终进入海洋的过程，从而预测海平面的上升情况。

冰震也不一定只发生在海洋。2018 年，在远离海洋的加拿大阿尔塔省，一个湖泊的冰面就因为极端天气发生了冰震，其产生的地震波对附近的一些房屋造成了损害。而如果是极地区域的巨大冰块发生了断裂，脱离冰川坠入海中发生冰震，其产生的震动会在空气、冰层以及海水中传播。人们通常只会注意到冰震发生在海面以上的部分，科学家们则需要在这三种介质中分别进行探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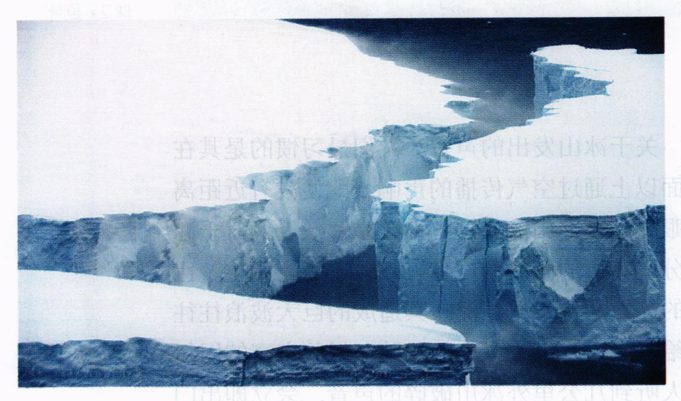
关于冰山发出的声音，人们最习惯的是其在海面以上通过空气传播的声响。即便没有近距离亲眼见到过冰山，通过各种纪录片，人们对于冰山分崩离析的画面和声音应该也不觉得陌生。巨大的冰震通常不可预测，其造成的巨大波浪往往会给附近生物带来极大的危险。经验丰富的因纽特人听到几公里外冰川破碎的声音，会立即出门保护好他们的船只，因为即将到来的巨大海浪有可能摧毁停在海中的船只。

在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两季纪录片《冰冻星球》(*Frozen Planet*)中，动物是其中主角。不过在关于极地的部分中，冰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纪录片的制作者拍摄了大量关于冰川断裂、冰块坠入海中形成冰山，以及冰山漂到温暖的海域最终崩溃融化的镜头。片中的声音大多录制于海面以上。如果极地区域的冰山大量减少甚至消失，当地动物的栖息地必定会大幅减少，生存模式也不得不发生变化。不过冰山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远非这么简单——其中的关键部分可能也与声音有关。

与写作的“冰山原则”类似，冰山最有价值的声音信号也是来自海面以下。无论是通过冰川的断裂形成冰山，还是冰山在温暖海域中最终融化，



上、下图：纪录片《冰冻星球 2》剧照



这些冰震现象都可能在海面以下造成巨大的声响。目前科学家主要利用卫星对冰山进行监测，但卫星只能观测到冰山较大规模的变化，却忽略掉更为细微的变化。通过分析在水下收集到的冰川声音信号，科学家已经可以判断出冰川发生断裂的不同阶段，再结合影像数据，便可以判断出究竟有多少冰进入海洋，从而分析其对于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因为传播的介质不同，我们很难去想象冰震在海水中产生的巨大声响，即便是听到水下麦克风的录音，恐怕也会有极大的失真。有研究者全程监听了一座冰山从诞生到最后消亡的全过程。巨大的冰块发生断裂脱离冰川，与海床发生摩擦最终形成浮于海面的冰山，所造成的巨大声响能够达到 4 级地震的效果——有人形容其音质类似于低音提琴，也有人认为更像是高速公路的噪音。冰山在诞生之初的声响固然巨大，在温暖的海域中最终崩溃融化的声响同样令人震撼，有人将其形容为“数百艘超级巨轮一齐驶过的声音”。

冰震在海面下产生的巨大声响很可能对那些需要通过声音定位和交流的海洋动物造成极大影响。2019 年 7 月，一组科学家在格陵兰鲍登冰川（Bowdoin Glacier）记录了因为冰川断裂所产生的冰震。这次冰震分为两个阶段，总共持续了 30 分钟，其声音能量达到 10^8 至 10^{10} 焦耳。科学家分析，这种声音是北极地区可能产生的最大声响之一，其能量足以对附近生活的一角鲸、海豹等哺乳动物造成永久性听力损伤。

人类对于冰震的研究刚刚开始。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逐渐加剧，会有越来越多的冰川发生断裂，形成一座座浮于海面的冰山，最终又会消融在海洋中，造成海平面上升。海洋将会变得越来越喧闹，而其影响的也绝不会只是那些依靠声音交流和定位的海洋动物。

〔本文写作参考了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冰冻星球》（*Frozen Planet*）、阿尔伯塔大学网站以及相关媒体的报道〕

声音就像一个时间机器

记者 · 艾江涛　摄影 · 蔡小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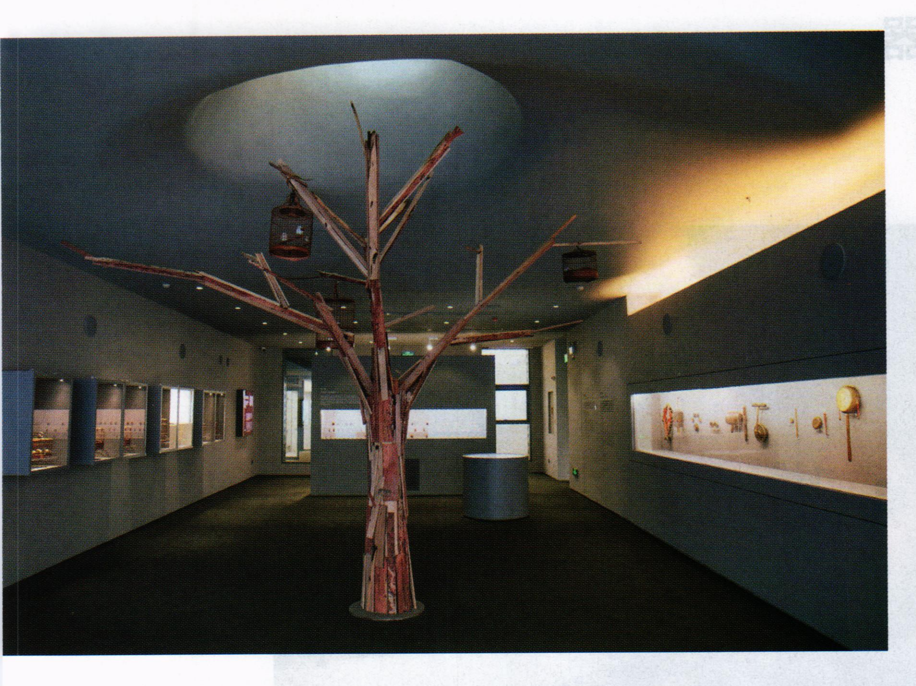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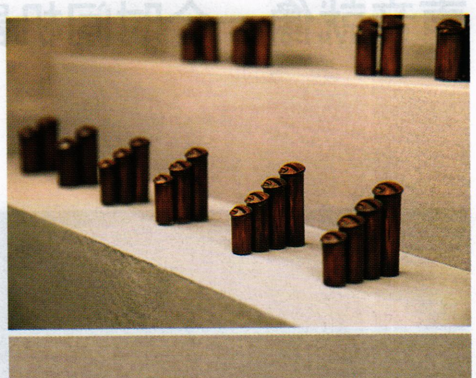
艺术家秦思源在宋庄的声音博物馆

“声音就像嗅觉一样，具有召唤过去体验的力量。如果我们可以还原记录各种以前的声音，属于每个人的个人历史，而非宏大叙述的历史便被召唤出来。”秦思源说。

两年前，艺术家秦思源与洪峰一起，在北京宋庄筹建了声音博物馆，今年5月份计划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老北京的声音，是博物馆常设展里最重要的展厅，也是秦思源在过去十多年里搜集录制声音的成果。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整面墙上投影的一幅幅老北京风俗画，空间里混杂着叫卖、响器、鸽哨、驼铃、爆竹声等充满市井生活气息的老北京声音。秦思源介绍说，风俗画的时间场景是在清末民初，参考的是他外祖母、作家凌叔华为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1969年出版）所画的插画。

秦思源最初注意到北京的声音，是在2004年，当时他还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工作，策划了一个“都市发声”的艺术项目。中英混血的秦思源对北京并不陌生，8岁到12岁时，他曾在北京什刹海体校学习武术，20岁出头时，又回到北京待了4年，后来长期在北京生活。他为那个项目邀请了一批英国艺术家体验北京的声音环







左图：木制装置《京城混合树》，代表老北京胡同的绿色文化

右上图：联筒类鸽哨

右下图：葫芦类鸽哨

境，创作了一些与社会互动的观念性作品。2013年，凌叔华曾经生活过的老宅被改建为史家胡同博物馆，秦思源受邀参与策划，他为此又重听了一遍2004年艺术项目的作品。“听到英国艺术家彼得·科萨克（Peter Cusack）随手录下的一段出租车打表的声音，一下蒙了，觉得太厉害了，声音就像一个时间机器，瞬间把人带回一个不同的时代。”秦思源决定在史家胡同博物馆做一个“胡同声音”的展厅，用声音记录北京的历史。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到老北京叫卖与游商文化中的响器。

叫卖或者吆喝，原本是过去出没于北京胡同中的行商走贩，为了使住户听到，大声吆喝所售货物或服务而来。随着历史积淀，逐渐形成极富辨识度的韵律和腔调；在时代的变化中，又逐渐消失在日常生活中。做“胡同声音”项目时，秦思源认识了收藏家、叫卖艺人阿龙（宋振忠）。“阿龙的贡献是把所有叫卖整理成一个系统，可以表演可以教育，他还收藏了过去游商所有的响器。”响器与叫卖，同为游商文化中的声音广告。大部分的货声以吆喝叫卖为主，有的货声则只用响器的声音做广告，有的需要结合叫卖。“老北京的声音”展出的响器，都来自阿龙。诸如剃头匠用的“唤头”、货郎所用的“惊闺”、郎中用的“虎撑子”、卖香油用的“梆子”等，过去都属于所谓“八不语”之列。

秦思源根据网上找到的资料图片，逐一请阿龙辨认讲解。这些响器的声音，还有录制的阿龙的几十种叫卖声，成为仅6平方米的“胡同声音”展厅的主要声音素材。

尽管接触了不少叫卖艺人，可在秦思源看来，脱离具体环境的叫卖表演缺乏真实的气息与悲苦之音。他一直在寻找当年真实的叫卖声，直到2019年认识了当时已经94岁的杨德山。

“十多年前，在天坛公园有一拨老人组成的以叫卖为乐趣的小团体。我们一礼拜去好几趟，你也喊，我也喊，从早上8点多能一直喊到中午。杨德山和我就是在天坛公园认识的，他听到我们喊，说我有的是，你听听。杨德山的吆喝，就是我小时候听的味道，怎么听怎么舒服。”70多岁的张聚才说，“我们算街坊，杨老头，六七岁就跟着二叔推车卖东西，小孩子开始还不敢吆喝。一

天下来就挣俩窝头钱。”他把杨德山介绍给了秦思源。

秦思源花了将近三年时间录杨德山的叫卖。“一开始我带他去录音棚，他进棚有点蒙，忘了。后来就在他家里录，一到家，激情澎湃，特别想多说……他最长的一段叫卖，有1500多字。”断断续续，他录制了70多段杨德山的叫卖。

“来块凉来，你远瞧这西瓜近瞧块来，哎这切的都是冰糖疙瘩砂糖块儿，来正好吃来，两个大嘞！”在博物馆听着杨德山苍凉浑厚的叫卖声，秦思源不忘提醒我们：“这里的叫卖是卖西瓜块，不是整西瓜，要分清楚。”

2004年，秦思源带那批英国艺术家到北京公园记录声音素材时，他们便被充满生气的市井文化所震撼：“公园里面有口琴队，一个中年妇女在中间吹口琴，周围人跳舞；有说相声的、吹萨克斯的，还有遛鸟的、打鼓的、抖空竹的、玩鞭子的，特别嘈杂，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老人完全可以自由发挥他们自己。音乐家们看了特别兴奋，西方哪有这个？有钱的当然可以周游世界，没钱的只能在养老院看电视，慢慢植物化。”

但后来，他发现公园正在变得安静起来。很多老北京遛鸟遛的是野生抓来的小鸟，鸟市于是被关闭，遛鸟处于一种半非法的状态。唱京剧、玩鞭子，被认为是声音污染，渐渐离开了公园。养鸽子虽然从未被明令禁止，但不管是居委会还是物业，都觉得鸽子太脏不能在小区养，还有人觉得鸽哨扰民，北京最有标志性的鸽哨声日渐消失。2018年，秦思源发现在龙潭湖公园还能看到一些遛鸟的人，他在那里录制了画眉的叫声。对他来说，留下那些行将消失的市井声音，是因为那些声音寄托了普通人的情感。“我不是对声音敏感，是对他们身上的这种情感很敏感，这些市井的、老的、玩的东西所以珍贵，因为他们很纯粹，没有别的目的。比如一个朋友在葡萄牙的一家饭店吃饭，突然一帮人唱起来了，还有合声，他觉得仿佛进入天堂。欧洲以前就是这样的。我这一代人已经不行了，更年轻的更不行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这样，文化和生活已经分开。”

“跟拍电影不一样，台词安排好，后期可以做拟音。如果要录真正的声音，必须等待。北京那些声音，都是好几年才录下来的。”对秦思源来说，录制北京钟楼的声音，就来自偶然的机会。

铸造于明代永乐年间的北京钟楼大钟重达63吨，是世界上铸造最早、体量最大的报时大钟，但在1924年秋天之后，便停止了报时的历史功用。2021年春天，清华大学的项目团队被委托做一个钟鼓楼文化展览，他们找到秦思源，希望他提供一些叫卖吆喝的录音。作为交换条件，秦思源得到录制钟楼钟声的许可。令他吃惊的是，北京钟楼的钟声此前从来没被录过。为了这次难得的录音，秦思源专门花钱请了专业录音师，采集了很多点位。“钟楼的大钟，以十八下作为单元，慢十八、紧十八、不慢不紧又十八，三次一轮，共敲两轮一百零八下。鼓楼的敲法，以前也是这样。”一百零八下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清朝的报时方式，每天一更（19时至21时）与五更（3时至5时），先击鼓后撞钟，报时两次，维持着“晨钟暮鼓”的时间秩序。那次录制之后，钟楼的大钟就被严格保护起来了，秦思源的录音也成为目前为止唯一的声音记录。

秦思源还录制了地铁、公交车报站等普通人不太关注的声音。有段时间，为了增加社会互动，他参加了不少真人秀、综艺节目、电视纪录片的拍摄。他也被打上“老北京声音收集者”的标签。慢慢地，秦思源发现自己对网络流量并不感兴趣。对他来说，录音只是开了个头，他更希望以声音为平台，让人们关注声音背后的时代与文化。“同一个声音，对两个人可能意义完全不同，有意思的在于声音背后的故事。比如发动机的声音，你如果在城市里面听非常难受，就是噪音；如果在山沟里听则完全不一样，意味着有了电力。”秦思源说。

（感谢颜峻、阿龙对采访的帮助）

令他吃惊的是，北京钟楼的钟声此前从来没被录过。

为什么美国的通胀又开始反弹了？

主笔 · 谢九

去年四季度以来，美国的通胀开始见顶回落，市场以为美国的高通胀可能会一路下降，美联储的超级加息周期也将进入尾声。但是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通胀之战还远未结束。

2月24日，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月份的PCE物价指数同比上涨5.4%，远远超过了市场预期的5%，1月份的核心PCE物价指数为4.7%，也远远高于预期的4.3%。

PCE（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Price Index，简称PCE Index）的中文名称叫做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主要是用来衡量一段时间之内个人的消费支出，它和CPI一样，是美国最常见的两大通胀指标。普通民众更熟悉的是CPI，但是很多专业机构更关注PCE，因为美联储在判断通胀走势和制定加息决策时，往往更青睐PCE。

美国1月份的PCE大大超出市场预期，迅速引发了市场恐慌，当天道琼斯指数下跌1%，美元指数大涨，回到了105的近期高点，2月份以来美元已经从低点反弹了5%左右。

去年6月份，美国CPI指数一度达到9.1%的高点，引发了美联储持续大尺度加息。不过从去年10月份以来，美国一路上涨的通胀开始出现回落的迹象，当月CPI同比上涨7.7%，创下当时年内的最低增速，2022年的最后两个月，美国的CPI继续回落到7.1%和6.5%。进入2023年之后，美国的CPI继续保持回落趋势，今年1月份的CPI同比增速为6.4%。

从去年9.1%的高点快速回落到6.4%，市场普遍认为美国高烧不退的通胀终于迎来了拐点，美联储加息的力度也从75个基点逐渐放缓，今年2月份的加息只有25个基点。市场的情绪更加乐观，认为随着通胀降温，美联储甚至可能会转向降息。美元指数迅速回落，从114的高点一度跌到100，最大跌幅达到了13%。

但事实证明，美国通胀的复杂性远远超出预期，通胀降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美国的就业市场先发出了信号。

今年2月初，美国劳工局公布1月份的就业数据，强劲的就业增长让市场开始意识到，美国的通胀降温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美国1月份的非农新增就业人数达到了51.7万人，远远超出市场预期，在此之前，市场普遍担心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预计1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只有18.5万人，而实际就业人数几乎是预计的3倍。

强劲的就业数据同时也让美国的失业率保持在低位，1月份的失业率只有3.4%，创下50多年来的新低。美国总统拜登对此表示，“这是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就业增长，54年来最低的失业率”。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就业增长是经济繁荣的表现，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看，强劲的就业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就业市场的紧张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者的工资就会随之上涨，今年1月份，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薪同比增长4.4%。劳动力工资上涨，一方面意味着民众有了更强的消费能力，最终会转化为消费市场的购买力，进而助推物价上涨。同时，企业向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最终也会将成本转嫁到商品上，进而抬高物价指数。

从更深层面来看，劳动力市场就业强劲，说明经济形势向好。经济增长和通胀存在正向关系，当宏观经济增速提高，通常也会伴随着通胀上行，所以当前美国就业市场的强劲，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国经济的状况。

在经过了一年的大幅加息之后，市场普遍预计今年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风险，但是美国1月份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经济衰退的程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可能只是一次时间较短的浅衰退；还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并不会硬着陆，甚至可能不着陆，也就是说，尽管美联储持续加息对抗通胀，但是美国经济始终没有放缓，就业和通

胀等数据一直居高不下，这就会使得美联储不得不重新采取更鹰派的立场，加息的幅度可能会高于预期。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而言，这可能是当前最担心的问题。

最新公布的PCE数据显示，1月份的核心PCE远高于预期，也和之前美国强劲的就业数据形成了印证，说明美国的通胀降温并没有如市场原先预计的那么乐观。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虽然美国的通胀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回落，但是通胀的韧性依然很强，并不会出现自由落体直线下降的趋势。

去年四季度以来，市场的投资逻辑开始发生重大转向，以美国通胀下降为基础，投资者开始提前下注美联储加息放缓甚至降息。今年2月份，美联储实施了年内首次加息，加息幅度为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提升到4.5%～4.75%。按照市场原先的预计，美联储最多还有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将利率提升到5%左右之后，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可能会转而降息。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去年四季度以来，美元大跌，美国股市和黄金价格上涨，去年10月份到年底，道琼斯指数反弹了近两成。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通胀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市场上的投资逻辑也开始重新定位。过去很多投资者都在下注美联储降息，而部分先知先觉的投资者已经开始反向下注，预计美联储的加息会大大超过市场预期，甚至可能会达到6%。部分知名的大空头公司开始提前做空，美国股市也终止了反弹的步伐，年初至今下跌了近4%。

在此之前，美联储加息到6%被很多人视为疯狂，这会对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随着近期美国通胀数据抬头，美联储加息到6%的概率大幅上升，如果美联储最终加息到6%的高点，提前布局的大空头们将会赚得盆满钵满。按照美联储的时间表，今年3月份还会有一次议息会议，市场原本预计可能会按照25个基点的力度加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50个基点的加息力度。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如果美国通胀反弹超出预期，对于股市、汇市等方面的资产配置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汇市，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经过了去年年底的下跌之后，最近再度回到了7元大关附近，年内涨幅已经接近5%。

沈阳伤医案调查

记者 · 魏倩

枪响之后，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打碎了另一个人的身份。

九楼

在北陵大街上，你不能随便停车。这儿是沈阳南北中轴线“金廊”的起始路段，也是城市金融区（CBD）与省级政务区的交汇处。从省公安厅一路往北，经过气派的大商场“沈阳天地”、包红色LED屏广告的写字楼，不到半小时，就能走到辽宁省人民政府大楼，然后是始建于300多年前的清昭陵。

当然，在这条路上，任何人都不会错过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那幢有着白色外墙的15层住院部大楼，上面竖有2米多高的楼宇立牌，小心绕过翻修建筑围挡，旁边是只比它稍矮一点的医院门诊部。每天清晨不到8点，大厅已是人挤人。

在飘满艾灸味道的大楼里，和人群一起绕着蛇形围栏排队，坐电梯一路上行到9层，右转是医院脾胃科——这家医院的重点科室之一，2月中旬刚刚获得2022年度全国中医医院学科学术影响力第8名。工作日上午，走廊里的候诊椅坐得很满，诊室门前的电子屏显示坐诊医生的正装照片，下方滚动着患者排号。每天早8点到晚5点，它们会一直亮着。

9号诊室除外。2023年2月2日之后，这里的电子屏就一直没再亮。这间诊室属于科主任白光。

事发突然。2月2日——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6天——上午9点53分，诊室门开着，白光和往常一样面向门口等待患者，一名没有挂号的男子猛地冲进诊室，用一把手持射钉枪迎面击中了他。“枪钉直接打进医生的眼睛里，血崩了我一身。”一位目击者正好从走廊里经过，震惊之下，她本能地逃开，后来发生的事情回忆起来都是断断续续的：科室乱作一团，有护士躲进楼体另一侧的卫生间，也有人立刻报警。听到尖叫，医生们从各自诊室里跑出来，赶紧把患者疏散到电梯口。

袭击者没有逃窜，随后赶来的警察控制住了他。白光则被立刻推进急救室，到当晚8点仍在抢救。该院一名医生翻拍了他的头颅核磁平片，右眼位置的颅骨已完全缺损，额枕贯通伤，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抢救难度很大。当晚院里就有传言他“不幸去世”，但又很快被辟谣，“命保住了，但生命体征靠机器维持”，“情况不乐观”。

医生

受伤前，白光是个挺“利整”的人。在沈阳人口中，那是干净、讲规矩的意思。直到今天，他的照片还挂在医院大厅扶梯旁“科室专家简介”的棕色展板上。他方圆脸，短发，戴眼镜，抿嘴，睁大眼睛，穿一件长袖白大褂，显得权威而精神。照片下面是他的姓名、职位，还有他最擅长治疗的病种：消化系统常见病和疑难病，慢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食管返流病，溃疡性结肠炎，胃肠道肿瘤术后调理……那是他迄今54年人生的奋斗成果。

除了外表，勤奋是白光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他每周二、四出门诊，总是第一个开诊室的门，有时候上午患者太多，全部看完得到下午两三点钟，午饭就在科里随便对付一顿。科里下班晚的同事也总能看见他诊室的灯到晚上6点还亮着。门诊结束后，他还要去住院楼的病房再转一圈才回家。一位在科里住院的老患者是这样发



（插图：老牛）

现他“出事”的：“我就问护士，怎么这段日子都看不见你们主任来病房了？”

在伤医事件发生前，勤奋给他的人生带来的是完全正向的影响。他 1992 年考入辽宁中医学院（现在的“辽宁中医药大学”），1996 年读研究生，毕业后就在其附属医院工作，算起来已经在科里待了 24 年。这期间，他拜中医药管理局评出的“第三届国医大师”周学文为师，后来又考了本院的博士，开始自己带硕士生。

白光尤其擅长治疗溃疡性结肠炎，被不少患者认为是“省内顶级专家”。一位查出这种病的沈阳本地患者在腹泻近 20 天后向他求治，虽然病区没有床位，但还是很快被加床收治——患者特别向我们强调，“是在没有托人也没送钱”的情况下。她听白光私下对学生说：“我们就是研究‘溃结’的，遇到这样的病人一定要收。没有床位也要想办法，哪怕把休息室腾出来给病人住。”

他在这方面确实有办法。患者住院 20 天，又连续吃了 4 个月的中药，之后连续三年都没再复发。她在网上和其他地区的患者聊天，发现白光用的治疗手段挺特别，除了传统的“喝汤药”外，还给她开了特制的中药药液灌肠，以期药物直达溃疡患处。这些药剂，据说也是科里自己研制的。

白光和他的同事们还研究了别的中药方剂。2020 年，专门用来平湿气的“运脾和胃贴”拿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他带的硕士生花 10 个月的时间总结他治疗慢性便秘的用药特点，研究出“肺脾同治”的治疗理论，觉得他比其他老师更“敢创新”。

白光信任自己一点一点挣得的东西：学生、论文、专利。他给自己的微信取名“我行我术”。科里有医生走传统路线，平时也穿带盘扣的绸质上衣在院外开诊，但白光的注意力不在这儿，他

诊室外的喧嚷中，也有些关于他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是挂号费。

忙着发文章，近几年尤其喜欢用数据分析用药规律。他的另外一项技能是“懂开刀”。在这家靠中西医结合疗法吸引患者的医院里，像他这样热衷手术的中医是榜样性的。2017年，他参加了医院的首例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2021年又开始尝试黏膜内镜下剥离术，外出讲课时，他对循证医学和生物制剂也表现出不同于其他中医的兴趣。一位曾和他同在周学文门下求教的医生认为，正是凭借这一点，他才越过科里其他年资更高的医生当上了主任——只靠号脉开方撑不起一间科室。直到今天，内镜中心依然是脾胃科待诊患者最多的地方。

慕名而来的患者不少，有时候“脾胃科半个走廊都是挂他号的人”。有些患者从市里最好的“医大一”（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盛京医院被推荐过来，还有人从临近的本溪市、抚顺市过来求诊。在愿意接受采访的患者口中，白光大部分时候是和善的、关心人的，甚至是幽默的。有一次，一位患有萎缩性胃炎的老年患者在诊室里放松不下来，随口说自己平时不吃肉，白光问：“那阿姨你是得信点儿啥不？”那天听说白光遇袭后，这位患者到凌晨3点都没睡着觉。

当然，诊室外的喧嚷中，也有些关于他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是挂号费。脾胃科12位开诊医生，挂号费从14.4元到96元不等，最高的那位是国家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其余大多数为19.9元，而白光的诊费是60元。一位曾在他处“调理肠胃”的患者向我抱怨，每见他一次就得花60元——她和病友甚至因此戏称白光为“六十的”——再加上诊断、抓药，每月至少要花2000元，因为经济上吃不消，她如今已换了另一位医生看诊。

“马某某”

离开辽宁省中医院拥挤的住院部，以及寸土寸金的北陵大街，“富商巨贾大展宏图的黄金宝地”，稍微往城市东北角行进一程，如果恰好在夜间行车，你会发现眼前的一切在慢慢变暗，直到路灯的亮光几乎消失的时候，也就抵达了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的上园小区。

经过放学后空无一人的沈阳市第一一一中学，再绕过那家正在招租的超市、玻璃门脏得看不清人影的打印店，小心招牌边的水管，在台阶油污发黏的麻辣烫店门口右转，就能看见三栋东西向的楼房，最中间的那一栋，往上数7层，肉色窗帘半掩着的那间，就是犯罪嫌疑人“马某某”的家。据沈阳市公安局2月2日当天发布的警情通报，他是一名男性，今年66岁。这是目前我们得知的关于他的全部信息。

2月中旬，春天还没抵达沈阳。天气又冷又阴，到处灰蒙蒙。主城区最东北角的上园，几乎没有人在室外活动，只有收劳工手套和旧衣服的小三轮车一圈一圈地绕，一家搬家公司忙着干活。这儿已经被列入大东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住着3000余户人家，而“马某某”的家所在的那三栋是全小区唯一“全是单间”的楼房。顺着层距过高的楼梯往上走，每一户人家的门上都糊满小广告，门锁锈蚀。层高比一般楼房高出一些，楼道空荡荡的，静得只有回声，即使是有阳光的下午也显得不洁、阴森。

比起发生在中医院的伤医事件，附近的居民们更熟悉马某某的另一桩行动：袭击白光被抓获后，他主动向警方交代，自己在家里用同一把射钉枪杀害了一位“酒友”。两周前特警带着他来指认现场，那天街边所有店铺的店主都出去张望了几分钟。

但人们对这宗命案的兴趣也就到此为止了。用一位在楼下健身器材处晒太阳的妇人的话说就是：“这年头，死个人算什么事儿呢？”那神情不是因困窘而不愿谈及，而是纯粹的不感兴趣。

一位中介则是这儿唯一一个提到辽宁省中医院伤医案的人。在他口中，马某某是一个蓄意行凶的“小老头”，“也可能是喝多了，但肯定不是神经病”。因为他的攻击有指向，“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他并不担心发生在楼里的凶杀案会影响自己的生意，尽管那些房间每一个都充满灰尘、油烟、84 消毒液和霉味，灯管几乎亮不起来，蹲厕高高地架在房间一角，但“附近到哪儿都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房子”。他说，要是附近的一家大汽车贸易公司没倒闭，这里的租金还会更贵些，可以到 650 元一个月。但如果愿意把暖气停掉，房东还可以把取暖费折进租金里。在东北的数九寒天里，楼里很多租户都是这么做的。

事件发生后，围绕“马某某为何行凶”，警方尚未给出确切的调查结果，但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两种说法。第一种是，马某某的儿子曾经是白光的患者，他在中医院脾胃科做过胃镜，多年后查出癌症，怀疑是当时的治疗导致的结果，存心报复；第二种是，马某某的儿子被推荐到白光处治疗消化道癌症，后者服药后未按标准流程定期复查，最终病情恶化死亡。那位科室的知情者给出的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解释：“白医生耽误了这个嫌疑人一名直系亲属的最佳抢救时机导致死亡（具体原因不好细说，但实际上医生本人没有过错）。”

但邻居们谁都不记得马某某还有个儿子，他们甚至没法确切描述他本人的长相。楼下的超市招牌掉了就再也没挂起来，窗户栏杆铁锈的颜色盖过油漆，老住户早就都逃离了这里。新冠疫情期间，社区给楼里拉过一个群，但楼里空房子多，外地的汽修小伙子来了又走，那个群没什么人说话。楼下邻居们打开手机找，并不知道哪个头像属于马某某，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群里。没人知道他的真名，中介说，7 楼的房间永远空着。

医院

晚 9 点，辽宁省中医院住院大楼，两名保安从屋里搬了把椅子放在刷卡机旁，挥动黑色金属探测仪，指示来人绕一旁的“安检门”。上一休二，值班的日子是 24 小时岗，晚上两人轮值。白天，门诊大楼前的安检机器要更新一些，安检通道上方“测试”的字样都还没摘。知情人说，以前院里也有安检，“但不经常开”，如今每通过一个人，保安都会要求“大小包要过安检”，他们对每个包里的东西都看得很仔细，偶尔见到屏幕上有不认识的东西，还会大声讨论。

除此之外，医院里一切都如往昔。大厅里熏艾的味道经久不散，二楼取药处的长椅上挤满了等待“智能颗粒药房”窗口喊自己名字的患者。这是近几年中医院的时髦产物，不用抓药代煎，医生开方后半小时，患者就能取到分格包装好的配方颗粒，回家直接开水冲服即可。2021 年，药监局发布《关于结束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工作的公告》，辽宁省中医院走在了前面。比起院外取代煎药的拥挤队伍，人们更欢迎这类颗粒剂，尽管它并不便宜——7 天药量要花费近 200 元。2020 年辽宁省中医院总收入 15 亿元，在全省专科医院里处于拔尖位置。

主任不在了，9 楼的脾胃科依然照常运转。内镜中心一周内预约人数就超过了三位数，科里尽全力发展的“脾胃病外治中心”直到下午 6 点还有患者就诊，他们用针灸、艾灸、穴位贴敷的方式帮助



（视觉中国 供图）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患者“调理肠胃”。仅隔着一道走廊，白光的同事们依然按时上班、看诊，穿着皱巴巴汗湿后背的白大褂去卫生间，加班，写病历，在走廊里吃盒饭。

但有的患者感受到了变化。2月21日晚，一位在住院区大厅里偷偷抽烟的患者告诉我，他和病友们最近都发现，医生和护士的态度变得比以前客气了许多，“就像是怕得罪谁似的”。

变暗的不仅是白光诊室门口的那块电子屏，他的同事，包括和他一起在论文上署名、一起在手术台上工作的人们也坚决不对这件事发表任何意见。其他行政部门的态度与之类似。整整五天工作日，位于住院部一楼的医患关系办公室始终大门紧闭，电话无人接听。

在被连续拒绝了三天后，我终于拨通了科室里一位医生的电话，他没像其他人一样立刻挂断，或是对着电话破口大骂，晚7点刚刚下班离开医院的他说：“我不是在乎医院发现我是谁，我只是还没有做好准备，应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和安放这件事。”他在当晚通过了我的微信好友请求，又在第二天中午拉黑了我。

来自厦门大学附属医院急诊ICU的一份研究显示，医院从业人员目睹暴力伤医事件后，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会产生情绪衰竭、情感疏远，大部分人都会出现回避/麻木、警觉性提高等反应，如果不加干预，长此以往会产生职业厌倦感，对医疗系统缺乏信心，有强烈的离职意愿，即使进行心理干预，这种状态也至少需要数月才能恢复。而据一位白光科室同事对我们的说法，直到案发20天后，除了“严禁接受采访”的指令外，医院没有给科室里的员工提供任何心理支援，他们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关于事件的完整解释。

但如今的白光已经顾不上这些。他留在学术期刊上的电话号码再没人接听，微信也沉寂下来，他仍躺在ICU病房里，接受一天半小时不到的探视。科里那位直到最后都不愿意透露自己性别和身份的知情者说，他现在情况还算稳定，是“半植物人状态”。

（感谢印柏同、罗方丹对采访的帮助）



黄土高原上的 AI 训练师

记者 · 李晓洁　摄影 · 缓山

做了数据标注员后，她说自己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做过一次旅游相关的业务，标注景区的不同级别、类型等，对这种不太懂的领域，我们经常要去查关键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搜索过西双版纳、玉龙雪山的景区资料，很美。”在一块电脑屏幕前，她想象 2000 公里外的大自然。“将来有没有机会我也去那看看？”

山区里的 AI 公司

电脑屏幕上在播放一则短视频，球星内马尔穿着黄色的巴西队服正带球过人。视频右侧是一些选择题，内马尔、梅西、世界杯等词汇下方有几个选项：强相关、弱相关、不相关。屏幕前的员工戴着耳机，判断视频内容与词汇的相关度：出现了内马尔，选强相关；没出现梅西，选不相关；至于什么是弱相关，有时需要员工自己判断。选中相关度后提交到系统，这就算是完成了一条标注工作。速度快的员工，一天能标注 1000 多条视频。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的爱豆科技有限公司，有 158 个数据标注工在从事类似的工作。一排排黑色电脑前，有人框定图片里出现的所有饮品，有人给一张张图片归类，有人查询某家商铺是否还在经营，并标注是否为“死店”……这样的数据标注工作，在 2020 年 3 月正式成为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中的一个新职业——AI 训练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其中，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算法测试员是 AI 训练师职业下的两个工种。

王丽娜是公司 158 个数据标注员之一，工作两年半后，她成为项目经理。她对数据标注员的理解，从一开始“操作电脑的”，变为现在“人工智能产品的数据训练师”。她举了个例子，“比如一个机器人要识别水果种类，就要有人在前期大量的水果图片数据中，标注出什么是苹果什么是梨。无人驾驶需要让汽车自动识别马路，也需要人在视频中将道路框出”。王丽娜熟悉图片、文字、音视频的各项标注业务，但数据标注后具体用在哪一个人工智能产品？她说不上来。因为标注业务的保密性，她和 100 多名员工一样，“只能猜出个大概”。她记得有段时间，接到的业务是识别、标注出大量的“福”字。“手写的、春联上的、各种类型的福字，我们就猜产品应该是跟支付宝过年‘扫五福’相关，你没发现这几年用手机扫福后，反应速度都快了点吗？”

靠着这种猜测，王丽娜经常觉得，生活中使用的智能语音产品、短视频平台的推荐功能等，都跟自己的标注工作有关，这让她有种模糊的成就感。甚至最近，她听说自己做的数据标注跟目前行业内最智能的 AI 产品 ChatGPT——一款智能聊天产品——也有关联。只是她说不清具体有什么关联，“应该是都需要数据标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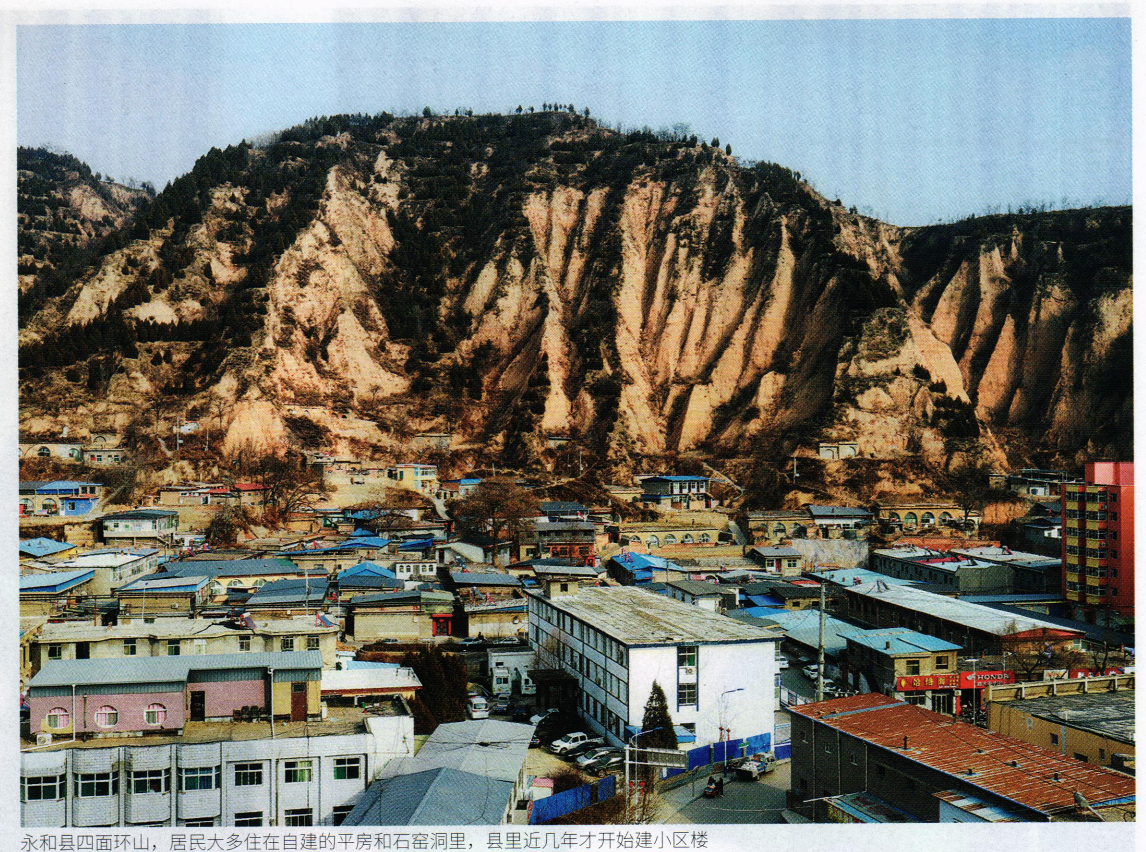
是的，ChatGPT 也需要数据标注。胡希塔是一家数据标注平台公司的创始人，关注数据标注行业多年。他告诉本刊记者：“人工标注数据是绕不开的步骤，ChatGPT 和很多人工智能产品研发的流程相似，前期都需要大量的数据采集与标注，只不过 ChatGPT 更注重的是文本标注，之后再进行数据处理、模型训练等流程。它跟国内现有的智能聊天产品的区别，主要在于算法模型训练，研发人员更注重 ChatGPT 的自主强化学习能力，所以很大一部分数据未经标注就投进模型，等待它生成结果后再多次训练和调整。”根据公开资料，ChatGPT 前期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互联网文本、公开的数据集、各种百科资料等，包含几十亿个文本文档。

王丽娜从事的就是这类人工智能产品链条上最前端的工作，虽然他们工作的地点在一个看起



上图：公司员工超过80%为女性，大部分是年轻“宝妈”。项目经理王丽娜觉得，“宝妈”员工更稳定，流失率低

下图：公司上午11:30开始午休，方便一些女员工中午回去接孩子，关系近的同事还会到附近的餐馆一起吃个饭


永和县四面环山，居民大多住在自建的平房和石窑洞里，县里近几年才开始建小区楼

交通条件差，影响着县城的经济和就业，没有多少工作机会，很多劳动力去临汾、太原打工。

来和人工智能完全搭不上边的偏僻贫困县城。作为曾经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永和县直到2020年初才完成脱贫。县城与陕西省交界，地处吕梁山脉南端，距离临汾市200多公里，驾车需要至少两个半小时。“到了永和，就到山沟沟了。”这是当地司机常挂在嘴边的话。一位司机说，位于黄土高坡上的永和县交通条件不好，2018年才开通去往太原市的高速路，再往前数两年，永和到临汾市的高速才完工。更早的时候，过年前遇到大雪、不能开车，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没法回家。

交通条件差，影响着县城的经济和就业，没有多少工作机会，很多劳动力去临汾、太原打工。一位接近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当地对外介绍县域常住人口4万多，但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全民核酸数据显示常住人口不足3万。县里也没有什么资源，2015年才探测出天然气，几个气站分散在县城外几十公里，慢慢吸纳了近千名劳动力，成为当地最大的企业。女性的就业选择更少，除了公务员、老师，就是服务员、售货员。王丽娜记得，八九年前，县城看上去还是“平平的”，没有一栋像样的商品楼，2019年底，她家才住进县城建好的第一栋小区。

现在，四面环绕着黄土山的县城虽然还是很小，但比四五年前“繁荣”了一些，这里建好了七八个十多层高的小区，城中心有条一公里多长的主街，主街上开了家饮品店，每到周末，中小学生能把店里的冰淇淋买光。本刊记者到达的时候，正月还没过去，主街两边行道树上缠着的灯带还没取下，到了晚上，彩灯亮起来，透出一股小城的喜庆蓬勃。

爱豆科技有限公司就在主街的尽头，再往前走100多米，一幢四层小楼的下两层是公司的办公区。2019年，蚂蚁集团与中国妇女基金会等组织发起了数字产业扶贫项目，在国家卫健委的协调下，永和县成为该项目在欠发达县城的第二批试点。2020年8月，这家山区里的数据标注公司成立。

这个数字产业扶贫项目的总监黄庆委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在项目发起前做过调研，发现农村主要人口构成是儿童、妇女和老人，其中妇女是农村占比最大的劳动人群。在吕梁山区的五个数字标注基地里，所有基地都是女性员工占多数。但永和县的女性员工占比最多，超过80%。黄庆委觉得，这跟县城本身的经济状况有关。"永和县面积小、就业机会少，男性劳动力大多外出谋生。"

2月下旬，在永和县的两层办公楼里，本刊记者看到数据标注员多为年轻妇女，她们称自己为"宝妈"。办公区设计也尽量为女性设想，在一个休闲区的角落，柜子上放了卫生巾、红糖、暖宝宝等免费用品，二楼的洗手间还有热水。

家庭主妇

白丁转是这群"宝妈"之一，也是公司成立后招入的第一批员工。她今年32岁，女儿刚上幼儿园小班。她有个大脸盘，大眼睛，化了淡妆后，双颊还能看到密密的斑点。办公室里，她用手指在白墙壁上画出一个个框，试图解释清楚电脑上的图片标注步骤。她的手指有点粗，手面皮肤黑黑的，堆出了皱纹，这是她过去在乡村、在家庭中劳作的痕迹。

成为数据标注员之前，白丁转将近六年没接触过工作，其中大约三年在做家庭主妇。说起以前的生活，尤其是生完孩子后的生活，她偶尔噘起嘴唇，眼睛湿漉漉的，表示自己的不满。"那会儿真的累，不只是要带孩子，家里洗洗刷刷，所有家务我一个人包。抱着孩子蒸馒头、做家务，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还要在老公到家前把饭做好，比打工还辛苦。"她的丈夫在县城做装潢，工作不固定，经常干三天歇两天，即使这样，丈夫也不会分担家务。她解释说，丈夫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从小没干过家务"。她也不放心把婴儿交给他看管。

有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很压抑，脾气很差，看什么都不顺眼"。一扇门没关紧，一句话没说好，她就想对丈夫发火。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不知道有"产后抑郁"这个词。她只能把原因归结于经济状况：丈夫生意一般，自己没有收入，经济拮据，她想买套好点的护肤品、想给爸妈买点东西都要犹豫。不是没看过工作，县城里只有服务员比较合适，但服务员工作时间长，没有双休，而她的孩子还没断奶。种种不顺，让她开始怀念过去，以前的她脾气很好，几乎不与人争吵，更重要的是，以前她有工作。

虽然第一份工作只有短暂的半年，白丁转还是能回忆起不少细节。那是她第一次离开乡村，去"大城市"苏州做电子厂的流水线女工。做女工前，她是家里五个兄妹中的"老三"，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再加上爷爷奶奶，一家九口人住在村里两孔土窑洞里，父母靠在黄土高坡上种的40亩玉米、谷子和高粱养活九口人。白丁转跟两个姐姐一样，读到高中后辍学，省钱给两个成绩更好点的弟弟读书。尽管她自己成绩中上，对大学也有期待，但她"很懂事地选了打工"。

到苏州的第一个不同是讲普通话。以前只在电视节目、语文书本这两个场景中出现的普通话，开始需要白丁转自己主动说。这个倒也好克服，她最不习惯的是饮食，"整天吃米饭，面条很细很软"。刚去苏州一个多月，她瘦了十多斤，脸上长满了青春痘。

也有美好的回忆。比如周末，她和三四个同乡同学（后来同为厂区女工）去逛园林，穿古装拍了些照片。她还记得当时在路边遇到拿碗乞讨的乞丐，几个女孩掏出硬币，之后乞丐频频经过她们，她们给了好几次一块钱。"当时就觉得自己能挣钱，乞丐比我们可怜多了。"白丁转说，在电子厂包吃住，每月工资不到2000块，还有双休，不算特别辛苦。但第一次离家的她太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和饮食，临近年关，她尤其想家，最后跟几个同乡一起辞职，提前回了老家。

第二份工作，白丁转没有离家太远。她去太原学习儿童摄影，因为二姐也在太原，俩人能有个照应。这一次，白丁转从学徒到店长，一共在这家店工作了四年。她稳定地工作，每个月工资不到3000块，可以给正上学的弟弟补贴生活费。但工作到第四年，白丁转的奶奶得了痴呆，如果没人随时看着，很容易在山里到处乱走，遇到危险。当时她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弟弟们还在读书，爸妈农活闲不下。“我从小跟奶奶感情好，就主动辞职回家照顾老人。”白丁转说。

从那之后，白丁转远离了工作。村里没有工作机会，窑洞里连手机信号都时有时无，她没别的事儿干，就在照顾奶奶的同时担负起所有家务。一年多后奶奶去世，“人家说我岁数也不小了，经过介绍，认识了附近村的老公。”之后，她按部就班地结婚、怀孕生子，做家庭主妇，为家庭经济、育儿和夫妻关系焦虑。

白丁转脱离工作、成为家庭妇女的经历，也是县城大部分女性的缩影。回归家庭，成了很多女性的命运。多位女性数据标注员告诉本刊记者，她们回到县城的最大原因是“结婚生子”，她们大都做过几年家庭主妇，即使家中有老人帮忙带孩子，但县城本身很小、工作机会不多，也只能待在家里。一部分嫁到外地的女性，就在外地做家庭主妇。白丁转说，在家里待久了，她偶尔会心慌，觉得自己一点进步也没有，她“强烈地想要工作”。直到2020年7月，跟很多女性一样，她在手机朋友圈看到别人转发的AI训练师招聘通知。

县城里很多年轻妇女被招聘通知上的“双休”“办公室工作”几个条件吸引，白丁转也一样。她做儿童摄影时有电脑操作基础，打算去面试。当时女儿即将一周岁，还没断奶，家人以为她“不想带孩子”。但她这次很坚定，推着婴儿车就去县城广场上报名。通过初试后，她进行十天的数据标注培训，期间把女儿交给丈夫带，“女儿从沙发上掉下来至少两次”。

2020年8月3日，白丁转到现在还能清楚记得自己的入职时间。那一天，她成了一名有工作的人。在这前两天，收到复试通过后的消息，她立马打电话给婆婆，把女儿托付给30公里外住在农村的公婆。她还买了辆电动摩托车，一是通勤用，更重要的作用是每周五下午6点下班后，她可以骑上电动摩托回村看女儿，周日晚上再回县城。就这样，她从第一批约120人的报名者里留下，成了19名正式的数据标注员之一。

新行业

白丁转和同事们进入数据标注行业时，已经过了行业发展的第一个爆发期。丁威在2017年底成立了自己的数据标注公司，过去五年多，他看见行业内“一波又一波公司涌入”，又因为各种原因倒闭，如今，他的公司还保留100多个数据标注员，他觉得自己在行业内“算好的了。”

往前看，数据标注成为一门行业的时间并不长。丁威告诉本刊记者，数据标注的起步期可以追溯到2012年。那一年，华裔科学家李飞飞团队组织了第三届ImageNet竞赛——衡量哪些算法能以最低的错误率识别ImageNet数据集图像中的物体。比赛的冠军团队提交了一个卷积神经网络架构（英文简称为CNN），这一架构使图像识别准确率大幅提升。到今天，国内外各大社交网络平台、无人驾驶等几乎任何识别图像和视频的系统都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架构。所以，把人工智能的繁荣归功于2012年ImageNet竞赛结果的公布——这几乎是业内的共识。也是这一年起，人工智能具备了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能力。

在国内，头部的互联网公司也开始基于CNN技术建立属于自己的数据集，并进行数据标注。2016年，谷歌研发的深度学习人工智能产品AlphaGo 3 ∶ 0战胜世界顶级围棋手李世石。人工智能产品在一项极度需要脑力、耐力的比赛中获胜，比四年前的ImageNet竞赛引发更大反响。国内的互联网公司迫不及待要推出同类产品，数据标注行业迎来了“风口期”。丁威记得，当时各种资本涌入市场，甚至出现很多公司找不到一家合适的数据标注企业的情况。

之后，数据标注行业经历了一段“粗放期”。当时数据标注工作的质量要求不高，对图片进行重复框定就能实现项目需求，一张图的价格不过



白丁转的家在县城边上的山脚下，是两层自建的平房。她入职一年多后，成为一个办公室 31 人小组的组长

几分钱，全靠数量获取微薄利润。丁威在这一时期进入行业，“慢慢摸索”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丁威说，他刚好赶上 2017～2019 年行业的爆发期，他公司的数据标注工从 10 多个扩展到最多时的四五百个。“那段时间也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天天担心有业务没人做，或者有人没业务做，特别不稳定。”也是在 2018 年，百度在山西太原落地了第一座人工智能数据标注产业基地，现在拥有超过 5000 名数据标注师。

一位同样在 2017 年入行的数据公司创始人胡希塔告诉本刊记者，数据标注业务涵盖了语音、图像、视频、文本四种主流的类型，行业爆发期那几年，自动驾驶业务也进入，为行业带去了更多业务量。“自动驾驶对数据标注的需求量更大，因为它要求接近100% 的精准度。”胡希塔说，大部分人工智能产品对模型精准度的要求都高于 90%，但当精准度想从 90% 提升到 95%，或者从 95% 再往上提升一点时，对背后数据量的要求可能是百万甚至千万级。“精准度要求越高，需要的数据量成倍增加，意味着数据标注数量同样加倍。”

也是那几年，丁威看到无数个数据标注公司像潮水一样涌入，很快又退去。“一般来说，做得不好的数据标注公司熬不过头一年。”丁威解释，当时正处于行业的不稳定期，公司业务可能上个月是波峰，下个月就到了波谷，“波谷时养不起员工，很多公司赔不起钱，就倒闭了”。他总结，培养一个成熟的数据标注工大概需要 3～5 个月，很多数据公司的员工没有底薪，丁威就给自己团队的员工支付前三个月的保底工资，等员工熟悉业务后再“自给自足”。另外，丁威也不仅仅依附于某一家互联网公司，而是接不同平台、不同类型的业务，锻炼员工的标注技能。靠这种方式，他的公司到现在还有多位员工是 2017 年公司初创时就加入的。

更重要的是，这群女性通过数据标注，觉得自己和更大的世界产生了关联。

但到了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丁威感觉行业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他了解到一家无人驾驶公司，在2022年消减了80%的数据标注业务；另一家公司，上千万的订单取消了。“很多公司勒紧裤腰带，减少标注业务，造成我们也没钱赚了。”另外，丁威觉得行业内还有个问题是“账期太长”，“我们把活儿干完了，开完发票等着到账，有时候一等就是半年、一年，你起诉公司也没办法，我现在外面还飘着不少账”。这让一些规模更小、业务更散，同时抗风险能力更差的公司很难长久生存下去。这两年，丁威发现新进入行业的小规模数据标注公司也变少了。原先存在的小公司则“学会抱团、共享业务了”。“对小企业来说，这也算是个趋势，不然它接不了大单子，很难生存。”

成为标注工之后

跟丁威的感受不太一样，永和县爱豆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林峰告诉本刊记者，公司没受到太多疫情影响，因为公司本身起源于扶贫项目，有公益性质，所以县政府免费提供了办公场地，蚂蚁公益基金会也在公司刚成立时，提供了几个月的“员工成长期”资金支持。

过去三年，他们接到的业务订单比较稳定，大多来自蚂蚁集团内部，或者集团作为枢纽，为这些县级小企业引入其他公司的业务。“总体上，我们的业务量不断增加，去年11月拓展出一个无人驾驶项目部，现在有五六十人。标注业务的难度也在上升。”李林峰说，疫情对公司的影响，是2022年春上海疫情暴发，上海是国内最大的数据库所在地之一，封城影响数据采集、业务交接等一系列流程，那段时间公司的业务变少，他就安排员工调休。另一次，是去年11月疫情放开前，全国各地新增感染病例，永和县也封了城。“员工签了保密协议，把电脑搬回自己家办公。”两周后，疫情管控放开，员工再把电脑搬回办公室。

说起业务量变化，白丁转也有体会，工资是最直观的体现。2021年11月，工作一年多后的白丁转升为办公室小组长，她所在的小组有31人，去年11月，小组人均工资第一次超过4000元。放在三年前刚入职时，她都没敢想这个数字。数据标注行业很少有底薪，基本是计件工资，她记得自己第一个月业务不熟练，收入1700元，“已经很满意了，有双休，还能坐在办公室吹空调”。往后，她收入偶尔超过5000元，还开玩笑说，“也是能交税的水平了”。

第一次，白丁转成了小家庭里的经济支柱。三年疫情，做装潢的丈夫业务变动大，账期长，总体收入不高，家里花销的大头是白丁转负责。她发现夫妻二人地位渐渐平等，因为丈夫会在她工作忙的时候做饭、做家务了。去年夏天，女儿回县城上幼儿园后，跟爸爸的相处时间更多，不像小时候那样完全黏着她，父女关系也亲近了点。跟白丁转一样，公司里不少年轻妇女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些员工家里的烘焙店、早餐店因疫情倒闭后，也只能靠妻子的收入支撑。

不只是家庭关系，她和同事们也变得“更关注自己”。她告诉我，办公室有许多宝妈，以前做家庭主妇，“在家可能一个星期都不用护肤品，随便洗把脸就好”。有了工作后，同事闲下来经常讨论化妆、购物等话题，她们又开始描眉毛、染头发，买新衣。永和县城内没有公园和景点可休闲，周末或者节假日，关系好的同事约着一起去二三十公里外的黄河湾边野餐。满目的黄土里，露出几块彩色的野餐垫和垫子上的草莓。

更重要的是，这群女性通过数据标注，觉得自己和更大的世界产生了关联。白丁转现在还记得当年在流水线上的工作——坐在履带旁、给一块板子的固定位置插上电阻。她模仿当时的工作状态，手指在桌面上啄了几下，“没有任何可以发挥想象的空间，上厕所还要报备、请同事帮你照看着板子，很枯燥”。做了数据标注员后，她说自己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做过一次旅游相关的业务，标注景区的不同级别、类型等，对这种不太懂的

领域，我们经常要去查关键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搜索过西双版纳、玉龙雪山的景区资料，很美。”在一块电脑屏幕前，她想象2000公里外的大自然。“将来有没有机会我也去那儿看看？”

说起未来，永和县很多数据标注员都很乐观。公司的无人驾驶项目组，标注技术更复杂，最近一直在面试，吸引了好几个本科学历员工。人多了，办公区场地不够，二楼的经理办公室里挤着放进了财务、项目经理的工位，李林峰跟政府协调，希望有更大的场地。员工们觉得这些都是好事儿，说明公司正往好的方向发展，她们本身也吸引了不少亲友来做数据标注。去年，高中学历的王丽娜还跟几个同事报名、上网课，获得了函授大专学历。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市场研究报告》预测，国内2025年市场规模将突破120亿元。丁威也看到这个数据，但他觉得扶贫性质的数据标注企业未来并不是一片乐观。

“集团不可能一直养着你，给你业务，而且如果业务太过单一，离开集团后，这些公司如何增加市场竞争力？”丁威说，目前行业内越简单的标注业务利润越薄，比如图片、中文语音标注等等，已经在前期有了大量标注基础，越往后需要的标注量越少。“市场竞争力跟员工的技能有关，现在数据标注的发展方向也有了门槛。比如医疗类的标注需要基础的病灶分析，有的业务方提要求，必须医学硕士去做。语音标注也开始要求多语种，这些标注门槛都在变高。而挂靠于某一集团的数据标注公司依赖性太强，对市场的敏锐度也不够，被淘汰的风险更大。”丁威说。

李林峰不是没有这一层隐忧，前几天，无人驾驶项目组里有几个员工离职，“去大城市赚钱”。他打算今年自己也多走出大山，跟东部一些市场化的数据标注公司学习，尽量拓展集团外的业务。

他知道公司的基层员工要求不高，只希望手里有活儿。就像现在，虽然是周末，公司一楼的办公区还有七八个女性在加班。她们大多化了妆，涂了口红，在电脑屏幕前快速移送鼠标、敲击键盘。屏幕上的图片、视频一个个闪过，让人看着眼花。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丁威为化名）

从奥斯曼到土耳其：永恒的斗争

主笔·张从志

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在小亚细亚的中部，和北京一样都处在北纬40度线上，一东一西，相距有7000公里。不过相比安卡拉，我们更熟悉的是另一座城市——伊斯坦布尔，大部分的国际航班都是先飞往伊斯坦布尔，再转到安卡拉。在外人眼里，安卡拉有神秘色彩，而伊斯坦布尔是浪漫之都。

关于这两座城市，有一些历史细节值得玩味。“土耳其国父”、开国领袖凯末尔，在1923年领导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后，有长达四年的时间都没有踏足过伊斯坦布尔。他宁愿待在自己选定的、饱受战争和贫穷创伤的小城安卡拉，也不愿前往有着千年辉煌历史的古老都城伊斯坦布尔。虽然他后来还是搬进了伊斯坦布尔的宫殿，但直到去世，心心念念的仍然是安卡拉。到了现任总统埃尔多安这里，事情正好相反——他以不喜欢待在首都安卡拉而闻名，他更偏爱的是伊斯坦布尔。到底如何解读两位领导人的“厚此薄彼”？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偏好使然，还是折射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很难有真正的答案。

事实上，围绕凯末尔和埃尔多安这两位强人领袖的种种争论，正是如今土耳其社会在阶层和价值观上不断撕裂的写照。无论是在圣索菲亚问题上，还是在女性戴头巾问题上，乃至在奥斯曼文回归课堂的问题上，埃尔多安和他创立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AKP）都对凯末尔当初推行的世俗主义改革进行了某种纠正。外界认为，这是对凯末尔主义的“逆反”，说严重点，是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的“复辟”。这令一些闻伊斯兰色变的观察者备感警惕，更令他们脊背发凉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始终拥有来自土耳其民众，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广泛而坚定的支持。尽管面临着高通胀和经济衰退，以及政治上的各种指控，甚至是家族贪腐丑闻，但埃尔多安依然挺过了历次大选。

我们该如何理解如今的土耳其社会？土耳其人从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复杂的历史遗产里到底在寻找什么？所谓的伊斯兰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将把土耳其带向何方？本刊专访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他研究土耳其问题已经超过20年，在土耳其多地有生活和学习的经历。

阶层斗争与伊斯兰的复兴

三联生活周刊：土耳其大选原定于今年5月举行，对于近年来支持率有所下滑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漫长的执政生涯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大考验。现在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对这场大选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

昝涛：离大选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具体的结果，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预测。但这场地震确实是这次大选的一个特殊因素，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抗震救灾的工作对于现在执政的埃尔多安来说，到底是处理不当给他减分，还是处理得当给他加分，也很难说。目前来看，我认为土耳其国内的政治人士整体都还算比较克制，因为现在正处于救灾阶段，如果出于党争过分地去表现，反倒会引起民众的反感，是个不明智的举动。所以不管是埃尔多安政府还是反对派，在这个节点上到底怎么来把控，都需要政治智慧。

三联生活周刊：从2002年上台后，埃尔多安和他的正发党执掌土耳其政坛已经超过20年。近年来，外界舆论越来越强调他们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色彩，而在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社会也的确出现了伊斯兰传统的复兴倾向。在你看来，在这种复兴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它是现实政治操纵的结果还是的确存在结构性的社会需求？



上图：2016 年 10 月 29 日，土耳其国庆日，一位女子举着"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肖像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游行队伍中

下图：2023 年 2 月 1 日，土耳其总统、正发党领导人埃尔多安（前者）出席土耳其大国民议会





左图：1923年，凯末尔（右三）和他的政府要员在一起

中图：1979年12月，一名街头小贩在德黑兰革命期间售卖印有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海报

右图：1980年11月，土耳其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兼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带领将军们走出土耳其国父陵，他们刚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德米雷尔政府

昝涛：这两个因素都有。凯末尔党人在建国之初就牢牢掌握和垄断了土耳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几乎所有的重要部门。他们主要是西化派的精英，虽然凯末尔的共和人民党（CHP）作为一个政党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失去了执政权力，但他们培养的下一代继续掌握着这些重要部门。尤其是经济部门，那个时期大部分都是国有的，民间资本很薄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土耳其的民间资本开始崛起，催生出了一个庞大的新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通常是成功的小资产阶级或者成功的商人，和那些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的西化派还有军方集团不一样，他们在小地方成长，接受的是比较保守的教育，价值观上也更认同伊斯兰的传统。他们要寻找政治上的代言人来捍卫自身的利益，也就需要与极端世俗主义的、操控了国家大量权力的所谓凯末尔主义者进行持续的斗争。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深的阶层斗争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自然要将伊斯兰工具化，这是他们比较容易掌握而又被凯末尔党人压制的事物，将此作为他们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话语，这样在政治上才能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党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登上政治舞台后，也曾受到过打压，在几次军事政变中，夺权的军人集团上来后就取缔过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党。但不管怎么样，伊斯兰传统的复兴事实上早已是土耳其国内阶层和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

三联生活周刊：从全球范围来看，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不只是土耳其，中东地区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倾向。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一现象？

昝涛：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推崇的那一套具有工具理性主义特点的现代化模式，最终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首先在西方世界自身出了问题。在发展中世界，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当然还好说，但一旦经济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加剧，就会面临挑战。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尤其是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价





值观产生了怀疑或反思。在复杂的现实中，人们对传统价值和传统道德重新产生了兴趣。不过，它的本质其实是对现代性的反抗。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全球出现了一轮再宗教化的趋势。所谓再宗教化，也叫非世俗化，不是说要把古代的宗教拿出来重新信仰，而是说人们开始重视传统包括宗教的价值，以此对现代化带来的工具理性化、资本主义化和工业化等问题进行整体反思。在西方世界就兴起了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新的思潮，其中也包括传统宗教的复兴。穆斯林世界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当然，他们和西方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所不同，尤其是中东地区那时候仍是冷战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还存在很强的外部刺激、干预和制约等因素。

回到土耳其，它作为一个北约成员国、西方的盟友，统治阶层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在价值观上抵御共产主义的渗透。而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土耳其国内的左派力量日益增长，中下阶层的工人、农民和年轻人都受到了左派话语的影响，这让土耳其的政府和军方都感到很大的威胁。还有一个因素是我比较强调的，那就是1979年伊朗发生的霍梅尼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伊朗从美国的盟友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伊朗信奉的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它在自己革命后还要向外输出革命，基于伊朗的什叶派属性，作为逊尼派的土耳其肯定是要尤其提防的。所以，土耳其当时在意识形态上既要抵御共产主义，又要抵御什叶派的伊朗传播的伊斯兰主义，它能够有效动员的东西肯定不是西方的价值观，因为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里基本没有这套东西，于是，他们就只能动用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也就是伊斯兰教。

1980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后，军方集团推出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就叫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而以前土耳其官方更多是强调土耳其民族主义，现在把伊斯兰主义也加进来了，就是希望利用宗教作为反制力量。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1996年曾短暂上台执政的繁荣党（RP），它的创立者是埃尔巴坎。在那之后，到21世纪初，更为成熟的就是埃尔多安等人创立的正发党。





(Tpg/alamy供图)

上图：电视剧《宏伟世纪》剧照

下图：电影《征服者1453》剧照

正发党的源头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但它比过去那些伊斯兰主义政党成熟的地方在于，它吸取了大量的历史教训，在伊斯兰主义方面更加灵活和实用主义，他们以保守主义自居，提出了所谓的“保守民主主义”（Conservative democracy）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觉得所谓的保守主义只是埃尔多安的某种“伪装”，随着他政权的稳固，这种“伪装”就慢慢被撕下了。你怎么看？

昝涛：当然，永远都有一批人，他们认为伊斯兰主义政党是有两套方案的，一套明的，一套暗的。明的那套，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还有现代民主价值他们也都能接受。暗的那一套，则是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我觉得后者更多是一种阴谋论。

今天咱们也看到，考虑到年龄和任期的限制，埃尔多安执政的晚期可能已经到来了。他统治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他真的提过什么国家伊斯兰化的主张。尽管媒体上总是说这个国家伊斯兰化了，但我个人觉得这主要是极端世俗派和西方世界的偏见，因为他们不喜欢他，所以就给他贴这样的标签。你可以说土耳其的社会风气的确有伊斯兰化的倾向，但这个国家的基本架构我认为没有改变，土耳其共和国还是个世俗国家，无论是哪个政党上台，他们还是走在世俗国家的道路上，想的仍然是怎么把共和国建设好。正发党这么成功的政党都没有把土耳其伊斯兰化，到底是为什么呢？这非常值得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单纯用伊斯兰主义的维度来分析土耳其的政治和社会，有效度是非常有限的。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可以说，新奥斯曼主义也是一个标签？

昝涛：这更是个标签了，现在的土耳其人基本不会用它来描述自己，因为新奥斯曼主义是个贬义词。这个词，大概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厄扎尔当政时出现的，当时的主要背景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把库尔德问题国际化了。而土耳其境内有1000多万库尔德人，厄扎尔政府在思考如何解决库尔德问题时，有人就提出可以像奥斯曼帝国时期一样采用所谓的米勒特制度，给他们一定的自

治权，创造一种和平共处、多元宽容的氛围。那时候的新奥斯曼主义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是和宽容、多元主义这些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如今所说的新奥斯曼主义，一个是说土耳其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政策取向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特别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在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四处出击，纵横捭阖，在埃及、叙利亚、希腊、东地中海、巴勒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地方都有行动。这些地方都是奥斯曼帝国曾经的领土，所以就有人把土耳其的进攻性外交政策与行为说成是新奥斯曼主义。

此外，在文化层面，它的表现就是太把奥斯曼帝国当回事了。表现有很多。比如，这些年，土耳其的确制作了大量关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影视作品。比如最著名的是《辉煌的世纪》，拍了几百集，讲的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的苏丹苏莱曼大帝和他爱人的故事；还有电影《征服者1453》，描绘的是奥斯曼人攻占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的故事；还有一部电视剧是讲末代苏丹哈米德二世的，他在西方名声最差，因为曾经镇压过亚美尼亚人，西方送了他一个外号叫“血腥苏丹”，凯末尔革命后对他评价也不好，但到了埃尔多安的时代，却把他塑造成了慈父一般的形象，相当于为他的历史翻案。再加上近年来，土耳其很多建筑、海军舰艇、飞机和一些标志性的工程项目，都是用奥斯曼帝国的帝王或名人名字来命的名。这些奥斯曼时期的文化符号的复兴，在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看来，表明了土耳其想要重新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所以，它们总体上都可以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

如果我们了解西方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和偏见，就可以理解，新奥斯曼主义不是对土耳其的一种客观描述，而是一种批判。但如果站在土耳其的角度，这是自然的，不是什么野心，也并不意味着要恢复过去的那个奥斯曼帝国。他们觉得这些历史记忆就是自己的一部分，是他们曾经的荣耀，他们首先要认可他们自身的历史。不过在土耳其之外的大众层面，大多数人仍然维持着一些负面的印象，这大概说明大家对伊斯兰文明的认知还不够客观。这当中有现实的原因，也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

从帝国到共和国

三联生活周刊：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大清王朝，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历了类似的命运，最终都走向了衰亡。但大清帝国的主体被中华民国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下来，而有五六百年历史的奥斯曼帝国最终彻底解体，四分五裂。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昝涛：问题很复杂，不过，我更愿意分享的是我这两年的一个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看法，就是我们过去把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当成一个很自然的过渡，但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和中国比较一下，在我们的观念里，多少个朝代过去了，分分合合，但我们认为维持大一统才是自然的，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但是奥斯曼帝国被拆成那么多块，为什么它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我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在过去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视为自然的，大家习以为常了，缺少真正的反思。

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里，一方面，从西方世界的角度来说，奥斯曼帝国占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东的咽喉要道，这个地方被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所占据，对西方是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不能让它统一，它统一，大家都不好过。另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奥斯曼帝国走向解体，巴尔干地区的欧洲人高兴，阿拉伯的穆斯林精英也高兴，大家都起来搞民族主义，独立成了几十个国家。最后只剩下土耳其人，也不可能再复兴以前那个奥斯曼帝国了，他们只好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实，搞起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建立土耳其共和国。所以，我觉得是民族主义和帝国

这些奥斯曼时期的文化符号的复兴，在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看来，表明了土耳其想要重新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

主义合谋杀死了奥斯曼帝国。我们在讨论后续这些国家发展的历史基础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种强大的合力的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和近代中国比较，土耳其的道路似乎少了很多曲折。在帝国解体后，他们抓住了建国机会，并迅速开始了现代化建设，而且幸运地避免了卷入“二战”，直到战争快结束时才加入了同盟国阵营。在土耳其建国之初，他们拥有哪些有利的条件？

昝涛：土耳其在建国后能比较顺利地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首先和它抛弃了奥斯曼帝国的沉重包袱有关系。因为对当时的土耳其来说，奥斯曼帝国如此广阔的疆域，如此多元的文明和种族构成，还有马赛克式的帝国结构，这些都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得不舍弃。还有一点就是，土耳其的建国基础是很硬核的。土耳其人是在几乎要亡国灭种的情况下，靠长时间的流血斗争，战胜外国及其傀儡的军队，才打下了7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土耳其现代化的“地基”，是根本！

百年来，学界和政界经常讲土耳其的现代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学了西方，建立了现代民主政制、政教分离和市场经济，甚至一度把土耳其当成全盘西化的成功案例。但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个逻辑。我觉得这里面涉及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著名的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自身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这样一种梳理，就是将革命视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前提，这对我们理解土耳其也很有启发。土耳其首先是革命成功了，这就是前面说过的民族独立运动打赢了战争，然后才有学习西方和现代化的问题。为什么要强调革命这一节？因为你讲土耳其的现代化，是指一个落后的主权国家的赶超型现代化，这首先是要有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并且得有相当程度的所谓“国家能力”，才能对内实现治理，对外赢得相对和平的环境，不然别人随时可以出来打断甚至终结你。奥斯曼帝国搞现代改革搞了100多年，为什么最后没有成功？为什么到土耳其共和国这里就干成了？是因为历史上的那些人笨吗？但他们其实延续下来是同一拨人，而且都在努力学西方，为什么奥斯曼人没学成，最后土耳其人学成了。我觉得核心是内部政治和地缘政治环境变了。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经常被列强打断，而内部的分离主义更是耗掉了它的大部分精力，但到土耳其民族国家时代，打赢民族独立战争后，逼着西方人到了谈判桌上，签订了《洛桑条约》。它跟苏俄也签了友好互助条约，还跟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国家达成了和解。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34年，土耳其把使用了四五百年的圣索菲亚清真寺改成了博物馆，以此向西方世界示好。这样，独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就赢得了较好的国际环境。在国内，凯末尔党人的控制力也非常强，他们的合法性也来自于民族革命。这些都是凯末尔党人追求所谓现代化的基础。对土耳其这种地缘政治环境特别复杂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一场彻底的革命——这种革命既包括主权革命，也包括对自身的革命——就很难形成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能力，那样的话，现代化就是奢谈。

此外，就历史评价来说，我们不能只看到成功，不能只说帝国到共和国的所谓成功转型，因为，抛弃奥斯曼帝国，对土耳其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出悲剧。

三联生活周刊：土耳其当初是完全抛弃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还是有选择性地加以保留和利用？

昝涛：所谓的抛弃，也不能说是主动的，而是要不回来了。在现实当中，土耳其人也并非都不怀念奥斯曼帝国了。比如当时围绕要不要保留哈里发就产生了很多争论。哈里发是全世界逊尼派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在奥斯曼时期，哈里发和代表世俗君主统治的苏丹是一体的，但在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前一年，也就是1922年，凯末尔党人决定废除了苏丹，暂时保留了哈里发。直到两年后，他们才正式废除了哈里发制度。

在意识形态上，凯末尔党人重新建立了一个土耳其的民族认同，并以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立场

对土耳其这种地缘政治环境特别复杂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一场彻底的革命，就很难形成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能力。



1912年10月18日，意土战争结束后，意大利和土耳其在瑞士洛桑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

批判了奥斯曼帝国及其历史遗产。他们认为奥斯曼统治精英为了长期维持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让土耳其民族背负了很多不该背负的负担。我们为什么要去捍卫别人的家园？为什么要去为别人流血牺牲？我们现在终于建立了新的国家，就老老实实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努力奋斗。至于奥斯曼主义者念念不忘的阿拉伯和巴尔干地区，甚至是泛突厥主义者想象的高加索—中亚地区，那和我们都没关系。

他们还批判了奥斯曼帝国晚期出现的青年土耳其党，认为是他们把土耳其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凯末尔党人很多也是青年土耳其党出身，但如今也要撇清关系。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把首都从历史包袱沉重的伊斯坦布尔迁到了小亚细亚中部的安卡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姿态，表明土耳其要和奥斯曼的过去进行真正的切割。土耳其人在情感上刻意压抑了自己历史上的帝国自豪感。但是，这种记忆只是被压抑住了，它不会消失。

革命的说法与做法

三联生活周刊：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对整个社会进行了世俗主义的改造，很多措施后来被认为是相当激进的，依靠政权强力在推动，其中就包括对伊斯兰教的压制。这些做法给今天的土耳其带来了哪些影响？

昝涛：凯末尔推行的社会改革的确有强制的一面，但它是以进步主义的名义来实施的。在现代化改革的历史中，这种做法其实很普遍。比如中国的放足、剪辫子，都是如此。土耳其建国后要求男子剃掉胡子、不戴传统的费兹帽，对女性戴头巾的问题，一开始倒没有强制，只是鼓励不戴，后来才在立法上有了明确规定。到上世纪90年代，立法更加严格，开始禁止公职人员和在公共场所内戴头巾的行为。这些做法，西化派和世俗派能接受，但宗教人士和保守派就觉得是强加给他们的，中间也有人出来抵制和反抗，但都失败了。它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必然会出现反弹。这种反弹并非要彻底推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

翻凯末尔主义，而是他们要呼唤伊斯兰传统的回归。站在自由主义的角度，这也能说得过去，因为它属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范畴。所以就有人把这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提出来，认为凯末尔主义的改革，尤其是对伊斯兰传统的压制，使我们和我们的灵魂疏远了，让我们感到心里不踏实，精神不安定，我们需要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而这个精神家园还是伊斯兰传统的。为了把民众团结起来，伊斯兰派就必须找到一个明确的靶子，使其成为攻击凯末尔主义的工具，比如女性戴头巾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到了埃尔多安的时代，大概2010年前后，又修改法律废除了禁止女性戴头巾的条款。

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斗争贯穿于土耳其的政治历史进程，出于斗争的需要，很多事情又被夸大。比如在伊斯兰主义者的眼里，似乎凯末尔要把伊斯兰教从这个国家彻底废掉；而在世俗主义者看来，埃尔多安似乎是要把土耳其建成一个教权国家。但凯末尔当年的改造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社会习俗和风气的层面，而今天的逆反斗争，也仍然局限于这个层面，并没有涉及国家根本。

三联生活周刊：在土耳其革命的过程中，传统宗教的因素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昝涛：革命就会产生革命所需的意识形态，简单来说就是一套说法，而革命本身是做法。说法和做法之间，任何人、任何组织，总不会完全一致。土耳其的民族革命之初确实打过圣战旗号。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你如果一开始就去跟老百姓说，我们这是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人家哪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但你要说打异教徒，一说大家就明白，因为这是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而且动员的过程必须借助宗教人士，让他们去对老百姓讲话。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当时传统宗教的重要性。1919年，“一战”结束后，凯末尔被苏丹派去安纳托利亚，本来的任务是去解散残存军队的，结果他是领导革命去了。所以后来苏丹对他下了一个“追杀令”，在伊斯兰里也叫教令（法特瓦），号召穆斯林刺杀凯末尔。而凯末尔阵营那边也有宗教人士，他们就组织起来反驳这条教令，结果变成了两边宗教人士的一场“法特瓦之战”。所以无论是在战争动员还是捍卫领袖方面，宗教都在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宗教，在现代土耳其的历史中，军人集团的地位举足轻重，凯末尔去世后，军方曾长期以共和国的捍卫者自居，当文官统治出问题时，就会发动政变夺取权力。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土耳其几乎每10年就有一次军事政变，直到最近的2016年，军方还发动了一次政变试图推翻埃尔多安政权。在如今的土耳其，军方是什么地位？未来还有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吗？

昝涛：可以这么说，旧的军方集团势力在埃尔多安的时代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文官政府比较牢固地控制住了军队，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了。像过去那样军人通过发动政变来推翻文官政府的可能性目前来看非常小。在2016年的未遂军人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对军方进行了几轮大清洗，不断有军官被逮捕的新闻，但也没有引起军方的反弹。

其实在这之前，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已经对军

方进行了多轮改造。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2013年，在正发党的推动下修改了军队的《国内职责法典》，把军队的职责重新定位于维护国家免遭外来威胁，剔除了军队保护和捍卫土耳其共和国的相关条款。而这一条是过去土耳其历次军事政变中，军方出来夺权的主要依据之一。

从全世界的政治规则上来讲，军人政变都是一种不正常现象，但在土耳其过去可不是这样，大家甚至呼吁军人发动政变。不过在今天，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反对军人政变已经是共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在走向正常化。

三联生活周刊：土耳其过去发动的历次军事政变，除了2016年这次，前几次都成功了，但最后并没有像南美、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那样，最终演变成军事独裁。这应该如何解释？

昝涛：这个问题在学界大致有两派意见。一派是比较典型的，就像你说的，承认军人历次政变没有演变为军事独裁，说这是土耳其的独特性；但另一派认为这都是假象，军方政变后仍隐身幕后牢牢控制着整个国家。我个人觉得真相可能是在这两种观点之间。

文官政治在土耳其也是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有它不成熟的一面。所以军人过去发动政变，有的也并非没有道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文官政治的失效，造成社会失序，军人不得不出来收拾局面。另一方面，军队也有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到，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军队和西方的关系很密切，很多军官都是在西方受的教育，此外，土耳其还一直谋求加入欧盟，这些都对土耳其军方形成了很强的外部性制约，导致军方不太可能冒险去建立一个军事独裁国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去挑选自己的代言人。换句话说，土耳其军方不需要通过军事独裁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历史上，比如凯南·埃夫伦将军在1980年军事政变后变成了总统，他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军方的利益。所以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到埃尔多安的时代，土耳其政治结构中的文武关系显然进一步向文官政治发生了倾斜。

马伯庸：中年男人试图提炼历史规律，我也不能免俗

记者 · 孙若茜


（受访者供图）

作家马伯庸

"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能够把古代具有现代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展现给你们看，同时又不违背我所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这两个原则。"

时间倒退5年，马伯庸的名字后面老被缀上"影视元年"四个字。那时候，他的几部小说相继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其中最火的两部是《古董局中局》和《长安十二时辰》，前者使马伯庸正式成了畅销书作家，后者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红了。那时候，距离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今年，以极高频率紧跟着马伯庸这个名字出现的，变成了"宇宙"二字——"马伯庸宇宙"。他的作品连同其衍生的影视剧的数量和热度可以想象，在采访他的前后我也已经略有感受。采访最初的契机是去年年底长篇小说《大医》的出版，小说分上下两部，各有50多万字，发行时间上有些间隔。上部"破晓篇"我还没读完，就收到了另一本，而且竟然不是《大医》的下半部，而是小说《长安的荔枝》，加塞儿把它读了，又赶去读《大医》下部"日出篇"。疫情和春节给采访带来了延宕，转过年终于面对面坐下采访，正赶上当晚由他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改编的电视剧首播。

按照这种产出节奏，不夸张地说，这篇访谈在今年任何时间刊出，恐怕都会撞上马伯庸某部作品的宣传期——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就要出版了，《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也都在日程上了，还有……听说马伯庸的团队有一个叫"松子库"的文件夹，里面尽是些未来或许可以取用成书的头绪和素材，在马伯庸自己的电脑里，那个文件夹叫"坑"，这名字更有画面感。

用"宇宙"形容一个人的作品，一定不只为表达其数量之多，也不仅在于说明其作品正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展现，应该还在于表达其创作自成体系，不同的作品之间有一致的内在逻辑，这背后的推动力是作者的想法和方法。具体到马伯庸，比如他想通过写作历史小说表达的是什么？他笔下的古代为什么好像充满现代感？为什么能铺展出那么多细节？这些，正是我们采访中聊到的。

从古代提取现代性

三联生活周刊：读你的书，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能在你笔下的历史故事里发现现代的节奏和

逻辑。比如读《长安的荔枝》，故事里房奴的状态、职场规则和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几乎一致；再比如对时间的截取，倒计时的紧迫感，在《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里我们也都有过体验。能说说你是怎么把“现代”放入历史故事里的吗？

马伯庸：这其实不能说是现代逻辑，“社畜”这个东西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把它摆在那个位置，恰好能够和现在有所共鸣。这是一个技巧，就是既要把现代意识注入进去，还要符合古代逻辑。如果让古代人做出和现代人一样的事就出戏了，比如你不能让古人拿出一个手机，但是如果让古人去做一件事，这事马上做完了，领导说我要改个需求，或者说对领导溜须拍马，结果拍到马腿上得罪了领导，这些事情古今都有，就可以产生共鸣了。

我特别喜欢强调小说里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的小说里，包括近几十年的历史小说创作里面，都不太强调时间的颗粒感，我们经常会看到“数日之后”“数月之后”或者“半日之后”，时间感并不强。这是对的，古人的时间节奏很慢，没有现代人生活状态里那种争分夺秒的状态。我想把时间的颗粒感做得足够清晰，当然我们不能把现代的时间概念直接放到古代，所以我会特别喜欢在小说里用“一炷香的时间”“弹指之间”这种特别短促的时间概念，把时间标定出来，故事节奏还是一样的。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我能够把古代具有现代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展现给你们看，同时又不违背我所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这两个原则。

三联生活周刊：你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是什么？它是你在写作之初就非常明确的吗？

马伯庸：一开始我是没有意识的，最初纯粹就是八卦，看历史中哪个东西是比较有传奇性、戏剧性、好玩儿的，从这个角度入手。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非常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史观这一块。

其实史观就是两种，一种叫英雄史观，一种叫人民史观。对我来说，理解历史就是两条线，第一条线就是看底层，而不是看上层。就好像长江，一滴水不重要，一个小老百姓想活或者想死对历史无关宏旨，影响不到，但如果千千万万个老百姓聚到一起，产生的流向就是所谓的历史大事。任何一个历史转折都是底层人民产生的需要汇聚在一块儿形成的潮流，那些上层的历史人物、英雄就是适逢其会，他们不是引领潮流，而是赶在这些潮流之上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样自下而上才能推出整个社会历史事件真正的动机。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逻辑之下，故事的时间是接近现在还是无比遥远，对你来说写起来是没差别的对吗？

马伯庸：没有差别，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有意思的就是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能变成什么样的花，从文学角度又产生出怎样不同的故事。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历史故事，应该只是指向一个朝代的。换句话说，是因为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形态所产生出来的特定的故事，放在另外一个时代它是不成立的。比如说《两京十五日》，它只能在明朝，因为在明朝大运河才会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比如说《长安十二时辰》，只有在唐代长安城的那种城市结构之下故事才能发生，换到江南水乡根本用不着这么折腾。《长安的荔枝》如果放到近代，有汽车了，就不需要那么费劲地去运这个东西了。我甚至觉得载体都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好的小说很难改成一个好的剧本，它可能只有一种完美的表现形式。伟大作品是很难改出来的，像《红楼梦》，怎么拍你都不满意。因为它的文字已经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而且它的很多内容只有通过文字才能够呈现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具体从你写作涉及的朝代，讲讲你发现的具有现代性的东西？

马伯庸：很难具体到某一个朝代，只能大而化之地来说，遵循的是经济逻辑。对于资源分配的焦虑和把控是古今从来没有变过的。不管是在古代的宫里、官场还是在现代的办公室，本质上一样，都会面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权力的倾轧。古今的共情就在这儿，把握住这条线索向上推演，都是对资源抢夺的同一结果在不同场景的展现。

比如说《长安的荔枝》，李善德接到运荔枝的任务去找人帮忙，结果大家把这个球踢来踢去，这就是官僚机制必然产生的结果。当一个官僚机构足够大，同时文书工作足够多的时候，他们追





左、右图：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求的往往是一种安定感。这种安定感要通过复杂的文书流转来完成，让你不停地填表。还有就是推卸责任，就算这件事可能给我带来好处，但是为了避免风险，我不懂也不会去做，官僚机构是非常厌恶风险的。这种运作原则在中国古代的文官体制内是大规模存在的。说回来，我们当下肯定也是有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历史的偶然性？

马伯庸：历史的偶然性是存在的，但是恩格斯就说过，如果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如果我们把观察历史的尺度拉长，你会发现历史的发展途径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死亡、某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变化而产生大的变化。因为大方向的决定不在于某个人的意志，而在于国家的经济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必然、偶然，你想要写的是历史的哪部分？

马伯庸：应该说是在偶然中寻找必然的规律。我写历史小说追求的并不是所谓完全真实的历史，而是符合逻辑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件事可能没发生过，但是历史上这个人干得出来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创作小说应该遵循的逻辑。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我们要写鸿门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项羽为什么要放过刘邦？当时项羽26岁，刘邦51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项羽，26岁已经站在了全国的巅峰，谁也不如你牛，你看见一个51岁的老头子，你觉得你想去杀他吗？没必要。你又不像后世人那样知道刘邦最后会得天下，他在你眼中就是一个比秦始皇还老的老头儿，畏畏缩缩地坐在下面，出身不高、兵力不强，为什么要跟他计较？说难听点儿，杀了他你可能都嫌自己手脏。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年轻人的心理上推测这件事，但是，永远不会有项羽是因为看不上刘邦才放过他的说法作为历史定论。

三联生活周刊：这又是另外一种逻辑了。

马伯庸：这是另外一种研究方式，叫共情，或者叫设身处地。因为我们后世的人接触到的信息和当时的人接触到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刘邦很重要，刘邦后来得了天下，项羽不杀他就很可惜。但是从项羽的角度考虑，他并不知道刘邦后面会变得怎么样。他不会考虑自己会失败。这个心理逻辑，其实就是人性的推演。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情绪在历史的发展、走向里扮演的角色，或者说发挥的作用？

马伯庸：我觉得情绪更像是一种色彩。比如说一个沙发，用木头架子把它搭起来，外面的质感取决于往上刷的色彩。拿金庸举例子，《神雕侠侣》结尾是襄阳大战，郭靖守襄阳城。就历史规律而言，我们会知道这件事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当我们知道这件事不可逆转之后，再刷上一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色彩，就会体现出一种不同的质感，拥有一种古希腊悲剧英雄般的那种令人感动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办法把人类的情感和冷冰冰的经济规律完全切分开来。它们合并起来之后，就会有很多层次。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我们和历史小说里的人物产生共情，与我们和一个把时间设置在当下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共情，有什么差别吗？

马伯庸：差别很大，现在的人和古人的外界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苏东坡把自己的小妾送给别人，这件事情放到现在，是一个完全无法被接受的道德上的瑕疵。但是在苏东坡那个时代，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正常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能说苏东坡这件事情做得对，但是得知道他做这个事情是合理的，是合乎当时的礼法和社会规则的。共情首先是一种能了解当时社会规则的能力。而且我们读历史小说不只是读到共情，我们把人物放在一个合理的环境下，看到他的合理举动，这种举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才是真正需要考虑的事情，这是研究历史的逻辑，而不是小说逻辑。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说过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用当代人所熟悉的语境去解释的话，那么历史是不存在的。其实小说就是这样。不管什么样的小说，即使是历史小说，它写的也是一种现代性。我们会习惯性地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很多时候写历史小说难就难在这儿，既要符合当时人物本身的生活状态，同时还得考虑到现代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确史观，有意识地去寻找历史规律的？

马伯庸：我们身边接触的40岁以上的男人，在酒桌上或者其他什么场合，动不动就说：小谁，我跟你讲，是这么回事，人生就这几个字……他们经常会用这种口气说话。这是中年男人不可避免的一个宿命，试图提炼历史规律，试图提炼人生经验，我也不能免俗。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40岁，是2020年。2019年《长安十二时辰》的剧播出，火了。你觉得这种心态的转变，和具体某部作品的创作以及它得到的反馈有没有一点儿关联？

马伯庸：40岁是个虚数，其实具体时间倒是没有特别明确的。但是读历史读多了之后，就会有一种倾向去往下看，往细看。年轻的时候都喜欢看打打杀杀，我也喜欢看。再大一点儿，喜欢看宫廷阴谋，各种诡谲心思之间的算计。但是算完之后，大道至简，最后会发现“为什么这么算”，其实都是有规律在。

三联生活周刊：刚刚提到“火了”，因为我们总是难免会去假想，一个作家“火了”之后，创作的内容、心态是不是自然会改变；假想一个人不用考虑生存的问题，创作是不是就更自由了之类。

马伯庸：我是觉得也没有。写作这个东西跟

出不出名或者经济状况如何关系不大。因为它的内力不来自于这个。如果说我写完了，功成名就了，我就安心享受目前的这些稿费，这种生活我想象不出来。咱用通俗的话说，写东西其实是爱嘚瑟、爱显摆，这种显摆和嘚瑟不会因为你收入变化而变化。就像我给你们讲我发现《西游记》里《五龙经》其实是明代白莲教的一部伪经的事，我就很得意，会迫不及待找个话头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从一个小细节挖下去，会发现一个大坑

三联生活周刊：我很好奇，像《五龙经》这样的事你是怎么发现的？

马伯庸：《西游记》里那 50 多本经文，我是一本一本搜了一天搜出来的。我特别喜欢从一个细节入手去挖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样能挖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这和我的创作习惯有关——英国作家弗·福赛斯的间谍小说里面有大量的细节，让我觉得很酷，这可能是我着重描写细节的创作源头。写细节的前提就是要去查大量的东西，要保证细节是准确并且有用的，这就要深入挖。这个习惯养成之后，我经常会花一天的时间挖一个看似没有关系的事，挖完也没有什么后续的动作，就是挖的过程很开心。



马伯庸的新书

去年我一个朋友买了一套国内出的第一版《星球大战》，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我当时注意到几个细节：第一，这本书出的时候，《星球大战》第二部的电影才刚刚在美国上映。为什么当时中国能这么迅速地出版小说？我查了很长时间，查到 1980 年有一次高层访美，美国总统在白宫招待出访的耿飚和刘华清观看了《星球大战》的电影，很可能就是这次交流促成了出版。第二，《星球大战》一共三部，第一部的印数是 30 万册，第二部 15 万册，第三部是 7420 册，印量为什么会直线下降呢？了解之后我发现中国人当时对于科幻片几乎没有概念，所以对这个小说也看不太明白。我还特意请人找到当年的编辑，他们说当年为这件事投入了很多资源，几乎破产了。后来负责“星战”的这位编辑又出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小说在当年一下就火了，才把经济救回来。我们很难想象这两本书之间会有关系。整件事我差不多花了一天加一个晚上，到处找人打听，这个陈年老瓜挖完之后，也没别的用处，就过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数字是不是特别容易引起你的注意？你的作品里经常有精于算术的人，《显微镜下的大明》里的帅嘉谟、《长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都是这样，但你好像说过自己特别不擅长数学，所以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崇拜吗？

马伯庸：可以说是崇拜，或者说是敬畏，因为不懂而充满敬畏。我发现中国历史有一个问题，黄仁宇教授也提到过，就是忽视数字。他经常讲一件事，就是记录打一场仗我们不会讲出了多少兵，动员了多少物资，没有对数字的管理和特别明确的记载。回到我刚才说的经济逻辑，要是能把这些数字抠明白，你就知道那都是经济上的抉择，而不是政治上或者说个人情感色彩上的抉择。数字背后就是资源的计算、利益的计算。很多事

情从这个角度看就会很清楚。比如说隋炀帝下江南，那些钱怎么花的？为什么后来不下了？不是他幡然醒悟了，就是没钱了。

算钱是一个理解历史最重要的途径，你去看政治斗争、看人性，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来自资源分配。资源分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钱。所以我会关注一个朝代的财政问题，包括土地财政。我们总讲封建王朝300年一个轮回，其实原因特别简单，中国的土地就那么多，总是不断地有大户在做兼并，把自耕农赶出自己的土地变成佃农，国家大一统的基础就是自耕农，所以兼并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崩坏，发生战乱，死了很多人之后土地又足够多了，再重新分配。之后新王朝建立、繁衍发展，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最后又变成一个循环。

三联生活周刊：充满庞杂数字的史料，你一般会怎么读？比如《显微镜下的大明》里关于丝绢税的那些。

马伯庸：我自己要算一遍。那些不涉及高等数学，就是简单的数字运算。史书的毛病就是它不会给你一个详细解释。我以帅嘉谟算的作为基础，继续往下算，就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挖。从一个小细节挖下去，最后你会发现一个大坑。

“我要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

三联生活周刊：《显微镜下的大明》是你唯一一部非虚构作品。同名剧也是你亲自改编的，当初为什么没有把它直接写成小说呢？对你来说，写作非虚构和虚构作品，取材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之后，我怕被故事性绑架，我怕我很容易就觉得自己应该再写一个更畅销的故事、更让人喜欢的故事。所以想写一个非故事性、没有那么讨人喜欢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我自己觉得好的、能涉及历史底层规律的。当时正好我把之前搜集的东西拿出来翻。它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你要写这个事件就必须去理解明代的土地史、财政史、货币史，甚至明代的经济和商业，还有它的政治史，所有层面都要了解。学透了之后，对明代整体有理解了，那好，也别浪费，再写一个《两京十五日》，这样就顺理成章了，里面的逻辑也会写得更精准。

《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里我的确没有做任何虚构。它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个事件。它不是戏剧性的叙事结构，而是新闻的结构，讲的是前因后果。故事需要的是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关系变化，但那里面全在开会、算账，所有冲突都在于这个账我算得对，你那个账算得不对，不对在哪儿……这种东西是没法在视觉上呈现的。后来人家买了这个版权，我说你们连这种东西都买？我觉得还挺对不起他们的，就帮着改了改，编了一个故事出来作为基础。

写故事，所有东西都是为戏剧性服务的，有些东西可以要，有些东西不必要，我会按照故事的发展逻辑去剪裁。但是写非虚构，这个事件就不是按你的意志运转了。我当时写得很痛苦，因为很多时候发现这件事他只要这么做，会特别好看，但事实上他就没那么做，而是非从另外一个没有戏剧性的角度去发展，所以我要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非虚构要求的就是真实，如果你编一个东西出来，你的个人信誉就破产了，大家不会再相信你写的东西，真实反而会产生力量。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害怕读者挑出错吗？

马伯庸：我特别喜欢他们去挑。昨天就碰到一个读者发微博说，《大医》他都看完了，都挺好，但是有一个错误，在故事结尾主角之一抗美援朝去了丹东。他指出来，当时不叫“丹东”，叫“安东”，后来是为了考虑到和朝鲜之间的关系，这个地名才改叫“丹东”。我就赶紧联系出版社，下一版再印刷的时候要把这处给改了。你说这个影响故事吗？完全不影响，但是有人愿意挑出来，我觉得挺好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自己的写作经历过迎合读者的过程吗？

马伯庸：肯定是有，不可能是完全不迎合的。我会很关注我的书读者是一口气看完，分两天、三天看完，还是根本看不下去。对于叙事的流畅度和阅读的动力，我还是挺关注的。这个大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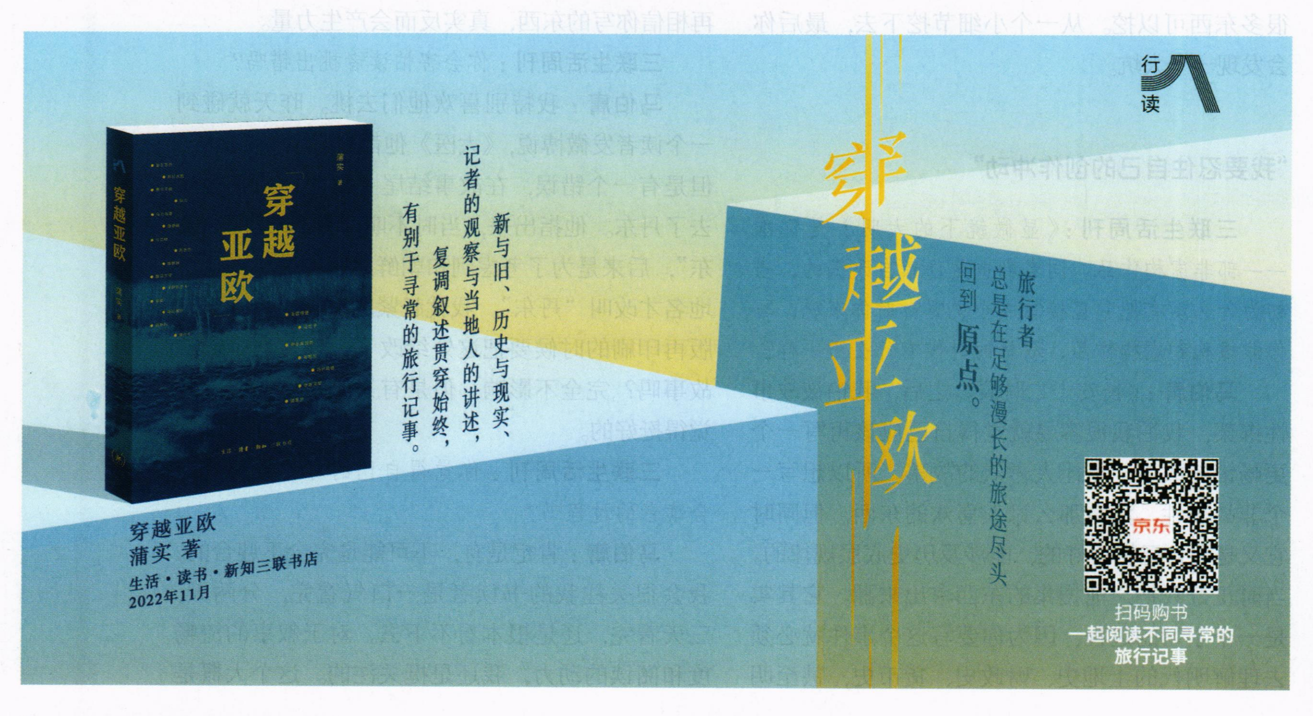
在写《古董局中局》的时候开始的，第一因为这个作品和我之前写的不一样，它算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第二，我写它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风，刻意用了一种说书人的口语化的表达，所以你会看到里面的话特别顺、特别溜，它不是文学的表达，更像是一个人的口述史。这也是我的一个尝试，原来太过于雕琢句子的复杂程度和巧妙程度了。而当我明确了是想要一本畅销书的时候，口语化对于降低阅读门槛就是很重要的。那本书出版之后，很多老读者会问，你这本书是不是代笔，怎么跟你风格不一样？但是老读者把书放在家里，他们的爸妈拿过去会一口气看完。你会发现这么写之后它触及了更多的读者。但是后来我又及时拉回来了，我觉得一旦养成习惯了，就麻烦了。

三联生活周刊：麻烦在哪儿？降低语言的门槛之后会让你损失掉什么表达吗？

马伯庸：语言的门槛降低之后，首先损失掉的就是信息量，口语带来的信息量是不够的，尤其对于细节的描写。虽然写的时候是很畅快的，但这种畅快是很危险的。习惯了口语写作之后，想回到正常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就好像天天写口水词，写多了之后忽然让你写一个高雅的东西，整个人就会找不着感觉。所以后来我也不执着于某一种文体，而是用适用于主题、故事的文体。像《古董局中局》，更接近民间的故事，用口语化的传达大家会觉得比较合适。写《长安十二时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迅速的反恐故事，我就尽量用短句子，尽量用精准的描写制造出一种节奏感和速度感，而不是去过度地铺陈氛围。《两京十五日》我就把速度和文字的厚重感放回到明代的那种感觉。再后来到《长安的荔枝》又回到盛唐的那种雍容。其实每一部小说的文体、文笔都会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到自己在日常生活里会有意识地去做一种观察训练，比如坐地铁的时候去猜谁快要下车了之类，还说那需要保持一种中二的态度。很多写作者在日常里都有类似的观察习惯，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说它“中二”？

马伯庸：它是一种不太成熟的、好玩儿的尝试。所有的创作者一定都是不成熟的，当一个人足够成熟之后，他就不想创作了。就好像一个老禅师一样，已经人淡如水，看清世间一切，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有看不破世界，你才有想表达的东西。一个人只有正在经历世事，有愤怒、有情绪、有遗憾、有兴奋，他才能成为作家。归根结底，作家是靠荷尔蒙写作的，如果没有激情的话，写什么都没劲了。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中读 江苏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看懂中国

第二季

爆款续篇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

总序 刘东



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



女性 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名近代中国女性研究学者

移民 梁永佳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人类学研究》主编

医学 高晞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

环境 侯深



环境史学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城市 季剑青



北京大学中文系
长聘副教授、研究员

乡村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政治学学部部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排名以课程上线顺序时间为准

立足全球 聚焦中华文明

七位学者 拉开历史帷幔

六大维度 看清社会细节

扫码了解更多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文学可以做什么？

主笔 · 蒲实

“虚构让现实充满了明亮的意义感。”


(TPG/alamy 供图)

本雅明 · 拉巴图特

智利作家本雅明·拉巴图特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一出版就引起了我的兴趣。讲述科学家与数学家的史书和传记汗牛充栋，拉巴图特则大胆地独辟蹊径：用小说家的方式来重新虚构这些历史上真名真姓的人物，比如“黑洞理论”的提出者卡尔·史瓦西、法国数学大师格罗滕迪克与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

与其说是史实性的内容吸引了我，不如说，是拉巴图特骑士般冲锋陷阵的写作方式震慑了我，他以小说家驰骋的想象力在严谨的科学和历史领域信马由缰地闯荡，突破了非虚构的范畴。且来看看他是如何写奠定了现代几何学大厦的神级人物格罗滕迪克的吧：“他的性冲动完全可以和他的精神追求相匹敌。他一生引诱过许多男人和女人，和妻子生了三个孩子，婚外还有两个。”

以及对他隐退之后生活的描写：“他开始禁食，一周一次，然后是两次，自我摧残渐渐成了习惯，以至于他对肉体的疼痛几乎变得无动于衷：有次去加拿大，他拒绝换上普通的鞋子，而是只穿着他那双凉鞋就踩上了雪地，俨然一位在冰封旷野上传播好消息的先知。……诸如此类的举动助长了他的批评者们故意散播出去的那些流言……其中最离谱的一条说道，他为了减少自己对地球的影响，会把屎拉到一个桶里，随后他会到他家前后左右的农场里去转上一圈，把它当作肥料撒到地里。”

很可能是因为我接触到的关于格罗滕迪克的资料有限，仅就这些语句的写作方式来看，拉巴图特不是在考证数学大神的私生活，而是以一位小说家的身份在对其进行无需置疑的想象和虚构。有人会因此感到深受冒犯吗？作家自己曾担心过对现实的“篡改”可能会导致争议甚至招引愤怒吗？然而，就像一个小小的奇迹，他的虚构得到的是文学界的赞誉：这部书被列入了 2021 年国际布克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短名单。

后记中的《夜晚的园丁》虚构了一个充满隐喻的作家自身的故事来解释了这本书的缘起。“我”在一个无人小镇的山里认识了一位在晚上做园艺的园丁，这位园丁曾经是搞数学的，读过格罗滕迪克的著作。与那些书写创造性时刻的文本不同，《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是迷惘的而不是狂喜的，对人类命运充满幻灭感而非乐观的希望，因为新知边界的拓展带来的是失控的忧虑而不是更强的掌控感。这种创造性、疯狂和死亡之间的关联，是通过夜晚的园丁对柠檬树死亡过程的描述来表明的：“假如它们撑过了干旱和病害、不计其数的虫子、真菌和瘟疫的袭击，从而来到了晚年，它们会因过度繁荣而死去。一旦抵达了生命周期的终点，它们会最后结出一大茬的柠檬。……然后所有果实会一同成熟，把整根整根的树枝都压断，再过一两周，周围地上就都是腐烂的柠檬”。

多奇怪，濒死的繁荣，如回光返照，正如人类已然失控的无节制的增长。正是数学与科学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每一次对世界的进一步理解，都制造出了更大的谜团。

以下是对拉巴图特的书面采访。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被认为“模糊了历史、回忆录、散文和小说的边界，创作出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是什么启发了你用虚构和非虚构融合的方

式去写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科学家与数学家？你的灵感来源于何处？

拉巴图特：这本书并非“半虚构，半非虚构”作品，而是完全虚构的建造。我变换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虚构，包括采用不同的文体——一篇散文，两个短故事，一个中篇小说和一篇半自传性质的诗化散文。正如小说中的数学家格罗滕迪克所说：“一种视角从本质上来说是有限的。它只为我们提供了欣赏风景的单一角度。只有将同一现实相互补充性的视角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获得对事物的知识更完整的理解。我们试图理解的事物越复杂，越需要一组相互不同的眼光，当这些不同的光束汇合时，我们才能看到多样的统一性。”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最佳的灵感来源。

这些灵感最终源自于一个地方：他者。它是你自己非常亲密但又感到陌生的一部分。它好像完全不是你，却又轻声细语地低声向你诉说，如果你允许它诉说的话。我任由我自己的痴迷占领我自己，用足够的专注打量现实，等待着一些事物突然跃入我的脑海，就像我小时候做的噩梦或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恶魔一样。它们藏在我们的床下，提醒着我们，世界上存在着远比人类更神奇和强大的事物，我们永远也无法控制这些事物。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写作的时候，会给自己设定一些特定的界限，以不伤害真实性吗？

拉巴图特：文学与科学及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被赋予了可怕的自由。文学需要照顾的界限和限制极少，除了那些如果取消了其界限和限制就会变得没有灵魂、让世界观贫瘠的东西：诚实、美、对称和残酷无情。一本书应该像这个世界自身一样，神秘、危险和令人惊异。在我看来，伤害真实性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文学只回应它自身信仰的召唤。这也是虚构世界的奇异真理：在这个祭坛上，作家可以献祭他所处理的所有东西，无论是历史、哲学、记忆还是科学。文学是一位要求苛刻的神灵，一位极度饥饿、几乎不剩任何权力的神，但它却仍然可以为我们的生存无法离开的意义提供不断的源泉。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决定你要写谁？这本书的五个故事间有实质性的纽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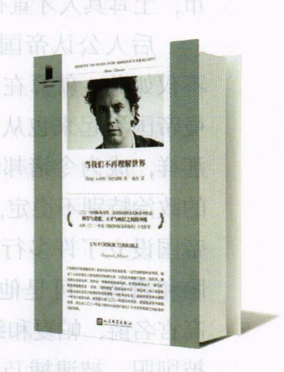
拉巴图特：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我相信书是影响的产物，否则，它们就应该来自你自己，解答你自己的欲望，也与我们这些作家一样贫穷、美丽和富有同情心。所以我倾向于要求、祈求或祈祷灵感。如果你足够幸运，它将如暴雨一般降临于你，那时，你只需抱紧你自己，期待最好的结局。这五个故事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对深渊和虚无的迷恋，对最不可知的事物的探寻。它是对事物“心之心”的爱，在那里，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任何奇迹。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虚构的部分让这些故事如何与历史上的原型区分开来？

拉巴图特：虚构让现实充满了明亮的意义感。它赋予世界一种人性的形状，让我们人类能够以对其他生灵来说不可能的方式居住其间。所谓的“客观现实”被剥蚀了灵魂，它砍掉了人类和自然所具有的许多神秘面向，只剩下我们都知道的一些悲伤和普通的事件。虚构却像幽灵一般影响着现实，它为世界提供了它的内核所欠缺的东西：意义，目的，理智。我们的生活，还有我所写的那些人的生活，都没有可辨识的形状，布满了随机性、谜题与混乱，它们缺少一束光，这束光唯有虚构小说可以提供。它是一束刺眼得让人炫目的光，自身充满黑暗，却能够让我们看清现实不断向我们隐藏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害羞又腼腆，我们发明了虚构小说来将它砍开，将它窥个究竟。

三联生活周刊：落笔之前，你用了多长时间在头脑中形成一些清晰的肖像？当你开始写的时候，你如何想象这些科学家、数学家做出重大发现的关键时刻，并根据你自己理解，将其视觉化？

拉巴图特：首先我试图竭尽己力深刻地理解极为抽象的概念和思想。然后，我与它们拉开一些距离，让理性和非理性指引我达到一种浓郁而有生气的理解，这种想法的产生不仅源自于脑前叶，也诞生于精神中黑暗和深层的那部分。文学是一门关于黑暗的艺术。我们与影子打交道，所以我们也必须乐于承认，写作时常不是对真理的理解，因为它的血肉和它的激情都无关智慧或真理，而关乎神秘、悖论和矛盾。



本雅明·拉巴图特著作《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毁损、死伤和悲愁哭泣后的文学

文 · 云也退

就像古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宣告巴比伦将要荒芜一样，诗人菲克雷特对儿子说："那天，大地是个发着高烧的病人，它胸怀怒火，猛然晃动双肩，毁掉地面上的一切，使人坠入长久的悲伤和绝望之中。"

1566年夏天，苏丹苏莱曼二世最后一次出征。之前他连年率军出境作战，每一次的军队规模都超过上一次，他想保持一种奥斯曼帝国国力强盛的感觉，所以，他打的仗常常难以以胜仗或败仗来界定，因为他都不在乎这些。他这最后一仗，打的是奥地利人，跟之前一样，奥地利人避而不战，日复一日地跟奥斯曼大军周旋。

到了9月7日，72岁的苏莱曼猝然逝于军中。从1520年登基做苏丹，他执政46年，获得了"大帝"和"立法者"之称，他使帝国拓展疆域，容纳了更多的族群，将地中海上的希腊岛屿一个个收入囊中，促进了城市建设和市场繁荣。但他越长寿就越容易忧心，他总要怀疑帝国是不是过了巅峰，跟他本人一样开始走下坡路了，故此，他不得不一意孤行地坚持帝国穷兵黩武的老传统。他的遗体被做了防腐处理后置于轿中，跟以往一样身着皇帝的盛装，直到大军打下了一座被围已久的城市，土耳其人才宣布发丧，同时启程凯旋。

后人公认帝国的衰落正是从苏莱曼开始的。不仅如此，就算在苏莱曼最有作为的时期，奥斯曼帝国看起来也从未像昔日的罗马、盛唐或蒙元那样，成为令诸邦真正敬畏的霸主。因为奥斯曼的政治特别不稳定，历任苏丹大多自我感觉良好，帝国设立了许多行省，有许多地方大员、军队首脑和贵族，可是他们往往性格乖张，行事唐突。高官名爵、帕夏和维齐尔们，不论能干还是颟顸，被削职、被逮捕乃至耻辱地丢了命的事情实在太多，哪怕是苏丹，被废黜、逼宫、胁迫、谋杀的事例都举不胜举。苏莱曼之后的三百年，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就难觅一段较长的稳定期。

而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地理状况，仿佛也关联着这种现实。无论是在1453年之前的拜占庭时代，还是奥斯曼时代以后，马尔马拉海域水下蕴藏的神秘能量一直威胁着这座跨欧亚的名城。拜占庭千年史上，伊斯坦布尔有记载的震灾至少有17次，而自从1453年奥斯曼取代拜占庭后，大海消停了一段时间，在1509年又来了一次强震。地震不仅带来物资和人员的损失，还让人焦虑、凄惶，他们无法预见帝国能存续多久，而把震灾看作衰亡的征兆。

16～17世纪的马尔马拉海域比较平静，一直到1766年，也即苏莱曼大帝逝世整整二百年之际，地震忽然又连续发生，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5月22日，后来测定为里氏7.5级，剧烈摇撼到了首都的地面。它照例导致了毁损、死伤和悲愁哭泣，但还带来了另一种产品：文学。有想法的文化人直接把他们感受到的衰落气象同人的堕落联系在了一起，作成诗篇。在如今依然能看到的因这场地震而生的作品中，有一篇诗文，是一个名叫贝德罗斯的伊斯坦布尔医生写的，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可以说是每个人的心声：

谁给出这愤怒，它从何而来？
是上帝，让我们看清我们的罪过。
所以要永远铭记，永远不能忘。

贝德罗斯说，上帝有权惩罚我们，他代表所有受害者说："我们，你的仆从，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匍匐在你的圣恩面前。"在他看来，人们淡忘了"圣言"，城市放弃了敬神的习俗，人们为了谋生而仰赖各种技能与学问，更次的则是仰赖他们的财产（如地主和放贷者之类），因而不需要"圣言"，无论是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愚民，都同等地忽略圣书里的戒律。贝德罗斯不无悲愤地说：他们从没想到过自己会死吗？在想到的时候，从未对此感到不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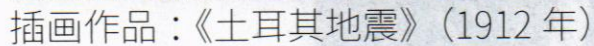
人们在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的一座清真寺里阅读和交谈（约 1900 年）

诗篇里当然少不了对忏悔的呼吁。贝德罗斯写道："让我们都忏悔，忏悔，忏悔，忏悔，忏悔吧 / 在仁慈的上帝面前，千百次地忏悔 / 那些看见和看不见的人，让他们都忏悔吧。"要从天怒之中获救，唯有忏悔一途，在这方面，不同的作者的用词不会有多少差别。

贝德罗斯实际上不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民族——土耳其人。他是来自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在基督教世界里扎有独特的根。不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奥斯曼土耳其虽然重视武力，却很少用武力来迫使人们改信仰，这种宽容度是帝国给人的好感的主要来源之一，西方的旅游者以及文人总爱赞美这一点。实际上，奥斯曼的统治者一向不怎么强调民族观念和信仰的是与非，他们热衷攻城略地，却对在国境内生活的民族和信仰群体不做区分——多半也是因为懒于区分，因为那些东西过于复杂琐碎。

伊斯坦布尔就是在这种宽容氛围之下繁荣起来的。1766 年出现的另一部地震史诗，作者同样是亚美尼亚人，名叫米纳斯·切里亚诺奥卢，他也认为地震完全是人的罪恶招致的天罚，不过和贝德罗斯的侧重点不同，切里亚诺奥卢觉得伊斯坦布尔社会自身的驳杂兼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个城市里，每个虔诚的人只要足够诚实，都可以指出众多的"邪恶"行为，并产生世风日下、神明被亵渎之感。

1509 年伊斯坦布尔的一次地震被基督徒作者称为"小启示录"，意思是说大概能看到《旧约·启示录》里的场景了，也就是一个天塌地陷的决斗场样子。做这种"创作型"的记录本身就是在对自然灾害做解释。不论作者属于三大一神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中的哪一个，都会在描写地震的时候添加末日想象的神学内容。不过，这种浸润了信仰的诗文也并不全是单调乏味的。诗中对灾难场景的描述，可以让我们瞥见当时公共生活之一斑：除了当仁不让的中心建筑——清



插画作品：《土耳其地震》(1912 年)


《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内部景观)

真寺、教堂、犹太会堂等之外，伊斯坦布尔还有一些重要的公共设施——公共浴室、旅馆、大巴扎、咖啡馆和济贫所。

它们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礼拜场所，因为其“公共”属性运行在生活的基本层面上。大巴扎里什么人都有；在佩拉区的酒馆里，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通常是商人）以及来自欧洲的商人或游客一道喝酒的场景，可以说是该城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此外，这几类人还会互访对方的工厂和商铺，谋求合作；出去办事的基督徒把孩子托给穆斯林邻居看管，犹太人和基督徒把离婚和遗产案子交给伊斯兰法院处理，都是常见的事。这些事实不意味着族群之间毫无问题，但城市居民基于混居的不可避免，是一定会去谋求让彼此舒服的相处之道的。

更可一提的是澡堂，对女性来说，公共澡堂的意义尤其重大。一神教都是父权制的，尤其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对女性的行动穿着约束甚多。当伊斯坦布尔的犹太社区成为一道“风景线”的时候，犹太女性每个礼拜都在盼着唯一的一次外出活动：她们（出于安全起见）结伴走上街，到澡堂清洗身体，再吃饭、唱歌、演奏音乐。也许不同的族群对土耳其人的统治有自己的意见，但若能生活在这样一种画风的首都，他们不难产生“在地”的感情，对礼拜场所、澡堂、酒馆乃至纪念碑之类，不同的居民都能感觉到有自己的一份。

因此，米纳斯·切里亚诺奥卢在他的诗篇里感慨人的罪恶和神的愤怒的同时，也叹息了伊斯坦布尔遭到的破坏，他称城市为“我们的伊斯坦布尔”，“带着花园的伊斯坦布尔”，他哀叹“大家庭”蒙受的恐怖的损失，在他的心目中，城市属于它所有的居民甚至偶尔到来的访客。

共命感会在忏悔游行中继续加强。地震后的未死者会从圣索菲亚大教堂出发，前往各自的教堂——如果没有倒塌的话。痛苦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减轻很多，然后人们各自祈求自己的神宽恕罪过。对死亡的恐惧也因此而纾缓。对帝国衰落的感觉和对城市的怜惜，在人们心目中是并存的。帝国很难在各色人等中唤起普遍的眷恋，但城市却可以做到。

当伊斯坦布尔遭遇下一场大震灾，要到 1894 年了。这一次的“灾难文学”在描述灾难本身的时候跟之前也没有多大差异。有的诗人写到了从土耳其浴室里赤条条往外跑、往外跳的人们——地震不凑巧地发生在他们享受洗澡的时间。有人记下了人们因为恐惧至极而呆立在原地的样子，渐渐清醒的人则下意识地蹲了下来，缓和内心的哀伤。一些人冲进大巴扎里避难，不料上方的穹顶倒下，把他们砸死砸伤。交通工具是另一种具有画面感的受害者——只需想想马车被震波掀翻，船只被兴起的大浪打翻时的样子。

有一部组诗是一名军校的学生哈立德·额芬迪写的。军校里人群聚集，他说，就在他们上课时，教室开始晃动，学生们一愣之后立刻开始恐惧，然后就是

哭泣，感到仁慈的真主在降罪了，人们纷纷口念“安拉”，脚下却在往外挪动，但又害怕发生踩踏。操场上都是废墟，哈立德逃出来的时候安然无恙，于是深深感激真主的拯救。他说，自己筋疲力尽、失魂落魄地朝家里走，去看看自己的家人怎么样了；他说，所有等待他们的事情都来自不可动摇的安排：“我们已准备好接受神的命令……所有人都满面泪流。”

活着的人们到处祈祷，感谢神的恩典让他们活着。当消防员到达，开始分别进攻起火点时，这位哈立德非常感动，他说消防员“如同飞蛾一般”。他们也有伤亡，但哈立德在人们的勤奋劳碌中看到了生机，劳碌的工作场景同样是真主赐予人类的启示性的现象，是神爱世人的表现。

埃什雷夫是那时的一位很有名气的讽刺诗人。他写的地震主题的诗，无心描写受害者的痛苦，而是讽刺在天灾面前依然不愿愀然自省的人。他说，巴扎的穹顶坍塌砸死了这么多人，这可不是简单的灾难：“真主是一位制帽师，为了惩罚人而给他们戴上帽子！”另一位诗人特菲克·菲克雷特的观点又有所不同。他写了一首给儿子讲地震的诗，诗中的口吻似乎把自己看作圣书中的先知。就像古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宣告巴比伦将要荒芜一样，菲克雷特对儿子说：那天，大地是个发着高烧的病人，它胸怀怒火，猛然晃动双肩，毁掉地面上的一切，使人坠入长久的悲伤和绝望之中。

菲克雷特的作品甚多，生于1867年的他，后来被视为土耳其现代诗的开山之人。在逼近世纪末的特殊情绪中，他跟一些同龄的同道一起编辑先锋诗刊，翻译介绍国外的诗歌，尤其是法国诗人马拉美那一派象征主义作品。他在自己的诗作里加入了很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表述，从而令普通读者看不懂，且可以躲开政府的审查。那是一些十分紧张的年头，帝国从苏莱曼大帝逝世开始画出的衰落弧线是如此之长，眼看着昔日的荣光彻底暗淡，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一度共处的族群和宗教人群各自散去，政府在失控的焦虑中加强了专制手段……末世的征象尽显，但无人能预知帝国会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终结。

奥斯曼的末代苏丹统治时间也很长：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876年就登基了，他早就有心以主动拥抱现代化来振兴帝国，他也有心使奥斯曼脱离以往野蛮而幼稚的政治文化，谋求那些崛起的西方强国的承认。但是，整个19世纪运行到那时，“分”的趋向已明显盖过了“合”，民族意识的觉醒根本性地分裂了昔日跨三大洲的帝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等原本模模糊糊地属于帝国的民族，现在都脱离了出去，或者转投其他新兴的势力，例如俄罗斯；而像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这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也早就失去了对奥斯曼的认同。帝国统治者对此的回应是加强了歧视性政策——他们不像一百年前那样，相信帝国能塑造来到其中的每一个人了。

虽然交通手段的提升给伊斯坦布尔带来了更多的西方客人，但夸赞奥斯曼的人，则只剩下像法国诗人奈瓦尔这样，一向对异域充满向往的文化精英了：他们夸赞奥斯曼的理由，正如对往日的拜占庭的怀旧，他们说它政治影响衰微，精神文化丰富，虽然贫穷、疲弱，但拥有漫长、独特、多元性十足的过往。

根据苏丹的一名文员的讲述，1894年震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从他办公的宫殿跳进屋外的花园里的。震后，他立即在耶尔德兹宫诵读了《古兰经》里的有关篇章，又命令每个活着的人虔诚沐浴并履行其宗教义务；他诏令每个人做祷告，还诏令一位总督在伊斯兰的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诵读祈祷文，希望结束地震。他把重建伊斯坦布尔的任务交给了法国建筑师亚历山大·瓦劳里总负责。然而，处于世纪末的奥斯曼首都，即便没有地震的摧残，其根基也已丧失殆尽，因为形成大型的、繁荣的社区的大多数族群都消失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不再活跃，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离开（或被迫害致死）带走了重要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伊斯坦布尔的新居民都是些原先在巴尔干地区、沙俄境内的穆斯林移民，他们从未体验过真正的城市生活。

1894年后的数年里，在西海岸的艾登，在马尔马拉海另一端的巴勒克西尔，地震接二连三地发生，但更为严重、范围更大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地震：1896年，当亚美尼亚人的达施纳克党接管了帝国银行的消息传出，土耳其人向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发起了屠杀。帝国来到其衰败的谷底，也丧失了它仅存的一绺好名声，即昔日英国首相迪斯累里所说的“宽容的保守主义”。它走上了民族纯化的道路，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在1908年发生，那之后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电影《杀死比尔 2》(2004 年)剧照

昆汀给我们推荐了哪些电影?

文 · 李孟苏

崇尚电影暴力美学的昆汀·塔伦蒂诺新出版了评论集《电影猜想》，上市一周内就挤进《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前五。在书中他列出了一张上世纪 70 年代的惊悚片目录，角度颇为独到。

昆汀·塔伦蒂诺总说，拍够 10 部电影他就退出电影界，专心写小说，搞电影文学创作。他的想法是，如果将来不再站在摄像机后面，写书倒也是一种保持创造力的方式。他一直坚持说分两部上线的《杀死比尔 1、2》是一部电影，这么算来他拍了 9 部电影，但书已经出了两本，分别是 2021 年出版的电影小说《好莱坞往事》和 2022 年 11 月面世的《电影猜想》(*Cinema Speculation*)。两本书反响都不错，特别是《电影猜想》，上市一周内就挤进《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前五。

他选出若干部 1968 ~ 1981 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有《生死狂澜》《誓不低头》《日落黄沙》《出租车司机》等，都是他在童年、青少年时期看过的美国电影史上的“关键电影”，加以分析、评论，再巧妙地穿插进自传性的散文，让这本书既是一部思想严谨、见解深刻的评论集，也是一本生动有趣的观影回忆录。对影迷和他的粉丝而言，书透露了他的私人趣味，更是荐片手册。《每日电讯报》评论，看这本书“就像翻阅《国际银幕》杂志发黄的过刊。你会觉得塔伦蒂诺本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好莱坞八卦专栏作家”。

银幕上的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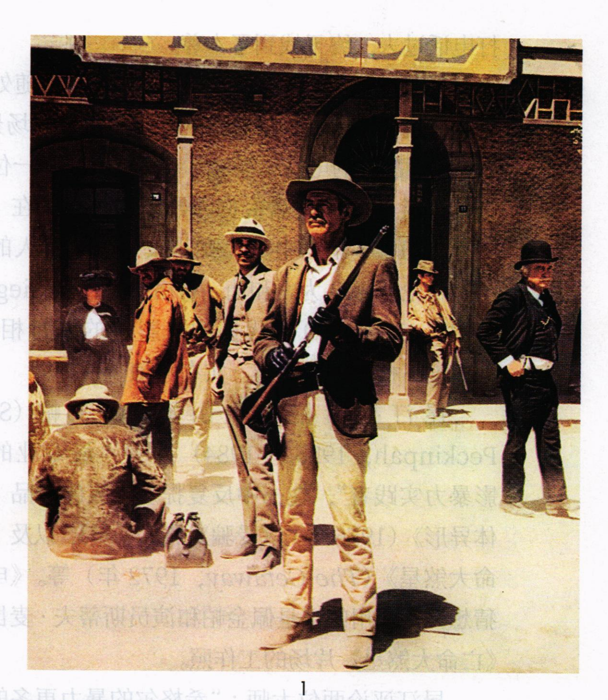
昆汀·塔伦蒂诺9岁那年，妈妈康妮的男朋友、职业橄榄球运动员雷吉带他看犯罪惊悚片《黑冈恩》（*Black Gunn*，1972年）。雷吉是黑人，带他进了黑人社区的影院，看电影前给了他20块钱，让他想吃什么零食就尽管买什么。《黑冈恩》由黑人明星吉姆·布朗主演，观众们情绪高涨，随着剧情呼啦啦地大喊大叫。他是全场观众里唯一的一个白人，他被热情感染，有一种叛逆的快乐和吃了禁果的刺激，电影中的英雄、带他来看电影的男人，都激发出他对男性规范、阳刚气概的迷恋，第一次感受到暴力美带来的快感。

昆汀以为妈妈会嫁给这个男人，但他再也没有见过雷吉，每当提到雷吉，妈妈只是耸耸肩说："嗯，他就在附近。"《电影猜想》以这段回忆、这部影片开头，他写道："在某种程度上，我穷尽一生去看电影、拍电影，正是努力重现那种体验。"那种体验混合了暴力和温柔，令他欲罢不能。

《电影猜想》里评论、推荐的都是鲜血"几乎喷入摄影机的镜头"的电影。比如导演唐·希格尔和演员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珠联璧合的警匪片《肮脏的哈里》，电影开始，杀手埋伏在摩天大楼的屋顶，通过步枪的瞄准镜窥视楼下泳池里游泳的年轻女子，接下来，她的背部中弹，池子里的水变红了。在此之前，好莱坞电影里很少有这种随意的杀戮情节。

昆汀对银幕暴力有一种病态的迷恋。他的第一部作品《落水狗》（1992年）有个场景，金先生手拿剃刀，围绕着被捆绑在椅子上的警察人质轻快地跳舞，轻松地割下了警察的耳朵，举着耳朵对它戏谑地说话。虐待狂伴着《和你一起困在中间》的背景音乐肆意折磨猎物，将酷刑当作娱乐，这样的画面令人毛骨悚然，为此英国好几年不许在国内发行《落水狗》录像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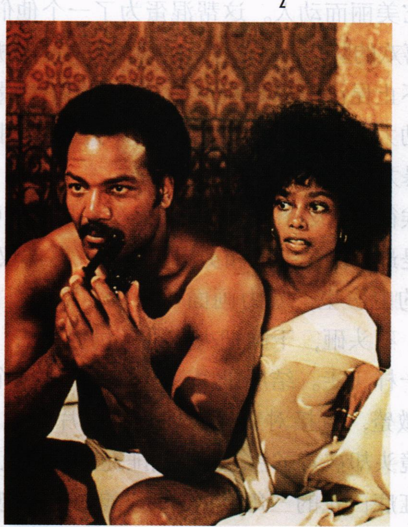
他很推崇《雷霆万钧》（*Rolling Thunder*，1977年），说这部电影是"迄今为止角色研究和动作片的最佳结合"，直接点燃了他做导演的热情。他回忆19岁采访该片导演约翰·弗林的经过：在电话簿上找到所有名叫"约翰·弗林"的人，一一



1



2



3

1. 电影《日落黄沙》（1969年）剧照

2. 电影《尸骨无存》（2002年）剧照

3. 电影《黑冈恩》（1972年）剧照

打电话过去，终于找到了本尊。

暴力串起了昆汀的电影，他的书中也随处可见用愉悦笔调写出的他看过的电影中的暴力场景：亨利·哈撒韦的电影《死吻》（1947 年）把一位坐轮椅的老太太推下楼梯，德国导演弗里茨·朗在《大内幕》（1953 年）中将热咖啡泼到一个女人的脸上。塔伦蒂诺认为，和唐·希格尔（Don Siegel，1921 ～ 1991）70 年代拍的电影中的暴行相比，把人推下楼梯、泼咖啡，实在不值一提。

昆汀把希格尔和山姆·佩金帕（Sam Peckinpah，1925 ～ 1984）并列“最专业的电影暴力实践者”，在书中反复提及二人的作品《人体异形》（1956 年）、《受骗》（1971 年），以及《亡命大煞星》（*The Getaway*，1972 年）等。《电影猜想》封面用的正是佩金帕和演员斯蒂夫·麦昆在《亡命大煞星》片场的工作照。

昆汀评论两位大师：“希格尔的暴力更多的是表现残忍，而不是直白地流血。”佩金帕被称为暴力血腥动作片的鼻祖。他的西部片偏爱非写实的手法，采用慢动作拍摄激烈的动作戏，形成“血洒芭蕾舞”的视觉效果。这么拍出来的《日落黄沙》（*The Wild Bunch*，1969 年）成为西部片的代表作。塔伦蒂诺写道：“血腥山姆喷涌而出的红色血弹更接近于液体芭蕾和涂成深红色的视觉诗歌……《日落黄沙》带来的震撼不仅仅是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画面，还有我们对所看到画面的反应。它美丽而动人。这帮混蛋为了一个他们都不怎么喜欢的队友，不惜冒一切风险，真是美极了。”

不止昆汀一个导演视暴力为他们拍电影的某种驱动力，从电影诞生那天起，导演们在银幕上表现暴力行为时已无所不用其极。

埃德温·波特的西部片《火车大劫案》（1903 年）是最早经过编剧和剪辑的电影。这部仅长 12 分钟的电影里，暴力画面可不少，殴打、捆绑、拳击、石头砸，干脆把火车乘务员扔下去，人像纸片一样飞走。结尾是个著名的镜头：一个劫匪眉头微蹙，直接对着镜头射击。全片是黑白的，这个镜头却被着了色，看得到匪徒穿着绿色衬衣，系着红底白花的三角领巾，让当年的电影观众甚为兴奋。这部电影被定义为是美国电影制作中最重要的“飞跃”之一，因为它讲了一个基于极端暴力的故事。

西班牙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的《一只安达鲁狗》（1929 年）被誉为超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开头是一个男人懒洋洋地抽着烟，磨着剃须刀，把刀举到一个女人的眼睛前方，随后他割开了眼球，溢出的黏稠液体让眼球成了一个溏心蛋。

昆汀对这些前辈导演有着近乎恋人般的崇拜，他的好莱坞是一座偏执的、推崇男性为统治者的修道院。

对暴力电影的思考

电影浸透暴力当然不是因为有了希格尔、佩金帕、塔伦蒂诺，也不是因为希区柯克、斯派克·李、凯瑟琳·毕格罗。

昆汀在《电影猜想》中从美学和叙事两方面对暴力电影进行了思考。他 9 岁那年被带去看惊悚异常的黑人犯罪片《黑玫瑰》（*Melinda*，1972 年），妈妈康妮深有顾虑，对他说：“嗯，昆汀，这电影太暴力了。倒不是说我看这电影一定有困惑，但你是看不懂这个故事的。所以说，如果你不了解暴力发生的背景，那你只会为了暴力而观看暴力。我不希望你这样做。”

康妮为儿子指出了底线，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银幕上的暴力，其发生的背景至关重要。白色的巨无霸大白鲨在海水里逡巡，会让人紧张得颤抖，但只要观众看到暴力背后的动机，他们就会接受残忍的画面。塔伦蒂诺写他小时候看这种电影：“我可以接受这样的画面，因为我理解了这个故事。”反而在看迪士尼动画片《小鹿斑比》时，看到斑比的妈妈死了，他心情难过得远远超出看当时最极端的暴力电影。

曾有记者问塔伦蒂诺，“你一个黄口小儿看惊悚犯罪片，有没有被检票员拦着不让进？”塔伦蒂诺回答：从来没有过。它们都是 R 级电影（限制级，17 岁或以下的观众需在成年监护人的陪同下才能观看）。没有什么是 X（即 NC-17 级，17 岁或以下不得观赏）。你的父母可以带你进来看 R 级的电影。这就是制定 R 级的意义所在。

美国导演柯比·迪克（Kirby Dick）的纪录片《影片未分级》（*This Film is Not Yet Rated*, 2006年）中提到，美国电影评级委员会的成员往往对银幕暴力感到异常困惑。当电影涉及性爱，特别当相关场景描绘的是同性恋者，他们更有可能把影片评为限制性的NC-17级。“恶趣味之王”、美国喜剧片导演约翰·沃特斯在迪克的纪录片中说：“暴力是好东西；性爱不是。”

昆汀15岁辍学，混迹江湖那会儿他做过色情电影院的领位员，在音像店卖过录像带。他看了店里的每一部电影，无可争议地成为音像店的电影知识之王，积累了惊人的看片量、阅读量，他认为整个70年代是美国电影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他把这个观点拍成了电影《好莱坞往事》。

他在书中分析了原因。70年代美国电影表现暴力时“怎么拍都行”，不乏纵容，这就催生出无数好电影；相比之下，80年代的电影首先考虑的是“讨人喜欢”“不敢冒犯任何人”，拍出来的电影自然拘谨刻意。“如果你真的拍了一部讲混蛋的电影，可以打赌，这个混蛋一定会幡然悔悟，并在最后20分钟得到救赎。”

昆汀所有的电影都是伪装成疯狂屠杀派对的轻快娱乐。他深知观众厌倦了只讲述黑奴苦难或大屠杀的电影，他们希望受害者蜕变为“胜利者和复仇者”“以血还血”，银幕审美暴力是“宣泄”，“对灵魂有益”，能够满足道德幻想：好人得到奖励，恶人受到惩罚，而越是残暴的清算就越令人欣慰。谁也不愿做斑比，母亲被害，却从未报仇。

一些电影制作人对如此暴力的银幕深感震惊和困惑。《唐顿庄园》的创作者朱利安·费罗斯在一个采访中说：“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没有暴力。我并不是说你绝对没有目睹过暴力事件，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我一生中可能只看到过两次真正的打架斗殴，但我晚上看部电影就能看到6场打架戏，我真的不明白其中的逻辑。”在费罗斯的作品中，确实不太可能看到女仆和管家在厨房里挨揍，也不会有公爵夫人被砍头的情节。他一向乐于在影视剧中描绘粉色的怀旧梦境，哪怕是他编剧的凶案片《高斯福德庄园》，被害者死得也很干净，刀子捅进胸口几乎没有溅出血迹。

创作者探索道德灰色地带的尝试，挑战隐含暴力的勇气，统统让位于好莱坞式的幸福结局。80年代的电影大多数有个大团圆的结局，看到开头就知道结尾，所有电影不断重复一句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土拨鼠日》里比尔·默里过的日子——每天都是2月2日土拨鼠日。当然与70年代的电影无法相提并论。这些电影里看不到佩金帕《稻草狗》（1971年）结尾处的高潮，老实木讷的学者达斯汀·霍夫曼不堪村民的一再欺凌，终于拿起枪，以暴制暴。也不可能有库布里克《发条橙》（1971年）中，小流氓一边唱《雨中曲》一边施暴，不忘讽刺羞辱受害者的作家丈夫。

还有，谢尔盖·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1925年）中，一辆失控的婴儿车从敖德萨阶梯上躺着的尸体旁辚辚坠落；在威廉·韦尔曼的《国民公敌》（1931年）中，詹姆斯·卡格尼饰演的歹徒把半个橙子杵到女朋友的脸上；希区柯克让珍妮特·利在淋浴时被疯子用尖刀刺死（《惊魂记》，1960年），于是浴室凶杀盛行了60多年。2022年的新片《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马丁·麦克唐纳仍要切掉男主角的手指，用令人感到恶心的残指断面来暗示角色的决绝。这些在电影史上、在观众记忆中不可磨灭的血腥场面保证了电影的艺术完整性。

塔伦蒂诺拍《无耻混蛋》时拉了个合作伙伴：伊莱·罗斯。罗斯独立导演的第一部惊悚片是以森林小屋为背景的《尸骨无存》（*Cabin Fever*, 2002年），片中数次出现被病毒腐蚀的人体，与这血腥同比的是梅尔·吉布森执导的《耶稣受难记》（2004年），片中罗马人敲钉子的锤声，十字架上耶稣鞭痕累累的身体，从钉孔流出的鲜血又滴进泥土，那痛苦似乎被鲜血浸透了2000年。

这正是悖论。屏幕暴力固然是虚构的，但也被批评为无脑，针对观众群体的兴趣进行剥削，利用色情和暴力元素最大限度刺激观众的欲望，且煽动潜在的模仿者。费罗斯说得没错，暴力与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极少有交集。然而，自从电影被发明出来，银幕上最生动、最值得定格的时刻，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观众珍藏于记忆的场景，都是基于野蛮的暴力表演。



《前世》：颠覆爱情电影，超越身份政治

文·陈凭轩（发自柏林电影节）

怎样与过去告别，但又不否认、不藐视它？怎样正视、接纳自己的过往，和因之而生的全部情绪？这是所有人穷尽一生的修行。

韩裔加拿大籍剧作家、戏剧导演席琳·宋（Celine Song）坐在纽约曼哈顿东村的一家酒吧里，一边是她的美国丈夫，另一边是从韩国来看她的青梅竹马。人们的目光在这样的空间里相互交错——在旁人眼中，他们是个奇怪的组合，很难一目了然地看出三人间的关系。那一瞬间，席琳·宋产生了言说的欲望，她想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讲述这三个人走过怎样的人生历程才在那个夜晚聚在那个地方。

这个场景作为创作的触发点，成了席琳·宋长片首作《前世》（*Past Lives*）中的第一幕。它给人一种爱情轻喜剧的感觉：两男一女坐在酒吧里，画外音中的看客在揣测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在一部美国电影中看到两个亚裔面孔，也为观众制造了"移民叙事"的期待。一个是类型电影中最庸俗的桥段，一个是近年来最热门的身份政治，已经足够让柏林电影节上刻薄的影评人翻起白眼。

该片几周前已经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现在又被选入柏林主竞赛。实际上，《前世》在圣丹斯的媒体反映就很热烈，Indiewire、《综艺》、《卫报》等都对其给予极高评价。但美国的电影记者最容易被身份政治绑架，所以其他地方的影评人还是对他们的反应持保留态度，直到《前世》在柏林电影节《国际银幕》场刊上拿下3.6的最高分（满分4分），大家才开始正视这部圣丹斯走出来的"爆款"。可惜今年的主竞赛评委似乎对乍看之下较为独特的电影比较感兴趣，这部在形式上相对收敛的作品没能



左图：电影《前世》剧照

右图：韩裔加拿大籍剧作家、戏剧导演席琳·宋（左二）和参演《前世》的主要演员们合影

得到评委们的青睐，在金银熊颁奖时空手而归。

影片工整地分成三段，相互间隔12年，讲述女主人公诺拉（格蕾塔·李饰）童年、20多岁、30多岁时的人生际遇和情感生活。她在童年的末尾随父母移居加拿大，被迫与青梅竹马的海城（刘台午饰）分开。多年后，20多岁的他们一个在纽约读戏剧，一个在首尔学工程，通过社交网络重新找到彼此，并开始了一段远距离的暧昧。由于距离和不同的人生追求，这场网恋并没有结果，两人也走上了很难再有交集的人生道路。这几乎就是导演自己的自传，席琳·宋12岁随父母从韩国移民到加拿大，后取得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创作硕士，专攻戏剧。她在柏林记者会上大方承认，片中的情感故事很多都有生活原型。

但这绝不是另一部《米纳里》（*Minari*, 2020），即便两部电影的制片公司都是A24。对于席琳·宋来说，移民叙事是一个背景，是她人生的发生场所但不是目的，就跟白人编剧写白人经历一样。如果说在身份上有所诉求，她可能更关心自己的女性身份。她的戏剧作品*Endlings*（2019）用济州岛的"海女"（注：在日本、韩国，海女是一项古老的职业，指不带辅助呼吸装置、潜入海底捕捞为生的女性）与女作者进行对话，而海女文化最著名的就是其半母系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由女性从事对身体挑战极大的工作。

《前世》中，诺拉是另一种"女强人"，她有很强的事业心甚至可以说是野心，代表当代文化精英式的独立女性。在她绝对现代的爱情故事中，男女双方都不可能为了爱情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放弃现有的生活。演员格蕾塔·李说她不喜欢传统爱情作品中女性一旦陷入爱情就会迷失自我的情况，仿佛女人天生就有所缺失，需要用爱情——通常是跟男人——来填补这种缺失。而宋的剧本里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她是一个独立自洽的存在，爱情不是来修补她，而是使她更加丰富。

在人物关系上，《前世》颠覆了爱情轻喜剧这种类型对爱情的浪漫化，诺拉没有像过度戏剧化的爱情类型片女主一样，通过离谱的巧合或计划与海城走到一起，而是在一个几乎无趣的场合遇到了未来的丈夫亚瑟（约翰·马加罗饰）。导演又狡黠地捡起了这种类型作品中的"爱情三角"烂梗，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她的爱情三角中有尴尬和喜剧效果，但更重要的是有三个成熟的成年人，相互理解、支持，善意地解读每个人的意图。

影片第三段中，海城终于到纽约去找诺拉，这是他们分开20多年后第一次线下见面。亚瑟对此非常紧张，但他没有做出爱情类型片男配角惯有的夸张行为，而是选择对妻子倾诉自己的不安。

他说："你们是青梅竹马，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法跟他竞争。"但同时又说："那个男人乘了十几个小时飞机到纽约来就为了见你，我绝对不可能让你不去见他。但是我心里很不安。"如果说诺拉对事业的选择塑造了一个现代女性形象，那么两位男性对于爱情和情感的态度，就是宋所要的现代男性：他们有恰如其分的细腻和敏感，不回避自己的感情，不忽略情绪波动，同时也接纳他人的情绪，理解他们的人生际遇。他们相互尊重。

席琳·宋在运镜和剪辑上可能与主竞赛中的老导演还有一些差距，但她对人物的塑造和对空间的把握可以说是近乎完美，或许是因为老本行戏剧对舞台空间和演员表演的依赖。她说在创作过程中，不同的场景会受到不同电影作品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是《与安德烈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e*，1981），给了她的酒吧对话戏很多启发。这部路易·马勒的作品起初是要上戏剧舞台的，创作中才发现似乎更适合银幕。《前世》同样更适合银幕，镜头对眼神和肢体的捕捉，让创作者摆脱了对台词的依赖。于是导演将演员置于特定的地点和空间里，然后给出大量的留白，用视听语言制造情绪，用情绪讲故事，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口头语言退居二线。她要描摹的那种属于现代爱情的氛围和情绪状态，可能尚没有文字语言可以精准地表达。

男主海城的扮演者刘台午将这部电影理解为一种普世的经验，就是三个普通人在学习爱与完结，它可以超越文化、地域和年龄。但实际上，爱情这种受文化构建的东西，不可能是普世的。席琳·宋的作品真正普世的地方，是探讨人的局限和人生的遗憾。它不是苦难叙事，其中每个人物都过得挺好，都属于文化科技经济高度发达地区相对舒适的阶层。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不可消弭的惆怅和遗憾，这种遗憾似乎是人的一种属性，它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人对人还有需要和渴望，这样的需求就可能与个体的追求和际遇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人之为人的局限与无奈是普世的，它在片中以留白、沉默、对视这些同样普世的语言表达出来，打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影评人。

面对不能解决的问题，人就会诉诸超自然，所以导演反复提到 In-Yun 的概念。直接导致豆瓣上一度将片名误译为"前世姻缘"。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韩语中的"인연"，一般转写为"inyeon"，汉字"因缘"。是东亚几个国家都有的说法，也是一个佛教概念。片中做了解释，指人与人之间前世的关系，以及从而产生的今生因果，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都是有缘的。那些人所固有的遗憾，通过因缘的说法，也就得到了解释，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无奈与惆怅合理化，从而减轻痛苦。

与因缘紧密相连的概念就是前世与来生，也是片名 Past Lives 的由来。导演利用了它在英语中的双关义，一方面指前世因缘导致的今生因果；另一方面也是说，在移民、成长等多种原因作用下，诺拉与海城的过往已经仿佛是前世一般。他们最后的相遇，就是在埋葬这段逝去的人生，并为它进行最后的哀悼。豆瓣现用的译名"过往人生"显然就是指向后一种意义，但这样一来又丧失了因缘的含义。其实大可不必硬凑四个字，包括权威的《东亚日报》在内的韩国媒体，在翻译这个英文片名的时候，大都用"전생"，也就是简简单单的"前生"。既包含前世因缘的概念，也体现恍如隔世的变化与失去。

除了这两层显而易见的意义之外，"前世"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在影片临近结尾处，导演一路营造的氛围和铺陈的情绪达到了顶点，随时要爆发出来。片中人物梳理了几十年的因缘际会，就要卸下所有包袱与过去彻底告别。这时候诺拉对海城说，她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小女孩了，她有自己的生活、事业和婚姻，有自己的现实和理想；但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她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永远都会存在下去。怎样与过去告别，但又不否认、不藐视它？怎样正视、接纳自己的过往，和因之而生的全部情绪？这是所有人穷尽一生的修行。席琳·宋把诺拉与海城的过去定义为"前世"，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渐行渐远，也不仅是离散人群身份在某种程度上的割裂，而是要给这一段人生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因为是"前世"，所以它已经盖棺定论，不容否认、不能篡改，它真实地存在。它让我们在"今生"和"来世"都能得到慰藉。


2023.02
少年新知
第二期
少年
如何逛博物馆？
ISSN 2096-9740
国内统一刊号：ISSN 2096-9740
CN10-1742/C
邮发代号：82-51 定价：25 元
扫码购买



黑门之后，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

记者 · 陈璐

当大多数科幻影视作品关注在宇宙探索等题材上时，《黑门》少有地讲述了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的前沿领域。

《黑门》的时间设定在未来的 2058 年，脑机系统已经非常普及。一场蹊跷的公交事故牵扯出一种古怪的病症——“蜂群症”，并导致多方势力被卷入其中。与他人思维进行连接的“蜂群症”患者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在背后操控一切？

当大多数科幻影视作品关注在宇宙探索等题材上时，《黑门》少有地讲述了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的前沿领域。当科学进步和道德伦理开始发生冲突时，到底该如何平衡与抉择？最终，蜂群症被证明是一种人脑突变，当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体脑机用户因为某种原因，加入了其他用户思维，这种思维集群便可以形成一个超越单个用户思维的“蜂群”，从而实现“个人完全独立，目标高度统一”。所以，这是未来新人类的进化方向，还是消灭个体意志的人类危机？当分属不同立场、持有不同观点的角色们，根据自己信念展开行动时，故事触及了人工智能的伦理危机和潜在安全等议题，观众们也随之产生了许多的思考。

虽然题材小众，该剧却在垂直观众领域取得了良好口碑，在豆瓣获得 8.3 高分，B 站的播放量也突破了 3500 万。其实导演徐一超此前并没有执导动画的经验，他是名影视从业人员，同时也是个科幻迷，平日里喜欢写些科幻小说，早年和导演郭帆有过共同创作科幻影片的经历。当 B 站有





（本组图片：bilibili 供图）

本组图片：科幻动画《黑门》剧照

制作科幻动画的想法时，很快就找到了他。

B站给了徐一超一个命题，即“进化”。由于当时他正在关注脑科学领域，很快联想到了人脑进化和脑机系统的问题。“大家都听过这么句话：人类对于深海和人脑的探索，还远不及对于太空的理解。人脑结构非常复杂，它决定了人类如何思考和认知世界，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以脑为中枢去理解、接收、传达。我觉得科技一旦突飞猛进，人脑一定是我们持续深入探索的蓝海，所以很希望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徐一超本人就是个科幻迷，作为“80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从小就深受《黑客帝国》《星际穿越》等科幻电影影响。因为徐一超的爷爷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他儿时在那里度过很长时间，平日生活里常常接触的便是量子对撞机、天体物理试验室等。耳濡目染地，他经常会思考，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在这儿，它们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却有这么多人倾尽一生地去研究？这些事物本身便具有一定的科幻色彩，而在他看来，“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科幻小说，都是大家对过去和未来的一种总结、期待，甚至规划，它与全人类和全社会息息相关，是把自己的眼光放到更宏观的视角去汲取知识和经验”。

在《黑门》历时三年的项目制作过程里，剧本的撰写便花费了近一半时间，因为篇幅问题，最终故事呈现的仅是中段历史。为了让故事的逻辑自洽，首先创作团队对于故事的背景进行了详细推演，撰写了一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70年代的编年史，涉及中国未来历史的进展推演，以及脑机系统如何被发明到走入千家万户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为了确保《黑门》的科学严谨性，徐一超还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位脑科学、量子物理学、军事学等多领域专家学者，参与剧本的修改与把控。当人类在通往未知领域的“黑门”里不断探索，人类本身也面临着自我进化的十字路口。黑门之后，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这一切，还未有答案。

“科幻作品更像纯正的工业化流程作业”

——专访《黑门》导演徐一超



（受访者 供图）

徐一超

三联生活周刊：看到你在之前的采访里提过，最开始的预期是觉得《黑门》这个动画会没有人看，那当时为什么还想要做？

徐一超：影视创作、动画创作里确实有主流和非主流的概念。有些作品商业规划上是要尽可能符合大众口味，但影视创作市场化前的几百年、上千年里，很多创作者其实是发自内心地只是想要讲述一个故事，希望观众看到他的表达。《黑门》就是这样一个作品，有个比较古典的创作初心。如果你愿意听，坐下来把它听完，如果你觉得没有意思，也可以走开。我觉得市场除了商业化策划的作品之外，也应该给这样的作品留些空间，要允许我们这些小花绽放、活下来。

当然我不是说个人表达就意味着曲高和寡，我也在剧本上做了很多商业化的设计和努力，这首先是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像克里斯托弗·诺兰、乔纳森·诺兰他们这种传达清晰的作品。其实我在《黑门》放了很多小彩蛋，对《湮灭》《黑客帝国》《盗梦空间》都作了致敬。阿曼去找图毅母亲吴梅的时候，穿过的那段酒店走廊，是我的一个小小致敬，尽管那条走廊只出现了大概四五秒，观众可能意识不到，但对我来说这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黑门》是部高概念科幻，里面出现了很多概念比如“脑宇宙”“蜂群症”“心智鱼群”“量子调谐还原论”，对于观众都非常晦涩难懂，但我感觉因为美术设计的表现力很强，让人很容易进入到动画所构建的这个世界里。所以我很好奇美术团队是如何表现这样一个脑内世界的？

徐一超：我们其实在这里面下了很多工夫。以前我们看过的一些太空照片，比如NASA著名的“马头星云”，很漂亮，但其实都是后期人为上色的，现实里并没有那么五彩斑斓，但上色后的传播价值却会更高。那么这是不是违反了科学需求？我觉得并没有，因为科普和科研并不同，要让大众去了解、欣赏这些生僻的科学内容其实需要很强的艺术手段作为支撑，谁能够掌握这样的艺术手法谁就能获得大家的喜爱。

《黑门》里我们把这些科幻视觉分两部分处理。第一部分是收，收那些你觉得喜欢、认可甚至是熟悉的元素，比如中国人吃的、用的、用来装饰

的东西等。第二部分是放，有些科技是突然来到身边，比如VR眼镜，没什么雏形，突然就出现了。比如《黑门》里那副外骨骼，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做成现在常见的液压杆设计，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做一个大家没有见过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每个设计都严格按照理论来执行，这种科学幻想其实就少了很多幻想的成分，更多是一种技术推演，而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

后来我认识些做医疗设备的朋友，他们给我看了未来外骨骼的设计，跟我们在《黑门》里做得非常相似。那套外骨骼系统也是为了高位截瘫患者去连接大脑实现行走，而《黑门》里绿洲集团本身就是个做医疗设备出名的企业，他们最早制造外骨骼也是为了帮助这些高位截瘫患者实现行走。

美术设计这块其实非常花钱，所以有限的钱得花在刀刃上，像脑宇宙这些大场景会花费比较多精力去呈现，另外场景数量也是个很致命的事情，剧本里原本涉及的场景会比较多，因为我希望场景在不断变化，能通过些很新鲜的物流通道、地下管网去展现这个世界，但其中肯定有一定取舍，有机会的话，我还挺想尝试去呈现白洋市的大全景。

三联生活周刊：第一次执导动画，你觉得与以前的影视创作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徐一超：说实话没有什么不一样。科幻动画的创作比实拍科幻影视作品更方便，因为像《黑门》这样的动画，主要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实现，也就是我们是依靠演员表现出来，而不是画出来的，这是我所熟悉的领域。《阿凡达》也是这么拍的，《阿凡达》的实拍部分和电脑动画占比可能是五五开，那么它究竟算不算动画呢？随着技术发展这些界限可能会越来越模糊，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实拍、特效等手段构建现实里难以观看的梦中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国内具有科幻影视作品的创作人员可能不是很多，那么你在具体执导过程中觉得哪些部分对于优化未来工业化的流程是有益的？

徐一超：太多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执导这样的长篇科幻番剧，几乎每一个点都可以用来总结经验，而且科幻作品的整个制作流程和其他的品类完全不同，科幻作品的核心问题是很多东西你得从零做起，所以概念设计这个部分的流程在以后的作品中我可能会做得更早些，迭代得再更多些，甚至可以先有概念设计，再去故事创作。

这方面其实我们在《黑门》里尝试过，但不够大胆。像里面球形公式那个场景，我们是先想到要使用这样一个公式，再去围绕这个公式构建故事情节。然而，这么典型的案例很有“赌博”性质，它的成本非常大，写作时间非常长。其实科幻作品里的科学构想与整个故事没有前后关系，也许以后创作里我们可以先做个这样的概念集合，再依据这些概念集合写故事，可能也会是非常有趣的尝试，这样这些技术在整个故事里也不会显得特别突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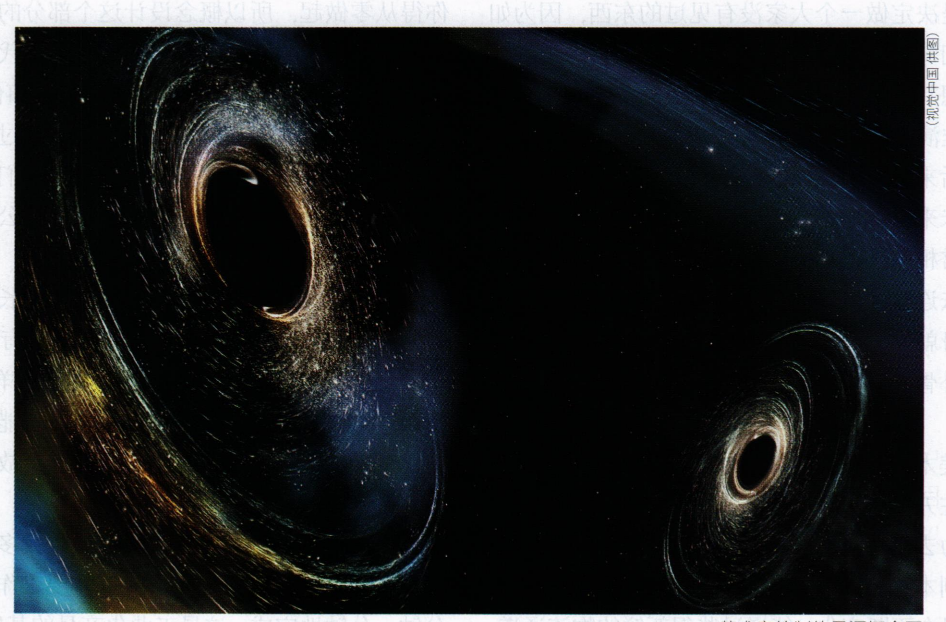
当然，作为商业产品它没有什么太多可供取巧的东西，每帧的模型和渲染都需要工作人员一分钟一分钟地完成，这是工业化产品的基础属性，不像拍文艺片，有几个优秀的演员、好的剧本、清晰的导演思路，就能给大家看，科幻作品更像纯正的工业化流程作业。

三联生活周刊：从《流浪地球》开始，我们就经常在讨论科幻影视创作的工业化流程，所以科幻影视与科幻动画的工业化流程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吗？

徐一超：在领域上会有些不一样。实拍涉及的是现场拍摄的人员管理，这方面动画的制作相对轻松，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场景需要制景、道具。但在其他方面几乎完全一样。不过从整个行业来看，最大的挑战应该是三维特效行业的管理和流程的优化，其实国内很多团队、企业都在摸索一个更高效的方式，有点类似于工厂生产流程管理、人员管理方面。虽然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先进的技术，但现在不论从硬件技术还是人员意识上，与好莱坞几十年的积累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去追赶。这是一套系统化的科学方法。

黑洞与暗能量

主笔 · 苗千



（视觉中国 供图）

艺术家绘制的黑洞概念图

如果超大质量黑洞与暗能量确实存在某种关联，那么必然还存在其他可观测的效应。

暗能量堪称当代宇宙学研究最大的谜题，而位于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也是宇宙学家研究的重点，其自身也存在着诸多谜题。最近有宇宙学家声称，驱动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可能正是起源于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把这两个宇宙谜题联系在一起，必定会迅速吸引全世界宇宙学家的注意，也难免会引来强烈的怀疑。

起码以现在的宇宙学知识来看，黑洞与暗能量并无特殊的联系。黑洞虽然看上去神秘且危险，却是广义相对论的必然产物。当一些天体的质量超过某个极限，又因为自身的引力而发生塌缩，就会形成黑洞。主要以质量划分的各种类型黑洞的存在早已被各项宇宙学观测所证实。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尤为特殊的一种黑洞。它的质量极其巨大，可以达到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太阳的质量。目前宇宙学家认为，在绝大多数星系的中心，都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相比之下，暗能量则要神秘得多。人类直到20世纪末，才通过几组测量星系与地球距离的精密实验发现，几乎一切天体都在远离银河系，而距离越远的天体逃离的速度也就越快——这说明有一种神秘的能量在对抗引力，且让宇宙加速膨胀。宇宙学家直到现在也无法确定这种能量的来源，就只能给它取名“暗能量”。

看似毫无关联的暗能量和黑洞又如何联系在了一起？在本质上，这还是源于目前人们对暗能量的本质缺乏理解，对超大质量黑洞的生长过程也不清楚，因此通过一些猜想在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暗能量能够抵抗宇宙中物质的引力作用，推动整个宇宙加速膨胀。很多物理学家猜测，它

的本质可能与量子力学中通过不确定性原理推导出的“真空能”（vacuum energy）有关，甚至有人认为，暗能量就是源于真空能。但问题在于，通过对宇宙膨胀速度的测量以及理论计算，人们发现两者的差距实在太大（超过了10^{120}倍），堪称物理学计算中最大的误差，甚至有人称之为“真空灾难”（vacuum catastrophe）。

于是，物理学家们试图从其他方面为暗能量找来处。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预测，根据爱因斯坦方程，如果真空能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巨大的球体，那么在外界观察者看来，它的表现与一个巨大的黑洞相同。通过这样的解释，我们或许可以想象，暗能量的分布并不像宇宙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遍布整个宇宙空间，而是集中在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中，但它们仍然起到了对抗引力、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作用。

也就是说，根据这样的解释，宇宙学家们所观测到的位于大多数星系中心区域的超大质量黑洞，实际上可能是由真空能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球体。可以说，这样的想象虽然看上去过于异想天开，却解答了一个宇宙学难题：目前宇宙学家们仍然不理解，这些质量动辄数百万个太阳的超大质量黑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这些超大质量黑洞真的是由真空能构成，那么根据量子力学，它们自身也会随着宇宙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说，如果宇宙空间膨胀了一倍，那么它们的质量也会随之增加一倍。为了验证这个假说，以夏威夷大学的宇宙学家邓肯·法拉（Duncan Farrah）为首，来自9个国家的17名学者对一些星系进行了测量。他们选择了一种名为“巨椭圆星系”（giant elliptical galaxies）的特殊星系——这类星系在宇宙早期开始形成和发展，随后便进入休眠状态，不再形成新的恒星。而这些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的质量都在数百万到数十亿个太阳质量之间——在星系中如果没有太多的气体和灰尘等星际物质，那么位于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就难以通过吸收这些物质以增加自身的质量。

法拉与合作者们观测了这些星系在最近90亿年间的成长轨迹。经过分析发现，在这段时间内，位于中心位置的超大质量黑洞一开始看上去较小，而后它们的质量随着时间增长了7到10倍，这个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星系自身的增长速度。法拉认为，观测结果符合猜想——这些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很可能就是由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构成。而其质量也随着宇宙的膨胀而增长，这个现象被称为“宇宙耦合”（cosmological coupling）。

2023年2月20日，法拉与同事在《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发表论文《关于黑洞的宇宙耦合观测证据以及其作为暗能量来源的天体物理学联系》（Observational Evidence for Cosmological Coupling of Black Hol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n Astrophysical Source of Dark Energy），报告了他们的分析结果。

这样的分析结果显然无法说服所有宇宙学家。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出在数字上：暗能量是宇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到整个宇宙质能总量的70%，而黑洞只属于物质的一部分，只占到整个宇宙质能的不到5%。更多宇宙学家则采取了观望态度——他们认为，如果超大质量黑洞与暗能量确实存在某种关联，那么必然还存在其他可观测的效应。虽然这个将暗能量与超大质量黑洞联系在一起的解释初看起来有些荒诞，却是目前唯一一个有宇宙学观测证据的解释。如果宇宙学家能够在未来获得进一步的证据，便有可能完全改变人类对于黑洞，乃至整个宇宙的认知。

〔本文写作参考了《科学》（*Science*）杂志以及帝国理工学院网站的相关报道〕

癌细胞的秘密武器

主笔 · 袁越

虽然靶向抗癌药物越来越普及，但化疗和放疗仍然是对付癌症的常规武器，也是大部分癌症手术都会使用的辅助治疗手段。

放疗和化疗虽然技术路线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干扰DNA复制来选择性地杀死癌细胞。众所周知，癌细胞本质上就是失控的体细胞，它们在很多方面都和我们体内的其他正常细胞是一样的。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癌细胞分裂速度快，其DNA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复制，远比正常的体细胞要频繁得多。

DNA分子非常长，复制起来很麻烦，经常会出错，好在细胞核内有一套高效的纠错机制，能够修复绝大部分错误。放疗和化疗的目的就是通过放射线和有毒化学药物人为地增加DNA分子的断点，让纠错机制应接不暇，其结果就是癌细胞累积的基因突变越来越多，直至死亡。

这套逻辑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因为癌细胞掌握了一种秘密武器，总是能从医生们布下的天罗地网中侥幸逃生。比如一种很常见的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预后非常差，似乎癌细胞学会了如何高效地修补DNA断点，无论是化疗还是放疗都拿它们没办法。

科学家们从这些肝癌病人体内分离出了癌细胞，从中发现了一种名为尼克（NIHCOLE）的RNA分子。这种分子并不参与蛋白质的合成，也没有任何其他已知的功能，但越是能抗化疗和放疗的癌细胞，尼克的含量就越高，似乎这种RNA分子就是癌细胞的秘密武器。可惜因为技术水平的限制，科学家们一直没能找出尼克的抗药机理，不知道它们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来自西班牙国家癌症中心（CNIO）等3家机构的研究人员通力合作，利用最新的纳米技术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相关论文发表在2023年1月31日出版的《细胞报道》（*Cell Reports*）杂志上。

研究人员先是制造出了一个纳米级的磁力珠子，将其连接在双链DNA断点的一端，然后又设计了一个带有磁力的纳米镊子，拽住双链DNA的另一端往外拉，通过测量磁力的变化，就可以知道两个DNA断点之间到底是相连的还是断开的，以及连接的强度到底有多大。

研究人员利用这套精密的技术测量了DNA断点在有尼克存在和没有尼克存在这两种情况下的连接强度，发现尼克分子似乎具有某种黏合力，能够将两个DNA断点连接在一起，并能保持这种黏合状态长达几分钟之久，就像用订书钉把两个断点订住了一样。已知DNA断点修复需要一组酶的共同参与，整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尼克分子的存在为DNA修复酶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这种RNA分子能够成为癌细胞秘密武器的原因。

接下来，研究人员用药物将体外培养的肝癌细胞中的尼克分子尽数除去，果然这些癌细胞对放疗更加敏感了。科学家们希望能尽快开展人体试验，看看这个方法能否对肝癌的治疗提供一些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尼克分子和细胞中的其他RNA分子一样，都是转录自DNA模板。但尼克分子的模板不是基因，而是此前一直被认为毫无用处的所谓"垃圾DNA"。人类基因组中的这部分垃圾DNA占了DNA总数的98%以上，科学家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多年的进化没有把这些垃圾清除掉。通过这个实验，大家发现原来垃圾DNA还可以帮助细胞修复DNA断点。这本是正常细胞的正常功能，却被某些癌细胞利用，成了它们的秘密武器。

四库全书纪事之辑佚（4）

签佚书单

文 · 卜键



（视觉中国 供图）

乾隆像

流传至今的《永乐大典》零册中，有的可见封面内的卷首粘贴着一两页表格，乃当日翰林院辑书的记录，被称作签条、签单，通行的说法是签佚书单。我做了一番查找询问，也没弄清是谁首先发现的这些签条并加以考释，那可是一件不小的功劳！

对于兴修《四库全书》，乾隆帝的思路是逐渐完善和细化的，而在知悉《永乐大典》中散存有大量珍稀古本后，重视程度则是陡然提升。但凡帝王都会有几分任性，弘历尤其如此，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而且是马上就做。他才不管国家正陷入极为难缠的大小金川之役，逼着刘统勋组织一个超大的编纂阵容，要求所有军机大臣兼任总裁官，亲自制定编纂准则，常也一竿子插到底，事无巨细，想起来就要过问。三十八年二月初，他就对如何从《永乐大典》中选辑古本明确指示，命纂修“将原书详细检阅，并将《图书集成》互为较核，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者，先行摘开目录奏闻，候朕裁定”。此可视为辑书的第一个步骤，即从大典中签出有价值的佚书，编成目录，以便众纂修有所依据，也避免做大量的无用功。

更详细的编纂体例，应该在刘统勋等呈交的十三条中，惜乎没有找到。刘统勋兼领枢阁，要处理的军政事务很多，推测这个十三条由次枢于敏中组织讨论和撰写。四库馆总纂官陆锡熊的文集中有一份《初拟校阅永乐大典条例》，应是遵照于敏中等总裁官的指示起草的，贡献了六条意见，首先确定的就是辑佚的范围和准则，如经史类：

一、经部内，除各经传笺注疏及唐宋以来诸儒经说现今列在学官者毋庸再采取外，其有先儒经解向尠流传、而实在有俾学术者，并为详核甄收。至关系礼仪、音乐，及字书、小学等部，如有可采者，亦均以旧例归入经门。

二、史部内，除历代正史及《通鉴纲目》、古史、《路史》、《册府元龟》等部毋庸再采外，其中如有编录事实、厘定掌故、足资考证之书，而现在无传本者，自宜并为采录。至于识小之流，丛谈杂说，什一流存，亦足沾溉后人，似并当别择蒐存，以广博综之用。

这些意见中的多数会被“十三条”吸纳，对于采录哪些、回避哪些，分类加以说明，并尽可能达到涵括无余。而参与过大型编纂项目的人都知道，实际情况可要复杂得多，随时会遇到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只能是见招拆招了。

明确了采录原则后，接下来要进行分工。此时《永乐大典》已丢失十分之一，正本有 9900 多册，均分给 30 名纂修，每人约在 330 之数。出于保存的要求，当然不会一次性发放，而是由提调收掌官分批核发核收。同时发给个纂修的，还有印制的统一规格的签佚书单，每阅毕一册，纂修官需详明填写，贴于本册封面内卷首。此类书单，当日夹在书册内转给誊录人员，现存大典零册中有

幸保留了几页，使我们能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其格式甚简，仅有数项：

一、纂修官即责任人，通常只填写姓氏，遇有该姓在馆不止一人者，注以籍贯或职衔，以便区分。

二、原书卷数。与纂修官同在签佚书单的第一行。

三、涉及佚书名，条数，各条位置。

四、签出佚书种数、佚文总条数。

五、发给誊抄部门的时间。

六、誊录者姓名。

为使大家有更具体的了解，兹举两例传至今日的签佚书单，其一曰：

纂修官吴签出第一万五百四十卷内：宋景文集、夏文庄集、胡文恭集、李复潏水集、强几圣集、刘才邵杉溪集……缙绅渊源。共书计十四条。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廿五日发写。

由于“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中有四位姓吴，此单没提供更多信息，便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另一曰：

纂修官王浙签出第万三千百卅九卷内：类林杂说一，金楼子一、十一、廿二，摭遗新说二，五代薛史三、十九，东斋纪事五……古今事通廿六。共书十三种，计十八条。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发写。

负责辑书的纂修官也有四位姓王，但因其在姓氏后注了一个“浙”，则可确定出于浙江会稽人王增。他是三十六年辛卯科榜眼，进庶常馆前即直授编修，前程无量，孰知在翰詹大考中列于四等，被调离翰林院去做知县，当了很久才升为通判。

签单，看似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案头工作，实则不光是在读庶吉士与年轻翰林没有把握，就算资深者也常会遇到难题。哪些才是真正稀缺和有价值的古书，亦即于敏中所反复强调的“要书”，是纂修官面临的最大疑问。接下来则要评估该书在大典中收录多少、能否辑成完整或大致完整的著作，要区别是全文誊抄、部分摘录，还是仅存目而已。科举至明清两朝更趋细密化，参试者可分为不同的研究方向，真正的通儒越来越少，对典籍的了解和熟悉也因人而异。但大家集中在翰林院办书，颇便于讨论商量、斟酌去取，纂修中必也有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

四库馆臣还有一个较受研究者忽视的板块，即提调官。从辑书开始，就专为翰林院配备了一个强有力的提调班子，后来任务量增加，竟达22人之多。所谓提调官，指具体负责调度与协调编纂事务的官员。最早是从军机处抽调的几位章京，总目职名表开列的共有七位，几乎个个都是能员，如章宝传、冯应榴学问亦优。更多的提调官出于翰林，或曾任翰林已升任各部院者，也有新近留院的辛卯科庶吉士黄瀛元、曹城。他们当然不会是同时进入，也不都是盯着大典纂修官的，但说较多为辑书服务，则可能性很大。可以设想，这些提调官虽在“管理岗”，也会承担一些具体的编纂事务。如初步提取“要书”目录，大约不仅是纂修官的事情，提调官、总校官、总纂官直至各位总裁大人都要参与。这样，众纂修在领到大典书册后，应是先快速翻阅一遍，形成一个整体印象，拟出推荐书目上交，等总裁等审核并报皇上阅定，然后才进入签佚书单的环节。所有这些都会有反复和变化，不可能一次完成，即使已完竣的也会翻工乃至废弃，而若说大致有这么一些操作流程，当无大错。

三十八年三月底，刚开馆不久，乾隆帝案头已经有了一份大典本要书目录。《清高宗实录》卷九二九：

近允廷臣所议，以翰林院旧藏《永乐大典》详加别择校勘，其世不经见之书，多至三四百种。

三四百种为一个大致的数字，签佚书单的工作正在逐步展开，更细密的统计只能留待这件事情完竣后，而这个数字却绝非随便说说，必也经过了一两个轮次的大排查，方才敢呈送皇上。

到了该年五月，各省选送的“遗书”（当时的官方通称，指古本善本图书）源源而来，武英殿和翰林院都堆积如山，更多的人投入编校。办理遗书，只需整体考量是否稀缺和有价值，确定后即可发交誊录或刊印，而从大典中辑佚的工作量要大很多。根据现存的签佚书单，可知这项工作到年底还没有结束，幸亏总裁官先对提取书目做了安排，否则皇上又要起急了。

政府要治足球病

文 · 张斌

2月23日,英国政府网站上发布了一份99页,名为《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变革足球俱乐部治理》的官方文件。这份被首相苏纳克定义为“一系列新的计划,将把球迷重新置于足球发展的核心,保护好我们深爱俱乐部的遗产与传统”的纲领性文件如今已经被简称为“白皮书”,日后多年,人们回看2023年时,也许会认同政府及其支持者们的论调,这是“英国足球继往开来的时刻”,但反对者则从第一天便希望公众牢记,这是彻头彻尾对于自由市场的政府干涉,而白皮书最初的意涵便是政府意志的表达。

这是一份至少酝酿了近两年的政府行为。有观察家在形容白皮书出台时用了三个耐人寻味的词——延误、踌躇、拖延,而积极促成白皮书问世的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国会议员弗莱泽则全然不顾刺耳的苛责,自信正在救治英国足球自身病症,“这将是自足球规则诞生一年多来,足球治理最为激烈的一次变革”。英国足球有病?似是而非,世界看到的是自诩为“世界最具观赏性的职业足球联赛”在这个国家蓬勃向上,但英国政府与部分球迷群体则目睹了繁华之下的惨淡与落寞。

2019年,第三季联赛中的伯里俱乐部殒落,深爱这支历史悠久球队的当地球迷无力相救,这一伤心诀别竟然深深触动了英国政府,前体育大臣克劳奇随即启动了球迷角度的足球治理现状调查。足足花了两年时间,结论很简单,英国足球已经不能恰当地进行自我管理了,解决之道似乎只有一个,政府出手,诊治足球病。随后,又是一年半时间,白皮书出台,英国政府承诺,将引入独立监管人制度,最醒目的举措包括:针对新的俱乐部拥有者将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核;确认职业足球俱乐部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禁止任何俱乐部参与独立监管人不予认可的联赛,这一条显然是顺应球迷心意,阻止豪门翻墙加盟蠢蠢欲动的欧超联赛。

白皮书旗帜鲜明,初心显赫,只待国会通过,力争2025～2026赛季前全面实施。影子大臣露西信心十足,声言英国足球身处危难,国会自然力挺,政府会加快措施落地。过往一年半,英国足球风起云涌,德比郡队奄奄一息,奥尔德姆竞技队持续下坠,切尔西易手,纽卡斯尔联队成为了王国的球队,曼联在售,热刺待价而沽,利物浦起伏不定,英超与英足联就收益分成迟迟不能达成共识,欧超联赛2.0版本阴魂不散。英国政府自认唯有自己才能风波中铁肩担道义,扶危济困,拯救处于财务危机中的英国自家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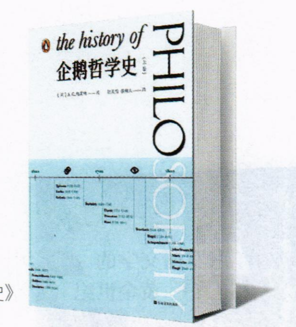
英超联盟早有准备,第一时间就白皮书发出声明,迎接“意义非凡的时刻”,同时也意味深长地提醒白皮书将使“英国成为主要足球国家中第一个由政府监管足球产业发展”。在一向倡导“大社会,小政府”的英国,这是一句会带来痛感的表达,联盟同时提醒,政府举措有可能“引发不经意的后果”,客观上将影响“世界上被最多人观看的联赛”作为产品的品质,减弱其吸引外部投资的能力。管理着英超之外联赛的英足联则是另外一种姿态,盛赞此次变革是“千载难逢之良机”,借助政府力量,可以从英超令人艳羡的每年35亿英镑媒体权收益中分得更多,太多的俱乐部需要以此度过艰难岁月了。

俱乐部拥有者暂时保持沉默,只有西汉姆联队萨利文脾气火爆,指责政府“浪费钱,只为公关作秀,博取球迷和弱小俱乐部的喝彩”。萨利文面对记者,没给政府留一点儿面子,“政府干啥啥不行,你看看现在国家糟糕到什么程度了”。根据设计,独立监管人制度的政府机构将由一个负责人和100名雇员组成,一定会引发抱怨,俱乐部认为最终会由他们来承担这些费用。而更为复杂的是,独立监管人还设立了准入机制,所有俱乐部都要重新就财务健康度、老板合理性以及球迷参与度进行申报。总之,活着和活好都很不易。

《企鹅哲学史》的取舍

主笔 · 薛巍

格雷林所著《企鹅哲学史》有 600 余页，涵盖了心灵哲学、政治哲学、女性主义哲学，以及印度、中国、非洲哲学。他决定只探讨学院哲学，偏向于社会学的理论家就都进了“落选者沙龙”。



《企鹅哲学史》

判断一部西方哲学史的水准，可以先看它如何评述苏格拉底之死、康德的三大批判。牛津大学特约研究员 A.C. 格雷林在《企鹅哲学史》里说：“西方哲学史中最伟大的三个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他们出类拔萃的根源在于智识的力量、对复杂问题中深邃部分的介入以及他们广泛的贡献。他们每一位都创造出了用来探究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新的概念与词汇……”

这个论断不会引发很大的争议，但可以继续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谁更伟大？斯宾诺莎、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或者海德格尔、萨特、维特根斯坦能不能跟康德比肩？柏拉图提出了关于知识的回忆理论，区分了意见和知识（一个意见或许是对的，但可能只是碰巧，被充分证成的意见才是知识）；亚里士多德创立了逻辑学，提出了四因说、德性伦理；康德提出了给知性划界、道德的绝对律令；黑格尔分析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认为与现实的疏离会导向苦恼意识或异化的精神，提出了正反合的辩证法；叔本华建立了他的意志论哲学，并“第一次对性做了严肃的哲学讨论，他有关性欲具有力量和毁灭性的观点影响了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治疗性的，要去证明哲学问题源于对语言的误用从而消解它们。

格雷林说：“哲学就是在充满疑惑、困难、晦涩和未知的各个生活和思想领域，努力去把事情弄明白，获得理解和洞察。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各项事业中，哲学都处于最前沿。”心灵哲学可以说是哲学的最前沿，对此格雷林的介绍简略但生动，提到约翰 · 塞尔的中文房间论证、托马斯 · 内格尔的著名论文《成为一只蝙蝠是怎样的？》，而且提到戴维 · 查尔莫斯如何反驳物理主义：他设定了一个完全由僵尸组成的世界，如果它在形而上学上是可能的，那么物理主义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完全把人类描述成了僵尸。

英国哲学家简 · 奥格莱迪说：“写哲学史就像打扫房间，吃力不讨好，不管你打扫得多干净，别人评论的都是你没扫掉的尘土。而什么算尘土很清楚，什么算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格雷林认为，哲学史主要介绍学院（academic）哲学，它不同于观念史，所以很多大名鼎鼎的思想家在他这里都落选了：柏格森生前享有盛誉但没有太多哲学影响力，卡尔 ·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病学具有突出贡献，哈贝马斯的贡献属于社会学领域，马尔库塞、阿多诺、阿伦特、福柯、本雅明、拉康主要对社会学、政治学、社会与批判理论、观念史感兴趣。

在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之外，格雷林还介绍了政治哲学：“政治学关心政党、制度、公民身份、权力体系、资源分配，政治哲学关心权威、正义等基本概念。政治学是描述性的、经验性的，政治哲学是思辨的、批判的。”罗尔斯对政治哲学做出了永久性的贡献，他认为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自由会导致不平等，因为人

们彼此之间在起点、天赋、能力、运气方面的差异很快就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但他也相信，一个公正的社会既可以保证个人层面的自由，又能让人们在适切的方面彼此平等。

格雷林给了女性主义哲学显著的地位，它“开始成为一切有关未来的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主义政治理论是哲学在 20 世纪后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女性主义哲学让人们意识到，“目前几乎所有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都损害着女性的自主权与机会平等”，比如对工作时间的要求导致一些女性只能找到兼职或低薪工作。

格雷林重新估价了一些哲学家的地位，对一些看上去确切无疑的哲学观提出了新的阐释。比如赫拉克利特说“你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的意思是说，一切皆流动，还是事物只有通过变化才能保持同一？按照后一种理解，河流的流动不仅没有破坏河的延续性，而且实际上是其延续的基础。



《企鹅哲学史》作者、牛津大学特约研究员 A.C. 格雷林

书中的注释都很有趣，他说奥古斯丁颇为幽默，有人问在创造世界之前上帝在做什么，他说，他不会回答说：“在为提出问题的人准备地狱。”“根据德里达自己的原则（不存在真理），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是无法说清楚的。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有关这一理论的 40 本书中可能有 39 本（甚或 40 本）都是多余的。”

格雷林还讲了很多哲学家的八卦，并为此做了一点辩护：“谈些题外话是恰如其分的。海德格尔的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这是因为一些人认为它不仅仅具有新闻价值（关于如果知道作家的生平是否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这些人认同圣伯夫而反对普鲁斯特）。”所以他介绍说，海德格尔在 1915 年作为一名哲学系讲师在弗莱堡大学任教，并很快与他的一位学生艾尔弗丽德·佩特里结婚。他们有两个儿子，海德格尔在 1923 年前往马堡大学后，跟他的学生阿伦特有过广为人知的暧昧关系，他还与另一位学生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保持着暧昧关系。布洛赫曼是海德格尔妻子的朋友。海德格尔的妻子也与他人保持着暧昧。

另一位比较风流的哲学家是罗素，康德则是终身未娶。“中国有句俗谚：兰畏莺啼，菊傲秋霜（兰花在春天开，莺鸟啼鸣则预示着中国北方夏天开始，花期将尽，但菊花会一直开着）。以此来说，康德无疑是秋菊，他大器晚成，直到 46 岁才得到一份有薪水的学术职位。他出名后，像王室成员一样，每天在书房门前现身片刻，向访客们挥手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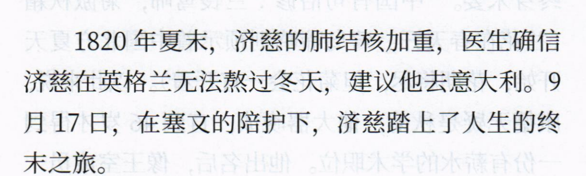
休谟因为高强度且高难度的研究活动，一度精神崩溃。他在法国疗养了三年。他的书出版后，没收到什么反响，他极其失望，甚至匿名给自己写了一篇书评。叔本华看上去“是一个表情冷峻的老人，几束白发支棱起来，好像从他本来已然光秃的脑后伸出的兔子耳朵。这掩盖了他著作中无所不在的幽默、洞见及同情”。

罗素说哲学的任务是“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该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但也可能越读哲学越困惑，海德格尔的婚姻观靠谱吗？休谟精神崩溃还能恢复是靠运气还是智识？叔本华真的很有同情心吗？哲学的河流也将一直流动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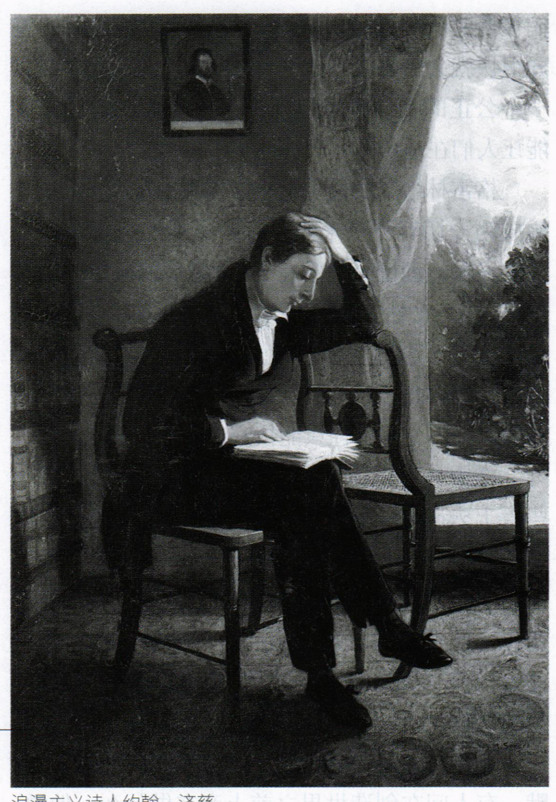
《约翰·济慈传》：“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

文·周瓒

1821年2月23日，约翰·济慈(John Keats)，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在客乡罗马逝世，年仅25岁。一个世纪之后，他的传记作者沃尔特·杰克逊·贝特(W. Jackson Bate)描述了他那令人心酸的临终场景。济慈请守在身边的友人约瑟夫·塞文将他扶坐起来，并安慰塞文说：“别害怕——要坚定，感谢上帝，死亡终于来了。”



《约翰·济慈传》



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

1820年夏末，济慈的肺结核加重，医生确信济慈在英格兰无法熬过冬天，建议他去意大利。9月17日，在塞文的陪护下，济慈踏上了人生的终末之旅。

在那之前，济慈没有出过英伦三岛。他最长的一次旅行是与友人查尔斯·布朗一同徒步去往苏格兰，那是1818年6月末至8月初，济慈的大弟乔治已携妻移民美国，幼弟汤姆的结核病情一度稳定。在徒步中，济慈领略壮美的自然，拜谒人文胜地，写下《访彭斯墓》《咏阿丽沙巉岩》《写于本·尼维斯山巅》等十四行诗，并为稍后的创作积累了意象与感受素材。

依贝特所见，诗人济慈天才性的显露始于他22岁之后。1817年10月31日是济慈22岁的生日，早在这一年的3月3日，他的第一本诗集《诗集》出版，自4月开始写作的长达4000行的浪漫传奇《恩底弥翁》也写到了第四卷，接近完成。评论界有关《诗集》的反馈对济慈并不友好，因济慈曾受到李·亨特的提携，与后者政治立场对立的帮派评论者将矛头指向了初出茅庐的诗人。

贝特将“诗性天才”作为对济慈的核心关切。他注意到，作为诗人“创造力的试炼”与“意志力的行动”，《恩底弥翁》从写作、修订到出版，一年间济慈的思想与心智成长有了飞跃。在写给弟弟们和友人的信中，通过积极的自我批评，济慈确立了一些写诗“原则”，并以一个特殊的表达“消极能力”思索了“美”与“真”的关系，进而探讨艺术中的“无我”(他对“天才非个人化”的兴趣及思考)理想，开启了触及诗歌最崇高目的等问题的深思。贝特认为，济慈22岁之后的这些思考显示了“他的思维水平(包括一年之后，他的表达水平)达到了只在最伟大作家身上常见的高度”。

1817年底至1819年9月，济慈完成了他最重要的杰作，包括五大颂歌(即《赛吉颂》《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忧郁颂》和《秋颂》，贝特认为《怠惰颂》

水平较低，仅有传记价值），未完成的《海伯利安》与《海伯利安的覆亡》等。济慈的创造生命短促而璀璨，贝特将济慈作品批评与其思想倾向探讨相结合，细致地欣赏并揭示其辉煌的创造成果。

从整体层面的问题出发，对济慈天才性的关注之外，贝特还指出了济慈身处的，也是与他的同代诗人们共同面对的现代境遇：如何克服前人宏伟的成就施加于现代写作者身上的压力，即哈罗德·布鲁姆稍后提出并讨论的“影响的焦虑”问题。济慈慎重地选择自己的榜样，从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宾塞、查特顿到华兹华斯，他思考诗人如何做到“无我”“无个性”，认识到历史是一个过程，而其中发生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人及其成就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不可割裂。济慈发现，自己是且只能是一个现代诗人：他根本无法逃脱已经转向内心生活的诗歌。

济慈的思想成熟，体现在他对诗歌在他身处时代的作用与可能性的思考上，在前代诗人与对未来诗歌（他自己的努力方向）的构想之中，他“试图辨明方位”。

对传记作者来说，济慈的人生初年留下的资料非常有限，在他8岁至14岁之间，父亲、外祖父和母亲相继离世，年事已高的外祖母将未成年的济慈兄妹四人委托给理查德·艾比，后者遂成为孩子们的主要监护人。济慈十七八岁至离世这段时间的生平状况的信息就丰富许多，特别是当济慈开始写作，结交了对他影响颇大的几位朋友后。《约翰·济慈传》尽可能地打开想象，描述了济慈父母亲年轻时代生活，推测济慈一家的生活图景，为其中人物的行为找出合理的动因。在对人物性格、济慈社交圈中各种关系的体察上，贝特显示了极强的洞察力，特别是对一些关键人物，包括济慈的友人李·亨特、雷诺兹一家、本杰明·罗伯特·海登、本杰明·贝利等。贝特对书中人物的性格分析赋予了这本传记一种极其生动、合理和复杂的情感与精神动能。

尤其是关于济慈的女友范妮·布劳恩的部分，因为济慈在去意大利之前烧毁了大部分书信，留存的仅是济慈写给范妮的信，以及济慈写信给友人时提及范妮的内容。济慈去世后，范妮被严重污名化，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及欠缺参考的研究者们把范妮想象成一位“狠心无情的卖俏女”。贝特串联各种文献，剖析人物心理，探查背后隐情，为范妮正名，将范妮还原为更贴近现实的形象。她个性活泼，同时也克制冷静，与济慈真诚相爱，是济慈病中最重要的精神依靠。

贝特还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济慈兄妹的财产受托人与监护人艾比对遗产的欺诈性侵吞，直接导致了济慈兄妹成长中的贫苦与艰辛。济慈选择弃医从文，虽然不时得到友人的接济，生活的拮据使其文学生涯更加坎坷，可以说，济慈是在贫病交加中离世的。贝特对济慈在少年时代转向文学的时机进行了一番不太确定的考察。济慈在母亲去世（1810年3月）后，性格发生了显著变化，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变得沉默，同时狂热地投入阅读。那个时刻或许正是济慈投身文学与诗歌的开端。

《约翰·济慈传》兼具学术与文学价值，贝特是哈佛大学A. 金斯利·波特校级教授，很早开始研究济慈，他的本科毕业论文（1939年）就是关于济慈的。《约翰·济慈传》出版于1963年，于1964年荣获普利策奖、克里斯蒂安·高斯奖。这本书的影响深远，不仅在学术领域广受好评，而且也影响了年轻的诗人和作家。贝特认为，济慈因为早逝，不像更长寿的诗人有机会封存或处理掉自己的试笔之作，他留下的大多数显得磕磕绊绊的少作，可能会“吸引同行作家，使他们得到一种健康的心理宽慰”。而美国当代诗人简·肯庸（Jane Kenyon），曾写下她读到本书时，对济慈弥留之际的印象：

> 显然，我在匆忙中装了一本
> 错误的书：济慈死了，身子是支起的
> 为了能呼吸更多空气。塞文
> 将他的身体平放在床上，
> 从他的头上
> 剪下三绺湿鬈发。
>
> （《夜读济慈之死》，张慧君译）

在去世前的一两个星期，济慈告诉塞文，他不想在坟墓上留下名字，也不要墓志铭，只写上一句话：“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

大家都有病



压力好大，想去一个没人打扰的地方。

买张机票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

机票和住宿太贵了，花不起。

这里和出去旅游一样没人打扰。

我们最近缺工人，你会做什么？

我有激光红外线神力眼，还能切石断钢的超能掌风……

更有飞跃八丈的弹簧腿，以及超强心电感应控制能力……

别闹了，我又不缺你这样的工人。

我以后还会过从前那种苦日子吗？

我仔细瞧瞧。

不会了，从前的苦日子都过去了。

你以后会过新的苦日子。

抱歉，现在我们已经不缺人。

我什么都愿意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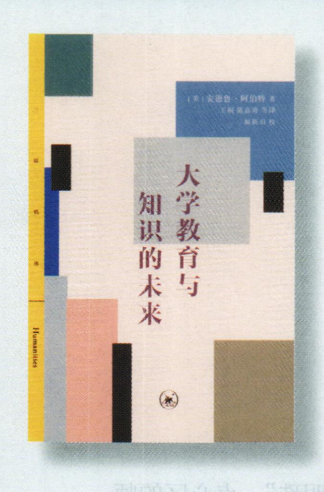
别乱叫，公司目前只缺一只看门狗，等我退休你就可以转成人了。

唉，这个工作太辛苦，不合适……

唉，这个工作太累人，不合适……

唉，这个工作日夜颠倒，不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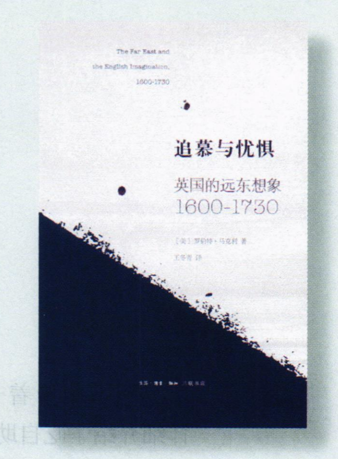
最后他终于决定要干什么了。



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

[美]安德鲁·阿伯特 著 王楠 陈嘉涛 等译 解斯羽 校 定价：4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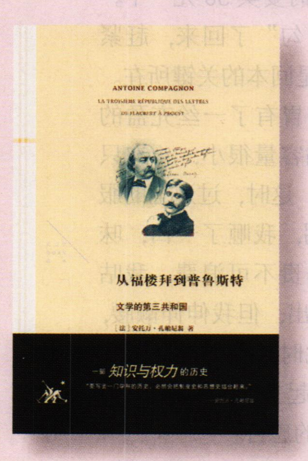
探寻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各自的价值，追问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目的；面对当下过剩的知识和令人存疑的知识的未来，辨析出版社、图书馆、学术界的应对策略；他还对三位中国社会学家陈达、瞿同祖、费孝通的作品进行评析，展现其对“教育”作为一种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关注。



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

[美]罗伯特·马克利 著 王冬青 译 定价：69.00元

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等远东异域令英国人一度目眩神迷。当时的远东供应着欧洲渴求的香料和奢侈品，也是欧洲幻想中潜力无限的商品外销市场。作者重新思考了彼时英国文学对国族和个体身份的想象，由此考察当时富强的远东如何唤起英国的追慕与忧惧。



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 著 龚觅 译 定价：88.00元

从普法战争到一战前后，即“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时代，法兰西“学者共和国”的全景图。大量史料串联起法兰西第三共和治下法德知识界的恩怨往还、史学与文学的分合、德雷福斯事件呈现出的意识形态光谱，并勾勒出一众活跃在世纪之交的法国学者群像。



探索亚马孙：华莱士、贝茨和斯普鲁斯在博物学乐园

[巴西]约翰·亨明 著 法磊 译 定价：6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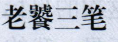
一个半世纪之前探索亚马孙丛林的三位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贝茨和斯普鲁斯，他们在这个森林与河流的“天堂”数年时间，收集了数以千计的新种昆虫和植物，对亚马孙环境相关知识做出巨大贡献，并以各自的发现闻名遐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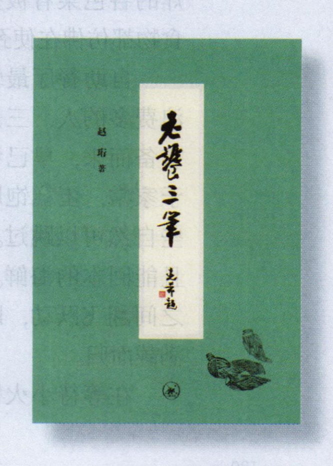


奥州小道（双语版）

[日]松尾芭蕉 著 阎小妹 陈力卫 译注 定价：48.00元

日本江户时代俳谐诗人松尾芭蕉的代表作。集散文诗歌之大成，不仅对此后日本的诗歌创作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代表了一种日本人的美学意识，一直深受日本读者的喜爱，被视为代表日本民族文学与精神世界的经典之一。





老饕三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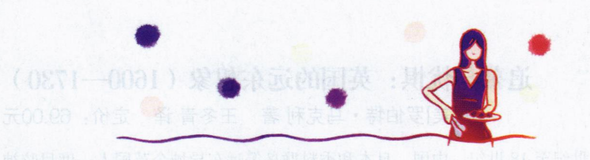
赵珩 著 定价：59.00元

写口腹之物，记风物人情，述历史掌故，从桂林的马肉米粉说到日本的怀石料理，从苏州观前街、南京皮肚面，说到巴塞罗那的街边小吃……依旧是“以饮食为由，东拉西扯，谈些经历过的旧事”，或可“从怀旧的角度阅读”，亦可“获取些闻所未闻的美食知识”。



自助餐回本攻略

文 · 贝贝熊　图 · 陈曦



网上流传着一份“吃垮自助餐厅”的秘诀，详细介绍了吃自助餐的最佳顺序：首先吃水果，酸性开胃；其次吃生鲜，三文鱼和螃蟹是回本的主力；再次是涮火锅，扇贝、生蚝以及牛羊肉卷轮番登场，接着用烧烤填补肠胃缝隙，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还能浅尝甜点与寿司；最后用冰淇淋完美收尾。

前段时间，我得到了几张昂贵的自助餐券，邀请老妈和儿子一同享用。去之前，我在心里把那份“最佳顺序”默念了几遍，发誓要把商家的“羊毛”薅秃。我叮嘱儿子说：“中午少吃一点，晚上留着肚子吃大餐。”据说，吃自助餐的最高境界是，饿得扶墙进去，饱得扶墙出来。

那天，我中午只喝了一杯咖啡，但问到儿子是否做好准备时，他面有难色地回答说：“下午太饿了，吃了些点心。”这让我心中陡然生起“猪队友”的感慨，我竟成为团队里的种子选手。

一开餐，食客们蜂拥而至，展现出马拉松开跑的气势。我们也赶忙冲向了琳琅满目的餐台，在明亮灯光的映照下，食物仿佛开启了美颜滤镜，呈现出诱人的色彩：海鲜贝类整齐地叠放在碎冰上，奶白色的舒芙蕾在煎锅上冒着热气，煎炒炖炸的各色菜肴被盛在金灿灿的高脚容器中，每种食物都仿佛在使劲叫嚣：“快来吃我吧！”

自助餐厅最怕三种客人：一是大胃王，二是浪费多的人，三是喜欢专吃“贵价菜”的人。我有备而来，早已看透了廉价食物的幻相，热菜过于家常，蛋糕饱腹感强，碳酸饮料则是大忌，这些自然可以跳过。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昂贵且能回本的海鲜。于是，我的夹子在生蚝和鲜贝之间翻飞跃动，瞬间小小的餐盘里堆积如山，我满载而归。

在等待小火锅煮沸的时间里，我在餐台前细细巡视，唯恐漏掉什么“沧海明珠”。点心区的师傅向我推荐本店招牌蟹黄馒头，我心中冷笑：“吃完这么大的碳水化合物，必然削弱战斗力。”拔腿欲走时，师傅小声地说：“这平时要卖50元一个。”听到这句话，我的心立即被“勾”了回来，赶紧夹了两个放入盘中，毕竟价格是回本的关键所在。

吃完馒头，原本空荡荡的胃有了一丝充盈的感觉，我立刻转战海鲜。火锅容量很小，一次只能放几只贝壳，必须往返取餐。这时，过道上的服务员笑眯眯地送上一碗海参粥，我咂了一口，味道很是鲜美，想着“食材”昂贵不可浪费，我咕咚喝了几口，立觉肚子膨胀而出，但我伸伸懒腰，松松衣物，自觉尚有余力。此时，服务员又不由分说地送上一块榴莲蛋糕，尝起来味道细腻浓郁，让我瞬间忘记了“甜品垫后”的忠告。

我在餐厅的空地上溜达了几圈以消耗热量，又战术性地上了厕所，为后面进食预留发挥空间。哪知服务员又送来烤好的牛排、羊排，肉质鲜嫩，入口即化。我左右开弓，还没啃完，一碟蟹脚接踵而至，我便开始加速咀嚼，感到嘴巴酸痛。

我突然意识到，商家是想把被动变为主动，提前将顾客喂饱，避免后续的胡吃海塞。一旦识破商家的诡计，我彻底地跳出“最佳顺序”的限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爱吃的东西，比萨和炸鸡统统来者不拒，甚至还喝了半瓶啤酒。

等肚子宛如充足气的皮球般硬邦邦时，我一瞄手机，懊恼不已，此刻才过去半个小时。看到周围人悠闲地聊天、细嚼慢咽地品尝，我发现自己才是自助餐厅最爱的顾客，胃口小、吃得快，且毫无规划。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

玛莎拉蒂全新Grecale GT
日见新生

玛莎拉蒂全新Grecale GT
绽放每一日的优雅时刻

敬请莅临玛莎拉蒂当地授权经销商，
或致电 400 688 5111

